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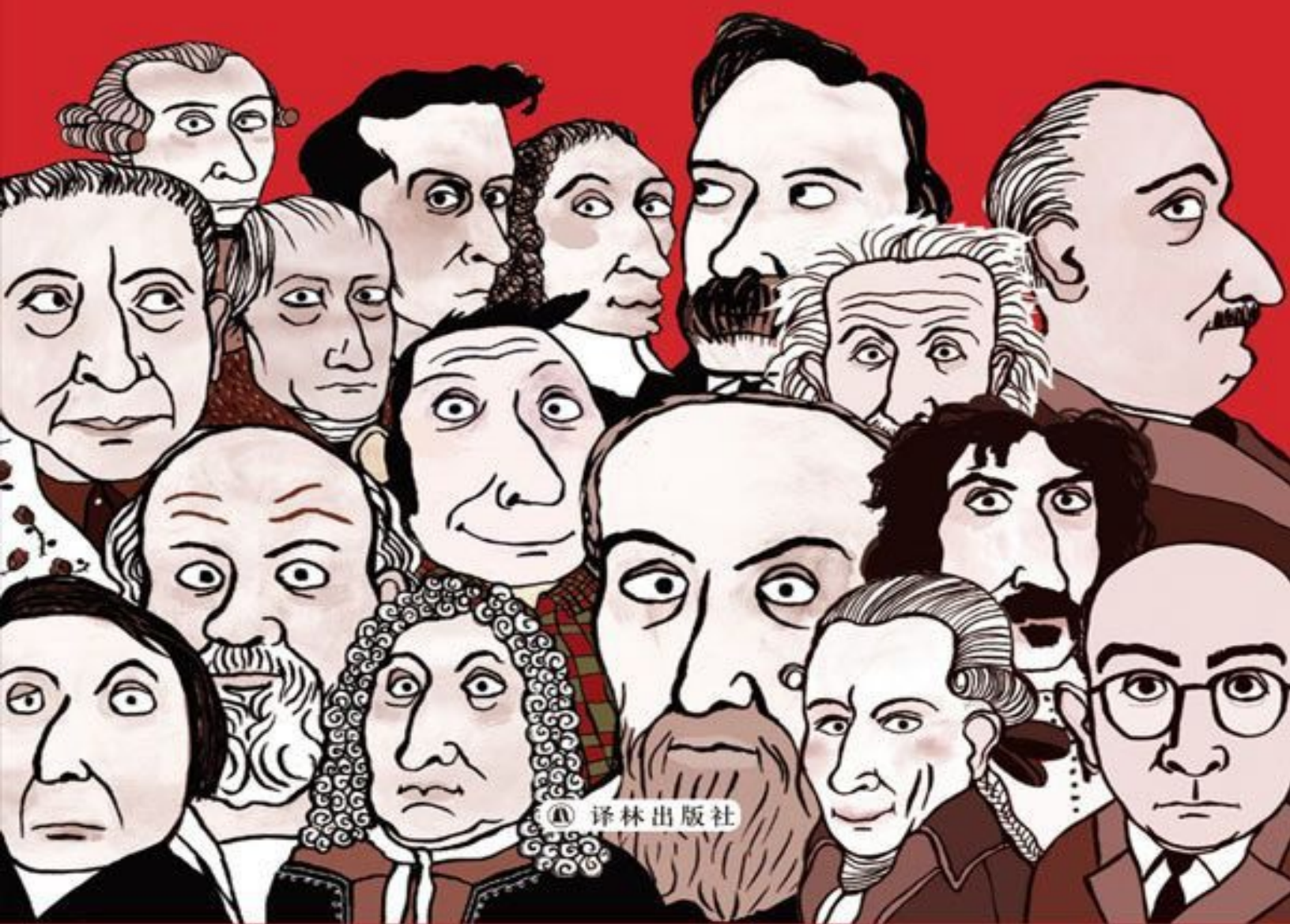
思维的艺术

如何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德国】延斯·森特根 著

【德国】纳迪亚·布达 绘

李健鸣 译



译林出版社

版权信息

Selbstdenken! 20 Praktiken der Philosophie

Text © Jens Soentgen

Illustrations © Nadia Budde

© Peter Hammer Verlag GmbH, Wuppertal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eijing Star Media,
China & Mundt Agency,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7-082号

书 名 思维的艺术：如何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作 者 【德国】延斯·森特根

译 者 李健鸣

责任编辑 张海波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4253

关注我们的微博：@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致谢](#)

[导言](#)

[1. 权威，信还是不信？](#)

[2. 为什么看得清，才能想得明？](#)

[3. 让“事实”说话？](#)

[4. 从蛛丝马迹到真相，到底有多远？](#)

[5. 原因那么多，哪个才是决定性的？](#)

[6. 用反例进攻](#)

[7. 为什么没有面面俱到的定义？](#)

[8. 画面感，决胜的关键](#)

[9. 如何高效率地进行“思想收纳”？](#)

[10. 用三个圈告诉你什么是“逻辑”](#)

[11. 为什么特立独行的人更容易红？](#)

[12. 人身攻击，哲学家也不能免俗](#)

[13. 在头脑中建一座实验室](#)

[14. 此处无为胜有为](#)

[15.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16. 当笑声成为武器](#)

[17. 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

[18. 神谕在古代哲学争辩中起了什么作用？](#)

[19. 找不到思想关联？做个表格吧！](#)

[20. 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结束语](#)

[注释](#)

致谢

凯·乌韦·布克斯和康拉德·霍尔曼审读了本书的若干章节，并给予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也要感谢凯斯汀·格鲁特的批评指正及帮助。她的热忱对本书的写作裨益良多。

延斯·森特根

国王说：“尊敬的那先^[1]，你还想和我继续讨论吗？”

“陛下，如果你能按照智者的方式和我讨论的话，我愿意。但如果按照国王方式的话，我就不愿意。”

“智者们是如何讨论的，尊敬的那先？”

“陛下，智者们的讨论是一种把事情都摆出来并进行分析的过程，是说服和认同的过程。智者们把事实放在一起，并把事实进行对比，而且在讨论过程中，他们不会失去自我控制。陛下，智者们就是这样讨论的。”

（选自于《弥兰陀王问经》，公元前二世纪的一篇印度古文。）

导言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有一群医生，他们被称为“方法学家”。这些人认为，各种各样的疾病，虽然症状各不相同，但是病因都只有一个。于是他们质疑，为什么要用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治疗方法和药剂呢？完全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治疗所有的疾病嘛！这真是天才般的想法！可惜的是，这群“方法学家”最辉煌的时候，也不过是当了罗马皇帝的御医。之后，他们就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无独有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中，也有人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觉得可以找到一种哲学思维方法，让所有的哲学问题迎刃而解。这些哲学界的“方法学家”生命力远比医学界的同行来得长。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此深信不疑。

可是，当我们去细细分析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哲学大师是怎么进行思考和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五花八门。我的这本小书，就意在向大家揭示这一点。不要以为，只有在有关生命意义的哲学争论中，才需要用到哲学思维方法。凡是有讨论和争辩的地方，不管是媒体上的论战，还是伙伴间的斗嘴，哲学思维方法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历史上第一个把哲学思维方法收集成册的人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这本册子叫做《论题篇》，是他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写这本册子的目的很简单，他希望能够当时的最高学府——柏拉图学园的辩论中获胜。

《论题篇》包含了大约三百个思维方法，这些方法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讨论场合，而且无论什么话题都可以用得上。亚里士多德成为老师后，这本书就成了教材。这本书既是有志于哲学的年轻人的入门书，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当时的雅典人崇尚独立思考。在他们心目中，一位学者不仅要知识渊博，更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者不该人云亦云，相反，他们把思想当作游戏，不断玩出新花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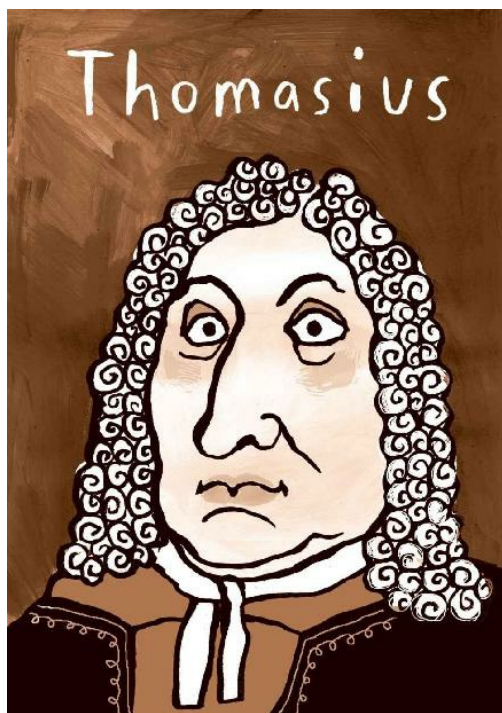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论题篇》很难读懂：内容繁杂、文字极不流畅，行文风格犹如索然无味的电报。此外，亚里士多德的关注点集中在如何下定义上，因为这是柏拉图学园中最为重要的讨论话题。再加上书中的事例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十分陌生，必须经过解释和破译今人才会懂得。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收集思维方法。思维活动的关键点不在于知识，而是哲学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在于提出观点、寻找论据，而更在于想象力。参与哲学思考，其实和参与一个富有娱乐精神的游戏是一样的。

本书的出发点和《论题篇》非常相似，就是要看一看哲学家们在工作时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哲学讨论，就会发现，我们通常想象的讨论，即从一个论点向另一个论点有条不紊和理性地推进，是非常错误的。在讨论中，他们不仅会提出和解释观点，而且也会狂叫、喝倒彩、开怀大笑、唱歌和咒骂。思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死气沉沉。思考的多样性不仅令人惊讶，而且还永无止境。

这本书中出现的思维方法只是沧海一粟。不过，你很容易就能顺着它们找到更多的思维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每种方法单独成章，但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希望大家不要割裂地看待它们。书中的例子一部分取之于政治演说，一部分取之于文学作品，更多的案例则来自于日常生活。所以在说明思维方法的对话中，不仅会出现苏格拉底，还会出现张三李四这样的普通百姓。

讲述任何思维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减少对他人观点的依赖，开辟奇思妙想的新渠道，从而更加敏锐地做出判断。简单地说，就是让大家学会独立思考！



/托马西乌斯/

【加V信：209993658，免费领取电子书】

关注微信公众号：**njdy668**（名称：**奥丁弥米尔**）

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

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

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公众号“书单”书籍都可以免费下载。

公众号经常推荐书籍！

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言！

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奥丁弥米尔（njdy668）：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

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

【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

1. 权威，信还是不信？

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数学家莱奥哈特·欧拉（1707—1783）在《给一位德国公主的信》中区别了三种类型的“真理”：

- 我们相信这些事物，因为我们能感知这些事物。
- 我们相信这些事物，因为我们通过思考发现了这些事物。
- 我们相信这些事物，因为这是其他人告诉我们的。

在启蒙运动时期，以上分类广为人知。并且，自那以来，第一种做法获得了格外高的声誉：只有自己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人们才能相信是真的；第二种也很不错，而第三种则被看作是三流做法。仅仅因为其他人这么说，你就相信了，这种做法很容易遭人诟病。你怎么能断言，别人说的话都是对的呢？

话虽这么说，但奇怪的是，我们相信的大多数事物不属于第一种或第二种类型，而恰恰是第三种。许多事情，我们并没有亲身检验过，或亲眼所见，而是旁人告诉我们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基于道听途说。我们知道，太阳比一个干草垛大；人是从猿类，而不是从食蚁兽变来的。这些知识恰恰是我们从书上得来，或者听别人说的。孩子们一开始相信妈妈爸爸说的话，然后相信老师说的话，再以后则相信教授和报纸。许多人到老了又宣布，他们谁也不相信，除了自己的狗，没有人是可信赖的。这样一来，钟摆又摆向另一个极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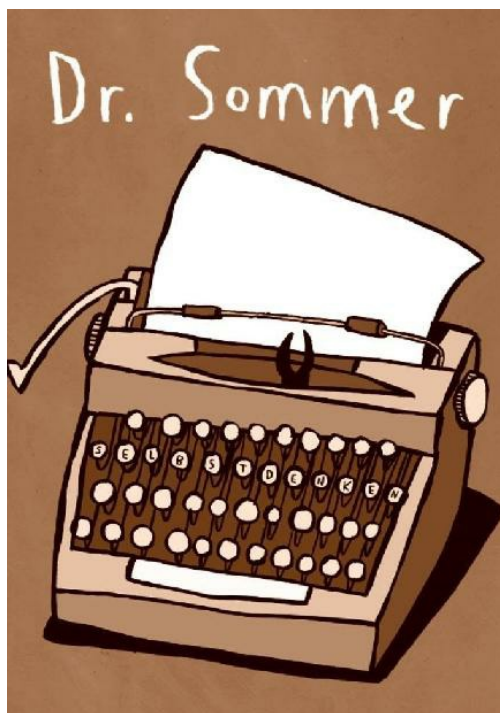
相信别人，并非不合情理，再说常常也没有别的可能性。那么该如何看待听来的事情呢？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看看说话的人是谁。一个来自名声好的社会圈子的观点，其可靠程度犹如一个挚友介绍的人。

经典大师和南太平洋的部落头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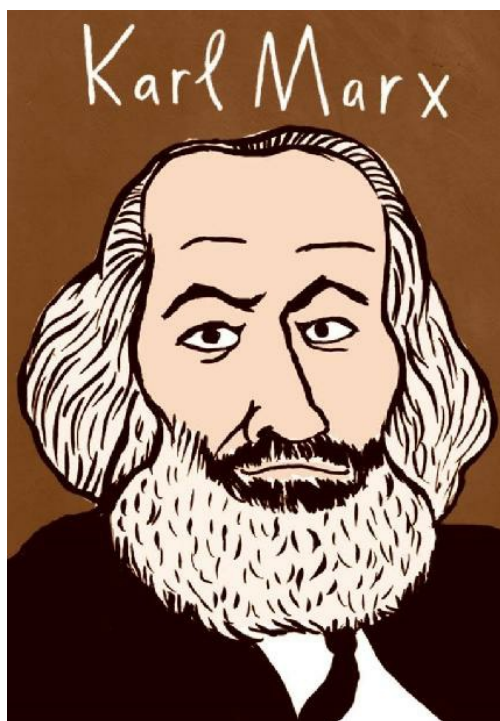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尝试让自己的看法获得某个名声好的圈子的认可，进而说服更多人。具体的做法就是，把这种看法和某个人或机构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或机构必须是我们所要说服的对象熟悉的。权威可以使某种观点成立。在广告中，大家常常称之为“用名人做背书”。当然人和东西的联系必须具有说服力，不是任何一个名人都适合为某种产品代言。

例如，如果舒马赫^[2]把一种哲学观点绣在自己赛车时戴的帽子上，就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每一个组织和社区都有自己的权威，而哲学的权威就是那些经典大师。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交过手，并从交锋中脱颖而出。即使这些大师早已作古，但在哲学讨论中，如果把一种观点同康德或柏拉图联系在一起，依然会更容易被他人接受。

但是，对大师们的尊敬使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哪些人成为大师，而哪些人被遗忘，这之中有不小的偶然性。一旦一个人在集体记忆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功绩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卡尔·马克思（1818—1883）就是一例。许多影响历史的名句，例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工人们失去的无非是他们的锁链”或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们都以为出自马克思之口。事实上，关于宗教的那句话是德国诗人诺瓦里斯（1772—1801）说的；关于锁链的那句话出自法国革命家让·保尔·马拉（1743—1793）之口；而最后一句则是卡尔·沙佩尔的话，他是马克思的战友，却鲜为人知。因为马克思引用了这些话，读者就把这些话记在了这位哲学家名下，而真正的作者却被淡忘了。名人的精神火花在他们死后，以这种方式变成熊熊大火。



/佐默大夫/



/卡尔·马克思/

某种程度上说，古典大师不过是人为的产物，后人把他们放在了纪

念碑上。而还有一些权威则完全是虚构的，例如那个善良、年长的佐默大夫（他自1969年以来，在一本杂志上为年轻人提供咨询）。实际上这位大夫根本不存在，而是一个由编辑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在回答问题，现在这本杂志也不再掩盖这一秘密了。

相比之下，“南太平洋部落头领图依阿维”的欺骗性要大得多。图依阿维的观点都收录在一本名叫《帕帕拉吉》的书中，他从一个海岛居民的角度出发，与欧洲人（也就是帕帕拉吉）展开辩论。这个名字奇怪、行事风格又非常特别的部落头领喜欢评头论足。关于书籍，他写道：“欧洲人把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好是坏，一律都扔到很薄的白垫子上。这非常糟糕，而且是灾难性的。帕帕拉吉说：‘这些东西要印出来。’他们把许多这样的垫子装订在一起，称之为书，然后运到国家的每个地方。接受书上思想的人，很快都会被传染。人们吞咽这些白色垫子就像吃甜美的香蕉。这些白色垫子堆放在每个房子里，把箱子都塞满了，男女老少都啃这些垫子，犹如老鼠啃甘蔗。结果，只有少数人能像正直的南太平洋萨摩亚人那样理智地、自然而然地思考。”

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反感钱：“如果你同一个欧洲人谈论对上帝的爱，他会撇嘴和微笑，讥笑这一想法单纯。但如果你给他一枚光亮的硬币或一张纸钱，他就会两眼发光，流出口水。钱是他的所爱。钱是他的神。”

尽管是以孩子气的口吻写来，这本书仍显得有点老套和保守，但这并不妨碍它获得成功：这本书成为环保运动的《圣经》，而且卖出了几百万册。当然，现在已经证实，这些言论并非出自某个波利尼西亚居民之口，而是一个叫埃里希·朔伊尔曼（1878—1957）的人杜撰的。在封面上，他的名字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现。他于1914年去往萨摩亚，在那里待了不满一年，然后途经美国回到德国，1920年在德国出版了《帕帕拉吉》。他在书里提出了文化批判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时很新潮。一开始这本书没有获得什么反响，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朔伊尔曼的“思想垫子”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出版社赚得盆满钵盈，并竭尽全力要掩盖这一骗局，因为让一个南太平洋部落头领来抱怨欧洲，要比一个对文明感到疲倦的德国人这么做有意思得多。因为创作了图依阿维这个人物，朔伊尔曼被评价为“触碰了深层次的世界观”。自那以来，这位想象出来的部落头领在关于文化批判的讨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负向权威

正如有些人的观点和看法受人尊重，有一些人却让大家唯恐避之不及。来自“名声好的社会圈子”的观点会被人看重，但与“名声坏的社会圈子”相关联的观点，就会遭人轻视。

但“名声坏的社会圈子”是什么意思呢？正如每个人群有自己的权威，每个人群也有自己的负向权威。我们必须知道哪些是负向权威，这样就能成功地把一些观点逼入“角落”，从而贬低它们。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第三帝国^[3]和其代表人物。曾在第三帝国出现过的看法很容易就变得臭名昭著，例如有关安乐死的讨论。这样一来，在公众讨论中大家就会尽量避开这些看法。所以，“在第三帝国人们也会这么说”这句话如今在许多辩论中，都可以用来把对方将死。

猎巫者和启蒙者

建立在权威之上的论证总是会招来争议。人们可以找来持相反观点的其他权威，也可以用其他权威来说明，为什么从前的权威是不可信的。人们也可以做得更彻底，对所谓“援引权威看法作为依据”的做法表示怀疑，然后指出，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哲学史上有过不止一次反对权威的运动。最著名的那次发生在启蒙运动期间。启蒙者主张独立思考，并批评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人看法的习惯。他们认为，这么做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决定。十七世纪之所以出现启蒙运动，不是源于空洞的理论，而是因为人们终于从集体猎杀女巫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反对烧死女巫的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启蒙运动。

这场斗争中的第一个英雄是法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他是莱比锡大学的法学教授，本来他也相信女巫的存在。他说：“当时我对存在女巫的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发誓认为，女巫们和魔鬼生出精灵，并随之一道飞往布洛克峰。”1694年，托马西乌斯曾对一桩女巫案进行审判，他宣布被告有罪，但整个事件出现了不寻常的变化。案件的评估报告不能说服他的大学同事，他们继续调查，并出乎意料地向出了名严厉的托马西乌斯提出几个问题。他们想知道，托马西乌斯根据什么样的线索得出这一结论。于是托马西乌斯陷入困境。最后，理念先进的法学系做出决定：无罪释放那个所谓的女巫。

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挫折使托马西乌斯丢尽脸面，但也促使这个法学家深入思考。过去，他盲目地相信有关女巫和魔鬼的传言。后来，他从扫罗（逼迫耶稣的人）变成了保罗（信徒），并成为德国最有名的反对审判女巫的人。

1702年他出版了《有关巫术这一弊病的简短准则》，这些准则要求停止一切对女巫的审判，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女巫。他写了大量文章，并押上了个人名誉，最后斗争终于获得了成功：首先在普鲁士，随后德意志帝国所有的州都终止了猎杀女巫。托马西乌斯并不满足于此。他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如自己怎么会相信谣言？这一切是怎么发生

的？这样他就成为了德国第一个启蒙者。

这位莱比锡的法学家最早提出了有关偏见的理论，这一理论日益对整个启蒙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把偏见分为两类，一类是迷信权威的偏见，另一类是因为过早下结论而造成的偏见。这一创见如同一支疫苗，让人们更容易对偏见产生免疫。

因迷信权威而产生的偏见，在托马西乌斯看来是最顽固的偏见：“一个人如果出于对权威的热爱而接受了某个错误的看法，他将很难摆脱它。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一旦迷信权威，尽管他们说不出反对意见有何不妥，但也死活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理解力不足，无法驳斥反对者，而提出这一看法的权威本人一定能更好地为自己辩护。”

人出于本性很容易怀有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托马西乌斯认为，原因在于儿时的无助。小动物出于本能很快就能适应环境，而孩童却要倚靠父母很长时间。托马西乌斯在这里找到了人容易迷信和产生偏见的渊源：人们在看到许多东西以前，就听说过这些东西。“孩子们先要理解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事物的，然后才会自己去思考这些事物。孩子们的轻信是出于本能，而且他们也必须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会犯几百万个错误，却只掌握少数真理的原因。”自托马西乌斯以来，把自己从错误、迷信和偏见中间解放出来是启蒙运动最本质的目标。这也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任何时候都要独立思考，这是最重要的准则。”其目的在于，不要相信二手或三手的观点，而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启蒙运动的高潮发生在十八世纪，但在此前就已经开始，托马西乌斯反对迫害女巫的斗争便是其开端。

启蒙运动对权威的批判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很快人们就发现，自我思考的意义是有限的。启蒙运动唤起了人的最高期望，但反驳者却说，就连那些最正宗的启蒙者也无法纯粹地独立思考。例如，康德向启蒙运动提出的那句“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性”也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从一句古老的罗马谚语“Aude sapere！”翻译过来的，这句话曾经出现在贺拉斯^[4]的文章里。

独立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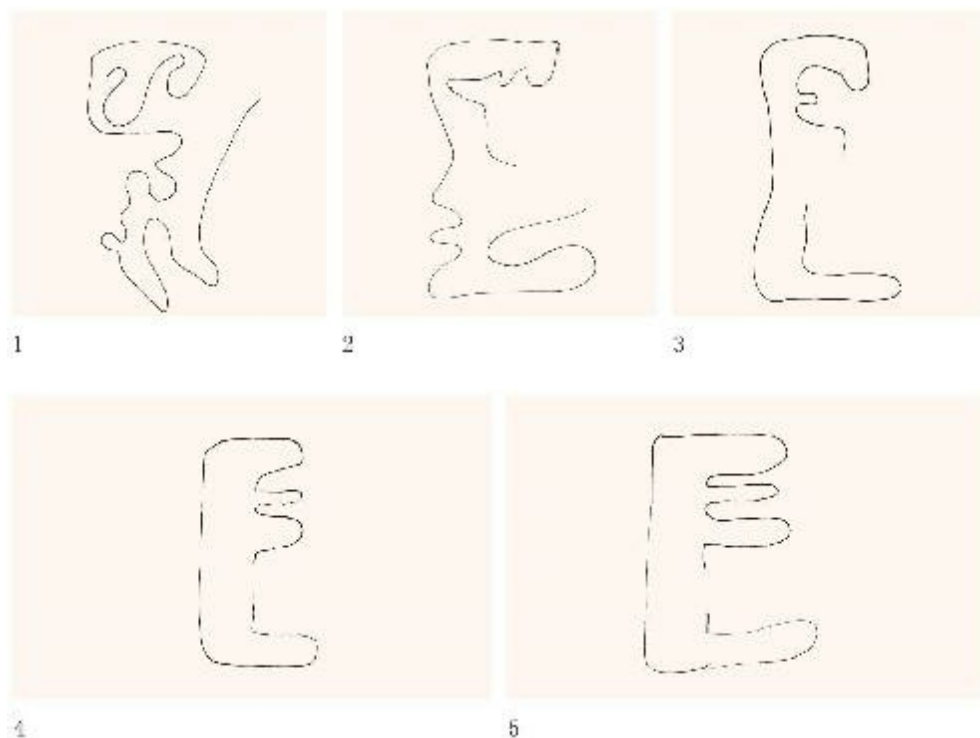
尽管经历了启蒙运动，但人们对权威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在某些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很明显，现代人要比三百年前的先人相信更多听来的事物。个人思考受到他人看法和观点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大。这些看法和观点都没有经过我们自身的检验，而且也无法检验。这绝不是因为人们懒惰，尽管在个别的人的身上不能排除这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观点和信息泛滥使人们无所适从，鉴于社会分工，人们必须依靠专家。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这章开始的话题：说服人们相信，第三种认知方式要劣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启蒙运动的梦想就是要摒弃第三种方式，而以独立思考取代之。

但这一点不可能全部做到。真这么做的话，其结果是，大家得放弃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去沙漠里隐居。而这还不够，即使在沙漠里，人还会受回忆的影响。这样一来，走向启蒙最极端的道路就是用一个擀面杖不停地敲脑袋，直到脑袋这个“硬盘”四分五裂为止。人们能以这种方式摆脱所有偏见，但同时也丧失了思考能力。所以更好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独立思考不可能全部奏效，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从头做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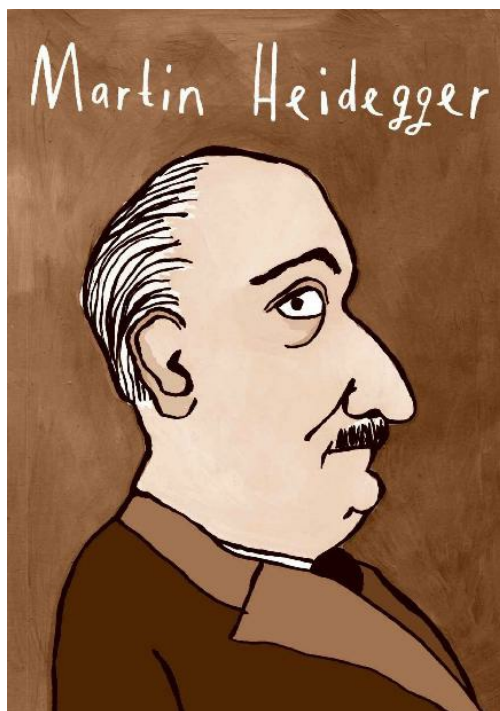
游戏：静默的信件

1. 去地下室的旧物堆里找出你能找到的最奇怪的东西，可以是一个旅游纪念品、一团灰尘或一条细绳。
2. 画一张这些物体的草图。
3. 给一个朋友看这张草图。然后把纸叠起来，请你的朋友通过回忆把这些物体画下来。
4. 然后拿上这张图，去第二个朋友、邻居或熟人那里，请他们根据对第二张画的记忆，再画一张图。这就像“传悄悄话”的游戏，只是这次不是传话，而是画画。
5. 这样重复六次到七次。



这个游戏源自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克·巴尔莱特（1886—

1969)的一次实验。他想知道，一个信息或图像经过多个人的头脑后，还会剩下什么。结果图像信息出现了逐步退化，细节丢失了，最后出现了一个符合这组人思维和观察习惯的示意图。哪怕没有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但对于“这里曾经是什么”的问题，最后也只剩下含糊不清的信息。因为在一连串叙述和画画的过程中，许多细节丢失了，与此同时，新的细节（也就是符合叙述人自己的看法、并使之更突出的细节）被添加进来。



/马丁·海德格尔/

2. 为什么看得清，才能想得明？

“静默的信件”这个游戏告诉我们，如果许多人一个接一个看前人看过的东西，而见不到原始样本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最初的印象变得模糊不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如果原始样本非常复杂并含有多层意义，就更是如此了。

利用这一游戏，我们可以研究集体记忆是如何起作用的。该游戏表明，大家都倾向把一部分记忆内容变得“更易消化”，即把这部分内容概括化。如果这部分内容非常复杂，并具有多层意思的话，记忆中的画面就会极其迅速地脱离原样。人们不仅会去掉一些东西，还会增加一些东西，例如猫的脖子上多了一根丝带，或者脸上多了眉毛。总而言之，原始样本会逐步失去其特点，而越来越适应生活中通常的画面。这样的概括化在叙述和讲述故事时也经常出现，一件事情通过转述就变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

这种故事在哲学界也很普遍。令人奇怪的是，这一现象尤其会在“直接”与现实有关的地方出现。议论感官世界的哲学文章常常会含糊不清和粗糙。本应该清醒和具体的地方，大家看到的却是干巴巴的内容。其原因在于，哲学家们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变得生动和多姿多彩，会运用一些例子和故事，可这些例子和故事常常是抄袭来的，并且已经多次被人引用。那个被抄袭的人自己也是抄袭者。有时，必须追溯到几百年前，才能找到原作者，也就是通过自己的观察而得出结论的作者。如果文章涉及“偶然”的概念，需要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可以肯定地说，迟早会提到从屋顶上掉下一块砖这类事情；如果是涉及“物质”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一张写字桌；如果是讨论“种类”，很长时间人们只知道举玫瑰的例子。事例从一个作者传到另一个作者，就像一条坐满落水者的船里，每个人只能闻一下所剩的最后一块饼干。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一定程度的匮乏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认真观察非常重要，并要用现实来衡量一下事例，用“这可能是抄袭来的”怀疑目光来审视这些例子。当然，变换事例，用新的取代旧的也很值得，这就是现象学派的目的。这一学派是由胡塞尔（1859—

1938)创建的。“回到事情本身”是他的座右铭。现象学家带来一种新的描述事物的文化，谢天谢地这一文化同其他哲学的抽象讨论很不一样。胡塞尔的学生们以几近病态的狂热，精确地描写感受、思维过程或知觉。许多有关感受、身体和意识的老观点被发现是臆想出来的，是“构建”的，而不是（按现象学家的语言所说）“符合现象”的。“胡塞尔打开了我的眼睛。”海德格尔（1889—1976）曾用这句话向他的哲学老师表达敬意。现象学不仅影响了哲学，而且还影响了数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也使文学受益匪浅。现象学家和哲学家萨特（1905—1980）在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出于政治原因，他拒绝了这一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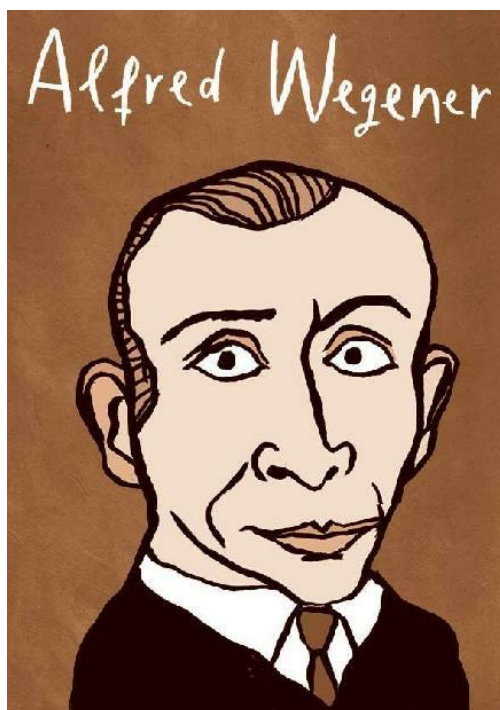
当然不仅只有现象学家才认识到，思想家偶尔离开书本，把目光投向世界何等重要。就这一点而言，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人们通常把莱布尼茨看作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从他的哲学立场出发，理智比感官的知觉更为重要。但他比许多经验主义者更具有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的能力。这体现在他与笛卡尔（1596—1650）的争论中。笛卡尔认为，外部世界的物体唯一可以被清楚辨认的地方，就是可以用几何图形确定的外形。所以数学的任务就是要可靠而令人满意地描绘外部世界。这一观点至今仍被许多自然科学家所认同。而莱布尼茨则写道：“笛卡尔所谓的外形绝无可能存在，人们只是在马马虎虎地看一下时才会认为，物体的形状是可以看清的。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每个物体都有无数弯凹之处和细微的裂口，而这些东西是几何形式无法包容的。所以数学对现象的描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是抽象概括。”通过简单观察，莱布尼茨就颠覆了看起来很有根据的重要观点。



/砖/写字桌/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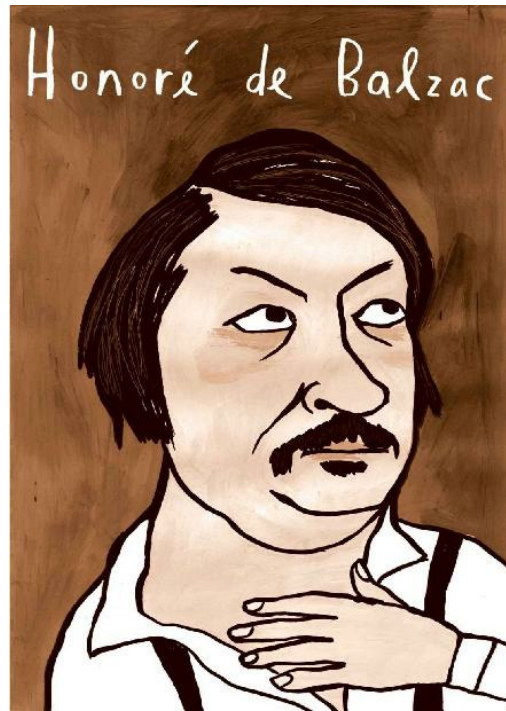
观察也包括人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看到的東西，而不是通过解释去否认它们。这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因为每个人通过其所受的教育已经有一种固定的观察模式，这一模式决定了哪些细节重要，哪些细节则不重要。那些看到了旁人没有看到的東西的人，可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

难。在这方面，我知道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人阿尔弗雷特·魏格纳。他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理论。



/阿尔弗雷德特·魏格纳/

魏格纳仔细地观察了大陆海岸线，并发现了每一个孩子都会注意到的东西：南美的东海岸完全可以嵌入西非海岸线的海湾。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一些海岸线稍加移动一下，欧洲和美洲的大洋就连起来了。当然，发现这一点的魏格纳完全也可以耸耸肩，对自己说，这只是巧合。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提出了一个理论：五大洲曾经组成了一块巨大的陆地，是后来才破碎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魏格纳到处收集证据，例如他指出南美洲和南非动物种类惊人地相似。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专业人士看成胡思乱想的人。首先他们指出，魏格纳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说明五大洲曾发生过令人惊讶的运动。他的观点与当时地质界的主流理论不相符合，所以就遭到了排斥。1930年，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魏格纳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上进行测量，结果不幸去世。直到三十年后，地质学家才提出了证明大陆漂移理论的有力证据，而今天这一理论得到普遍承认。



/巴尔扎克/

3. 让“事实”说话？

掌握事实的人总是稳操胜券。事实就是事实，没什么可吹毛求疵的，至少一般人都这么看。但事实真的不能改变吗？还是说，一旦事实落到专家手里，就可屈可伸，变得有可塑性了呢？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一些报纸的大标题和文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那就是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会迥然不同。即使报道者与该事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在报道中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表现中立的立场而已，不同的人还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有什么比枪声更短促、更不容混淆呢？可每个人听到的枪声都不一样，而且复述的方式也不一样。德国人说peng，美国人说crack，西班牙人说pum，英国人则说bang。动物的叫声在人们听来也各不相同。狗怎么叫？德国人说是wauwau，而英国人听到的是bow-wow，美国人是how-how，法国人是ouâ-ouâ，古希腊人则是αv，αv。所有这些叫法都有相似的地方，但绝不完全一致。人们在毫无用心的情况下，重复他们听到的声音已是如此不同，一旦抱有什么目的，其反馈的差别就可想而知了。

人们在向他人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怀有一定的目的。就连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亨弗莱·鲍嘉（1899—1957）都说：“事物可不像看上去那般平静。”确定的东西只是看上去很确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改动。没有人会禁止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介绍事实，就如同下面这个古老的笑话：

一个耶稣会修士和一个方济各会修士坐在车厢里，他们在读每日祈祷书。这时，耶稣会修士拿出一包烟。

方济各会修士：这太不可思议了，读《圣经》的时候是禁止抽烟的。

耶稣会修士：哦，我是得到特殊批准的。

说完，他点起一支烟。这让坐在对面的方济各会修士非常好奇。

方济各会修士：我也能得到特殊批准吗？

耶稣会修士：当然。你只要去向修道院院长请求。

不久后，他俩又相遇了。

方济各会修士：院长一口回绝了我！

耶稣会修士：怎么回事？

方济各会修士：我完全按你的说法做的，我去院长那里，问他是否可以在祈祷的时候抽烟。院长听了勃然大怒。

耶稣会修士：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去院长那里的时候，我问他，是否可以在抽烟的时候祈祷。他祝福了我，并激动地对我说：“当然可以！”

在祈祷的时候抽烟或在抽烟的时候祈祷，这两种说法只有细微的区别。但就是这个细微的区别，引导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以这样的方式来欺骗他人，能算虔诚的行为吗？可那人并没有说谎，只是稍稍改动了一下句子，而这毫无疑问是允许的。

对比和比较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选择说话的内容来影响他人，还可以通过对比的手法达到这一目的。对比有助于对事实进行归类。同时，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描绘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售货员不愿谈论商品价格，而大谈特谈价格同商品用途之间的关系。转眼之间，一种昂贵的商品就变得“物有所值”了。

房地产商常常在他们的楼盘中保留一套住房，这套住房不仅难看，而且贵得吓人。当然，所谓的“丑小鸭”不是用来出售，而是用作对比的。顾客看过这套房子后，就会觉得真正卖给他们的房子要好得多。因为漂亮的东西摆在丑陋东西的旁边就会变得更漂亮。如果把更丑陋的东西放在旁边，那么原本那个丑陋的东西也会被人接受。

售货员是名副其实的通过比较和对比来回避真实的艺术家。自古以来，哲学家也清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事实比较后，才能归类。哲学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服他人来购买这样或那样东西，而更多想要别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或那个看法。哲学家们经过几百年的锤炼，已经具备一种能力：他们能使那些不愉快的事不再让人痛苦。哲学安慰（*Philosophische Trost*）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哲学安慰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塞内加^[5]（公元前4—公元65）写给他母亲的安慰信到莱布尼茨（1646—1716）的《神正论》，都用到了这种手法。

不管怎么说，哲学家安慰自己和他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事实，只是把这些事实放入新的上下文关系中。谁敢说，通常描绘事实的方式就是唯一的方式呢？

古典哲学范畴内那些无法令人高兴的话题中，自古以来居于首位的就是“人必定会死”这一事实。但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因为破产而去乞讨，却比死亡更触霉头。破产和乞讨是紧密相连的。如何才能使没钱这一事实变得可以忍受呢？难道这不是挥之不去、赤裸裸的事实吗？

哲学家的点金术，即通过思想的力量，完全可以使贫穷变成富裕。

苏格拉底在回答“人如何能变得富裕”这个问题时，说道：“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欲望。”这一令人吃惊的回答毫无疑问非常精辟。这个回答让人们用新眼光来看待贫穷这一现象。苏格拉底没有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贫穷简化成缺钱，而是把这个现象同人的欲望和要求结合起来。这样一来，一个不可变更的事实就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关系，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多种可能性。

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这一想法身体力行。他生活非常俭朴，也没有财产，不过他那些富裕的朋友们经常邀请他参加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上自然少不了狂饮暴食。

后来，这种穷极潦倒的生活艺术变得越来越完善。例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不仅没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他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债台高筑。必须还债这一事实，让他感到非常压抑，为了安慰自己，他写下了不朽的作品《论不花一分钱就还清债务和满足债权人的艺术》。这一标题就暗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靠借债生活的同时，不要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只要把这件事放在正确的上下关联中就能做到！巴尔扎克非常智慧地发现：“向那些囊中羞涩的人借钱，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加重不幸。但如果欠富人的钱，情况就恰恰相反：那是为苦难者找到平衡，并为社会公正作出贡献。”如果这么看问题的话，我们甚至还会认为，欠债不还是穷人应尽的责任呢。很明显，在牵涉到钱这样严肃的问题时，关键还是要坚定地重新审视事实，并通过这一方式给予世界和现实一副新面孔。至于这样的解释能否被其他人接受，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数字

十六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越来越重视数学的作用，似乎出现了一种可能性，通过数字能客观地描绘每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计算至上！莱比尼茨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来算一算，这样就能在争辩中找到真相。数字是最确凿的事实。数字可以被贿赂吗？”

几乎不能。修辞学的国度会通过科学的新手段，通过数字、计算方法、表格和图表不断壮大，而永远不会被废除。令人奇怪的是，数字比文字更容易被人任意摆布。因为数字总是在相关体系中才能产生意义，而狡猾的专家可以任意改动数字，却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所以自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越来越重视数学的作用，各种争论不仅没有减弱，相反在鉴定和反鉴定方面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所以，如果有人宣布要对某件事情“非常理性地用数字”来观察的话，大家一定要分外小心。因为没有东西比所谓无辜的数字和表格，更适合用来进行极端的、以利益为目标的描述。人们可以通过数字，而不是文字，任意地把小变大，把大化小。数字，可以开蒙，亦可将人蒙蔽。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工具是百分比。那些学会把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联通过百分比来表述的人，掌握了一种强大的工具，从而能把小事放大或让巨物缩小。例如，如果人们得知，自工业化以来，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比例从0.028%上升到今天的0.038%，有人就会以为这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如果有人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自工业化以来提高了30%，这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使用百分比，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百分比的百分比，是非常受欢迎的手段。技术有其好的一面：它可以帮助人们看到复杂问题的概貌，也许还能给予所谓小事更多关注。但技术也可以蒙骗人。例如，德国邮政储蓄银行在一份已经发行多年的杂志里列了一个“储蓄计划”，这一计划告诉大家，除了不那么激动人心的1.5%基本利息外，他们还将支付一笔一开始很少，但会逐渐提高的额外利息。如果把存款在邮政储蓄银行存二十五年，这个额外利息正好就是100%！

人们会觉得这太棒了，以为二十五年后存款会翻一倍。可是，那些印得很小的字会告诉你，这里指的是基础利息的100%，也就是说，二十五年后可以得到3%的利息。对储户来说，这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

引用

事实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引用旁人说的话或写下的东西。在许多讨论中，例如在家庭争论、政治辩论、副刊的争论或哲学谈话中，这种类型的事实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把其他人说的话、发的牢骚或看法变成我的话、我的牢骚和看法的基础。这也正是让人感到棘手的地方。

梅厄先生：你用了些什么香料？

梅厄太太：这汤不合你的胃口！

梅厄先生：我没有这么说！

梅厄太太：可你说了：“你用了些什么香料？”

梅厄先生：我只不过问了一下用了什么香料，这不能问吗？

梅厄太太：你这个人可真难侍候。

梅厄先生：以后我得把我说的话都录下来才行。

只要一个人说了什么，其他人就试图为己所用。如果这些话是写下来的，其他人就可以去读他写的东西，并逐字逐句地引用。这是一种客观的做法，而通过“注脚”便能准确无误地注明引用的出处，从而更增加其客观性。在文章中，被引用的话是用引号标出来的，意思是，引号里的话确实是说过的。引号是客观性的标记，并能使那些好挑毛病的人无话可说。但引号更多是提醒人们要特别关注出现引号的地方：因为那些貌似客观的引用，很容易被人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即便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也免不了这样。人们可以通过引用，使新的上下文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引用的内容全新的意思。那么那些被引用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们当然都反对这样的做法。下面要介绍几种典型而常见的对引用的不同看法。

断章取义

引用他人的话，是为了让说话人承认自己说过的话。而被引用的人当然不愿轻易地被别人抓住把柄。如果他还能抵抗的话，就会否认，或者声明，这些话被断章取义了。这一反对的做法可谓历史悠久。路德（1483—1546）用中世纪德语写的一番话就证明了这一做法有多么古老。路德指责他的对手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希尔罗尼穆斯·埃姆塞尔（1478—1527）时说：“他随心所欲地引用我的话，再加上他的概念，完全不顾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

那时还没有发明注脚，那些要引用他人看法的人，只需要含糊其辞地提一下出处就行，今天则要求人们重复原话并注明准确的出处。这么做是否就减少了断章取义的做法呢？

绝非如此。下面这个生动又典型的例子会说明，今天人们仍然会兴致勃勃地只从别人的话里摘取最适合自己的想法的内容，这个例子源于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批评家之死》所引发的争论。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位作家一生中的几天，作家的名字汉斯·拉赫（拉赫的发音类似德文中的“笑”）听起来有点奇怪。他同批评界泰斗安德列·埃尔·柯尼希势如水火，后来批评家失踪，作家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这部小说在正式出版前本来要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连载，瓦尔泽的许多小说都曾在这家报纸连载过。可这次，报纸发行人弗朗克·希尔马赫写了一封公开信给瓦尔泽。1998年瓦尔泽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希尔马赫还在颁奖典礼上极力称赞瓦尔泽。他在公开信中写道：“亲爱的马丁·瓦尔泽，我们不会连载您的这本书。”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他的结论是，这本书是一次“判决”，是对当代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

基的一次清算，书中柯尼希的原型就是拉尼茨基。他还认为，这本书是反犹太主义的，并以一种特别低级的方式反犹，其关键不是要杀害一个批评家，而是要杀害一个犹太人。

对于证明这一点，小说中的一段引言起到了重要作用。希尔马赫写道：“亏您想得出来，让那个极其愤怒的作家用希特勒的话‘从零点起予以反击’来威胁评论界的泰斗。当然，这么一来更增加了您的嫌疑。”这句话使人隐隐约约地回想起德国对波兰宣战，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宣布对波兰开战，原话是：“自五点四十五分起予以反击。”弗朗克·希尔马赫利用了小说的这个片断，作为攻击瓦尔泽的借口。

他写道：“您在小说里讽刺性地模仿的话，是阿道夫·希特勒向波兰宣战时所说的，这也是对当时生活在波兰的拉尼茨基及其家人宣战。因为这句话，只有为数不多的欧洲犹太人幸免于难。而这些幸存者中，只有少数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那里发生起义后，活下来的人就更少了。能在波兰一个地下室里活到战争结束的犹太人则少之又少。所有这些幸存者里，今天只有很小一部分依然还活着，其中两个就是今天八十二岁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和他的妻子特欧菲拉。他们活着可以说是违背所有概率论的。请您理解，我们不会连载一部试图复原这一谋杀的小说。”

我们感觉到这一攻击的尖锐性，《法兰克福汇报》仅仅根据一个引用就发起了对瓦尔泽的攻击。这篇文章刊出后引发了一场大辩论：瓦尔泽是否为反犹太主义者？接着，事情出现了反转；然后有人发现了不利于瓦尔泽的新线索；随后，又出现了反驳新证据的证人……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场论战中采取什么立场，但为了说明问题，大家有必要看一下小说的原文，并看一下弗朗克·希尔马赫是如何引用的。

在瓦尔泽的小说里，没有直接出现“反击”这句话，而是书中的叙述者多次提到，他曾经读到过这句话，并且恰恰是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里。在这篇（虚构的）文章里，提到了作家汉斯·拉赫醉酒后的一个丑闻。拉赫的新书《没有脚趾甲的女孩》被柯尼希在《诊断》节目中批评后，他大动肝火，辱骂了评论家柯尼希。

叙述者写道：“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读到，汉斯·拉赫马上要去

找柯尼希算账。两个服务员把他拉出去后，他喊道：‘忍受的时候结束了。柯尼希先生要小心。从今晚零点起予以反击。’他的话除了让在场的那些文学、媒体和政界人士感到奇怪，更引起了他们的惊讶和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柯尼希先生的祖上里有犹太人，其中也不乏大屠杀的牺牲者。”

上面就是那段原文。这就是说，在原文里，这句话并不那么杀气腾腾，也不像希尔马赫写的那样，故意要引起公愤。原文中的话听起来更多的是荒诞，就像作家的名字和小说的名字那样奇怪。所以，那些保护瓦尔泽，不让他戴上“反犹主义”帽子的人反驳道，希尔马赫的引用是预谋的。《法兰克福汇报》对此的回答是：很明显，瓦尔泽的话是脚踩两只船，好给自己留有后路。

感到混乱的读者看到这里，肯定想从这场辩论中撤离。他也许会想起小说中某个地方出现的一句明智的话：“根本就没有事实，有的只是想象。”

永恒的误解

引用常常会引起被引用者不满，以至于有些人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反对这么做。小孩子们和重要的政治家喜欢采用的对策就是声称：“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个！”如果无济于事，他们就只能退一步，说道：“我记不起来了。”如果这也不管用，就会加上一句：“这完全是误解！”

哲学家们也特别喜欢用“这完全是误解”保护自己。海涅（1797—1856）甚至认为，哲学家显然觉得自己总被人误解。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文中，他写道：“当莱因霍尔德^[6]同他的看法一致时，费希特^[7]声明，没有人比莱因霍尔德更理解他了。而当莱因霍尔德后来和他分道扬镳后，费希特又说，莱因霍尔德从来就没有理解过他。当费希特同康德有分歧时，他写道：‘康德自己都不理解自己。’我在这里触及的是我们哲学家滑稽的一面。他们总是抱怨自己不被理解。黑格尔临死前说道：‘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随即他又很不高兴地说道：‘就是他没有理解我。’”

曲解

被人理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也可通过细微的改动制造出全新的意思。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个好争辩的法兰克福哲学家就是运用这一技巧的大师。在所谓的历史学家大争论中，他就想利用这一技巧，证明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贝尔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法西斯主义思想。

对于证明这点，引用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引用是要证明希尔格鲁贝尔的“倾向”，当然是一些非常值得怀疑的倾向。哈贝马斯对这些引用所作的改动极其细微，却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人们只有逐字逐句地与原文对照后，才能发现他的“操刀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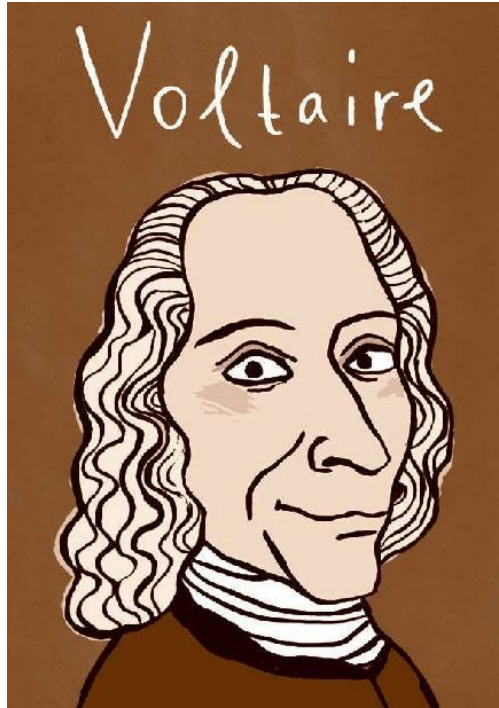
那么这里涉及什么问题呢？希尔格鲁贝尔在他的一本题为《双重毁灭》的书中，描写了纳粹德国的最后几天。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纳粹的高官中，有些人在最后守卫战绝望的困境中，在面临灭亡和逃跑的困境中，经受了考验。其他的一部分人则以一种可怜的方式束手待毙。”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段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落在一个有经验的知识分子的手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段话一下子就变成了罪证。哈贝马斯作了一个细微的改动，其结果就是把希尔格鲁贝尔变成了一个纳粹同情者。哈贝马斯写道：“希尔格鲁贝尔是要从勇敢士兵的角度、从绝望的平民角度和‘经受考验’的纳粹高官的角度来写历史。”

这段话里唯一引用的词就是“经受考验”。除此之外，哈贝马斯写的那段话里没有任何希尔格鲁贝尔的原话。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小改动。在哈贝马斯的手中，动词“经受考验”变成了形容词“经受考验的”。在原文中，这句话只有一个解释：即几个纳粹高官在灭亡的那几个星期中经受了考验（例如拒绝接受命令），而哈贝马斯有预谋的引用则可解释为，希尔格鲁贝尔把纳粹所有的官员都看作是“经受考验”的人员。正因为哈贝马斯每次对引文的改动都微乎其微，所以也会让人觉得去为希尔格鲁贝尔辩护是小题大做。而这正是这一技巧的精妙之处。

Wabuwabu

如果逐字逐句引用的话，至少保留了表面的客观性。但如果把原话加以总结，就常常会完全失去原意。这种情况起码会发生在那些不同意原话内容的人身上，如果让他们来总结，就面目全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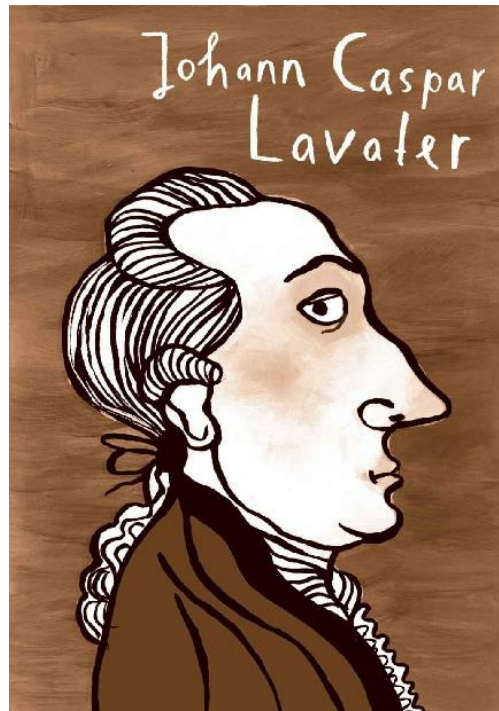
他们会通过增加或减少某些内容，造成可笑的印象，就像画漫画那样，这种手法可以称为Wabuwabu。这个词来自于非洲多比民族的语言，意思是“使用厉害的手段”。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让不怀好意的人来总结他人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个伏尔泰的例子来说明这点。他在总结《圣经》时写道：“上帝创造了世界，又把世界淹没了，但不是为了制造出纯粹的人类，而是为了让世界充塞强盗和暴君。上帝在淹死了父辈后，他又为了父辈们的孩子们死去，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所以他惩罚几百个民族，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死在了十字架上，然而这恰恰又是上帝故意不让他们知道的。”一方面，通过把上帝的行为同大家所熟悉的、意义重大的行为进行对比，造成一种极其荒诞的印象，如“.....但不是为了制造出纯粹的人类，而是为了让世界充塞强盗和暴君”；另一方面，伏尔泰又把上帝混乱的情绪变化推向顶峰：一开始上帝淹死了父辈，然后他为了父辈们的孩子们死去。伏尔泰用几句话总结了《圣经》，然而在《圣经》中，整个事件要令人振奋得多，因为《圣经》中没有删去从一个行为导致另一个行为的中间部分。而伏尔泰却把中间部分都去掉了，从而造成了混乱不堪的印象。



/伏尔泰/

形象的画面在漫画式的文章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表现某种滑稽的东西，从而达到一种效果，使得那些教义或观点看上去完全是错误的。例如哲学家赫尔曼·施米茨试图通过漫画式的比喻来贬低心理分析的释梦理论：“弗洛伊德看上去是要把灵魂想象成一个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作的管理机构，其夜班的工作计划不同于日班，但组织不变，都是处理同样性质的任务（感官和身体的刺激）。”“看上去”这几个字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弗洛伊德的想法如此独特，以至于施米茨无法苟同。但这一总结必须通过贬低的比较才能成为Wabuwabu——即用无聊的管理机构来刻画弗洛伊德的理论。

不言而喻，Wabuwabu这一手段不是永远都有助于实事求是地交换看法。个别情况下，这一方式还会使自己成为供人随意鞭打的稻草人。但有的时候，好的漫画式比喻也能促进讨论，并使讨论增加活力。这都要依具体状况而定。



/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尔/

4. 从蛛丝马迹到真相，到底有多远？

人们能直接听到的或看到的東西，似乎都很可靠。但人們常常必須對某些沒有發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發表看法。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線索。而許多問題因為沒有事實，原則上只能間接地調查，例如有關過去、有關明天天氣或有關交易所氣氛的問題。

分析線索是一項經常使用的重要手段。孩子們就非常喜歡從被折斷的樹枝和街上汽車刹車的痕迹得出自己的結論，並想出各種故事來。對獵人和偵探們來說，分析線索是他們的看家本領，但這麼做也很容易走上歧路。

下面的故事就證明了這點。故事事關一具骸骨和一個名叫約翰·雅各布·紹希澤爾（1672—1733）的人，這人是蘇黎士的醫生，還是自然研究者。他深信自己掌握了能證明《聖經》中的大洪水確實發生過的證據。在山里漫遊的時候，他發現了魚、貝殼和植物的印記，偶爾還發現了石化的木頭。他認為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生物的殘余物，而這些生物是在大洪水發生時被淹沒的，然後隨著時間推移變成了化石。

1723年他發表了題為《大洪水的植物標本》的文章。在文章里，他向驚訝的公眾介紹了自己的發現。因為他也找到了柳絮的化石，所以他甚至可以確定大洪水是哪個月發生的。

他最重要的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學、神學和道德意義，因此得以發表在當時最具聲望的科學雜誌《皇家學會哲學匯刊》上。後來他还印制了傳單，以啟蒙百姓。對於這一發現，他認為是“臭名昭著的人類的腿骨架，因為人的罪孽，世界才發生了如此的災難”。這一骸骨是他在厄寧根（德國康斯坦茨市）附近的一個采石場里找到的，那是一塊石頭，而且完全被壓平了。這一發現轰动一時，因為紹希澤爾先前找到的都是石化的“植物、魚、四條腿的動物、昆蟲、貝殼和蝸牛”，從來沒有發現過人的骸骨。過去，他把這一情況解釋為大洪水以後，人很可能待在水的表面，漸漸地腐爛了，所以不可能找到人的痕迹。可現在，他認為自己不僅找到了個別線索，甚至很快還能找到一個完整的骨架。他終

于找到了大洪水的证据，所以《圣经》所说的是确凿无疑。虔诚的绍希泽尔还在自己的发现上注明了准确的时间：在大洪水发生后的MMMMXXXII（4032）年。他的发现震动了他的同代人。

一直到1811年，人们才搞清楚，约翰·雅各布·绍希泽尔在采石场发现的是什么东西。科学家和解剖学家居维叶（1769—1832）研究了那具骸骨并指出，这是一条巨大蝾螈的骸骨。这使深信大洪水理论的人吓了一跳。居维叶的这一说法在当时十分大胆，因为在欧洲生活的蝾螈最长也就三十厘米，而居维叶所研究的骸骨有一百三十五厘米长。但居维叶的证据推论非常完整，所以很少有人怀疑他的准确性。一方面他对化石标本的处理要比绍希泽尔好得多，另外他也把这具“腿骨架”同其他已知动物的骸骨也进行了比较。

这样一来，“臭名昭著的人”就变成了一个两栖动物。1829年人们发现了一条活的大蝾螈，它是在日本被抓到的，并被运到了欧洲，从而证明了新理论是正确的。上面就是我要举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同分析线索有关的结论呢？

1. 大多数情况下，分析线索的可能性很多，所以不应该满足于最先想到的那个解释，即使这一想法的可信度非常高。居维叶就是这么做的，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骨头，并考虑到这也许不是人骨，而是动物的骨头。

2. 实际存在的线索要比看上去的多，线索越多，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可靠。居维叶不仅有一种新的设想，而且为了检验这一设想，他还寻找新的线索，可见他不满足于看到的东西。同绍希泽尔不同的是，他还花费精力制作了标本，这也有助于他确定骸骨的性质。

即便是绍希泽尔也发现了重要的东西。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化石无非是“早期沉积物运动”偶然造成的没有意义的岩层而已。当其他人只看到奇怪的“自然游戏”的时候，绍希泽尔则把它们看作是有待解释的。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要点：

3. 只有观察者寻找线索，才会发现线索。每一种解释都只有通过知识和认识才得以成立。知识越多，对线索的说明也就越可靠。所以那些平时从不注意石头的人会认为，别人给他们看的印记

只是偶然现象。只有那些研究石头的人才懂得，不能把某些结构只看作偶然产物。

4. 研究线索的人需要有关因果关系的知识。由此得出的看法就是：对因果关系的知识掌握得越扎实，得出的结论也越可靠。所以，自十八世纪以来，在法律领域证据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使口供变得多余：随着自然科学日益发展，即使只有很少的线索，依然可以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一旦确定了线索，侦探和警长就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巨型蝾螈/

5. 研究和分析线索的人，必须会讲述故事。因为每一条线索都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则源自其他特殊的东西：有其因，必有其果。只有把全部东西联系在一起，每个细节才能获得意义，并能确认其重要性。把各种不同的线索联系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个故事，这是一门艺术。亚里士多德谈到他的逻辑学时，就赞赏了这门艺术。按照他的观点，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能把各种不同的观察联系起来的中间项^[8]。为此人们必须能把第一眼看上去相互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

6. 不起眼的东西恰恰隐藏着有用的线索。有些科学家把这一看法变成了金科玉律：意大利艺术史家乔瓦尼·莫雷利（1816—1893）研究古老大师油画中的不同的细节，例如耳朵。他认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能力恰恰表现在细节中，而那些伪造者和模仿者，一般来说更重视一幅画的主要部分。在这样的观察基础上，莫雷利能把一些画重新进行归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非常熟悉莫雷利的著作，他认为，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的现象特别能说明问题，所以他深入研究过失和梦，并想以这种方式了解下意

识的起源。不起眼的东西在破案的时候，也起到一定作用，因为这些东西按照惯例不会引起犯罪分子的注意。

上面讲的都是过往的线索。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线索：目前状况的线索，也称为是症状；以及可以预知未来的线索。

漂亮的人，狡猾的人

一个人高兴、生气或发怒，他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体是否舒服等等，所有这一切，只需要看一下这个人的脸就能明白。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是否就能知道更多的东西呢？例如，这个人的性格如何，教育程度或可信度有多高？如果脸上有明显的迹象能显示这些内容的话，自然有许多有利之处。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人的真实面貌，从而避免“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失落。瑞士牧师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尔（1741—1801）确信自己找到了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不起眼的小特征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内心。这样，他就成了观相术之父，这一观相术的特点就是通过外部特征来确定一个人的性格。不管怎么说，拉瓦特尔当时说服了很大一部分读者，歌德也是其中的一个。歌德非常热衷于观相术，他甚至为拉瓦特尔的著作润色。

下面我们就拉瓦特尔所谓的秘密规则（《一百个观相规则》，1789）做一个测试。这些规则涉及人的额头部分，以及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一智力测试不需要很长时间，只要看一眼就行：

1. 非常善解人意、令人舒服的人，两眉之间长有不太大的疣子，这些疣子并不让人反感和感到讨厌。一个四肢健全、没有犯过重大错误的人的上嘴唇上，很少能看到褐色的大疣子，尤其是上面带毛的那种。

2. 额头较长，皮肤很紧，而且没有皱纹，哪怕惊喜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可爱生动的皱纹，这样的人冷淡、尖刻、固执、让人讨厌、自负（自我欣赏）、溜须拍马，而且非常不宽容。

3. 往前弯曲、上部分很平的额头，鼻子成弓形，脸的下半部很长，这样的人总是在愚蠢的边缘生活。

4. 一个畸形的人，其额头越往上越低，到眼睛那里呈扁平状，这表明此人愚蠢得无可救药。

5. 额头上凹凸部分越少、越平，那么这个人就越平庸，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创造力。

6. 有些人额头高高隆起，非常漂亮，看起来像个天才，但实际上很傻，只是有点小聪明而已。从凌乱的眉毛可以看出这个人有点机灵的愚蠢。

7. 额头上有斜皱纹，特别当这些皱纹呈平行状时，表明这个人穷酸、不友好和多疑。

8. 善解人意、智慧、正直和诚实的人额头上往往有平直的、不太深的皱纹或者断开的平行皱纹。

这些规则的原则显而易见：对称的形式看起来就值得信赖。只要有什么地方不对称，哪怕只是斜皱纹或疣子，拉瓦特尔就提醒大家要小心。每一个偏差和不对称就意味着一个缺点。换句话说就是，长得不错的人一定聪明、善良和友好。总而言之，拉瓦特尔的书在当时非常畅销。今天美国或亚洲的一些公司的人事部仍然要求，来应聘的人要通过“有经验的面相师”的评估。

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一些有名学者的脸，就会对此产生疑问。一个莱布尼茨的同代人在描写他时写道，他很早就秃顶了，而且在他的脊柱中间有一个鸽子蛋大小的隆起物。黑格尔的脸被他的竞争者叔本华称为“啤酒酒店老板的脸”。海德格尔也常被人看作是头脑简单的黑森林农民。萨特是斜眼。爱因斯坦即便在他最有名的照片上也看得出来有什么独到之处，而更像是一个和蔼的、有点不知所措的老爷爷。



/额头1/额头2/额头3/额头4/



/额头5/额头6/额头7/额头8/

事实上，拉瓦特尔同时代的人就批评过他的方法。物理学家克里斯多夫·利希滕贝格（1742—1799）写了好多篇质疑观相术的文章。他尤其对拉瓦特尔得出的线索的指向性提出质疑。因为不干净的皮肤或脸上的疣子可以是各种原因所致。利希滕贝格认为，无数因素构成了外貌，例如营养、天气、疾病等等。除此之外，人还可以伪装自己，这就加重了分析工作。脸并不是路标。路标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能使人看明白上面写的东西，但人的脸上并没有这样的标记。利希滕贝格的观点是，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不能只考虑单个线索，而是要考虑多种线索，其中也包括人的行为，因为行为比外表更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当然利希滕贝格的文章不受面相学界欢迎。他后来发表的关于尾巴相术的讽刺文章（我将在《当笑声成为武器》一章中介绍）激怒了他们，那些人把利希滕贝格的怀疑归结为他“可怕的驼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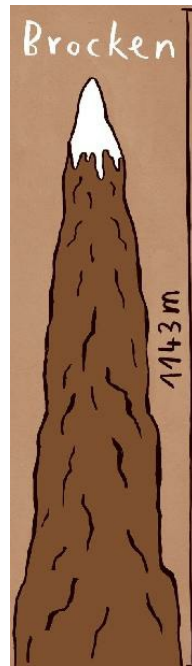
从一个人的脸能否看出他聪明与否这一问题，今天根据实践研究可以得出比利希滕贝格时代更好的回答。如今，我们一方面知道，确实大多数人是按照拉瓦特尔的面相秘则来判断他人的——尽管他们不会拘泥于计算有多少疣子、斜皱纹和其他细节，但总的说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以貌取人的，并认为外表好的人自然也有其他积极的特点，例如聪明、诚实、可靠、勤奋、成功等等。新近的调查表明，好的外表就有好的品质，这个说法还真有一定根据。一个原因可能是，符合一定美貌标准的人更受到他人重视，所以也会获得更多受提携的机会。同时调查也表明，外表和性格的联系只是统计数字上的表现。漂亮的人可以使人失望，而一个矮小、鼻子长成土豆样的人有可能是天才。所以，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利希滕贝格对面相学家的所谓科学分类的批评也有充分的道理。

神的暗示

罗马人观察飞鸟，想知道神对人的某个特定的行为是否赞成。自那以来，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寻找一种预兆的做法就流传了下来。我们可以通过歌德（1749—1832）做出一项决定的例子来说明这点。1775年11月歌德来到魏玛，他的朋友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希望歌德能越来越多地参与魏玛的管理工作，而不仅仅只是扮演既是朋友又是陪同的客人角色。1776年6月卡尔·奥古斯特任命歌德为枢密顾问，这样歌德就成为了给公爵提供咨询的三人枢密小组的成员。歌德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研究卷宗和开会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影响到了他的艺术创作。但另一方面，能参与“实际生活”又非常吸引他。1777年10月8日他的日记中只有一个词：管理，后面还加了两个惊叹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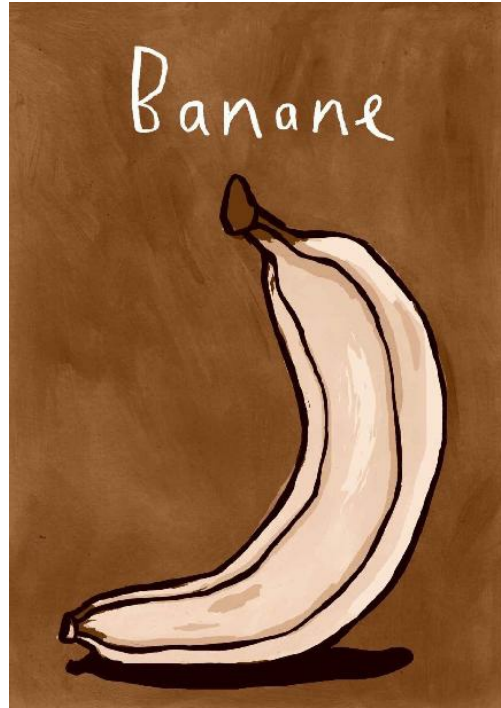
在这段充满矛盾的日子里，歌德决定寻找一个能让他增加动力的迹象。1777年12月，他出发去哈尔茨山旅行。他只在给当时的女友夏洛蒂·冯·斯坦因的为数不多的信中，暗示了他要去找什么。他当然不是要在山上观察飞鸟的路线，而是要在冬天攀登布洛克峰，如果能成功登顶，他就想接受魏玛的挑战。这是一种了解神的意愿的现代运动形式。通往山峰的道路很像生命之路，如果登上了山，就有勇气接手新的项目。

布洛克峰高1143米，冬天山上有厚厚的积雪，再加上山峰一年中将近有三百天被大雾笼罩，所以歌德登峰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山上的托尔福宿营地，歌德遇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人。这位德根的看林人警告他不要去登山，就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在冬天登过峰。12月10日清晨，云散雾开，看林人说：“您现在可以看到布洛克峰了。”歌德走到窗户边，大声喊道：“谁说我不能上去！您有仆人吗？一个人也没有吗？”看林人说：“我同您一起去。”就在当日，歌德真的爬到了顶峰。当晚，明月当空也是神明的另一个暗示。歌德回到魏玛后，就决定接受新职务。



/布洛克峰/

另一个神明暗示的例子就没有这么浪漫，那是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1791—1871）十岁时遇到的事情，这位数学家也是计算机的发明人。这件事发生在歌德登峰整整二十年后。巴贝奇并不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而是被一个神学和宗教的问题困扰着。他想知道的是，《圣经》是真还是假。他思考了很久，却没有结果，所以他决定做一次实验。他不像狂飙分子歌德那样要登上山峰，也不要求上帝为了他而让月光四射。后来的计算机之父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的结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进入父母家的一个特定的房间，如果他发现门是开着的，他就会相信《圣经》；如果没有开，他就不相信。开或者关，0或者1，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一实验的出发点是巴贝奇的一个秘密想法：因为他认为，上帝不会因为他坚持做这个实验，而让他遭到永恒的诅咒。但他对这一实验的结果似乎没有太深印象，在《一个哲学家的生活片段》一书中，他写道：“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确实认真地看了看，但我已经记不得门是开的还是关的。”也许上帝只是允许门开了一个缝，门是虚掩着的？



/香蕉/

5. 原因那么多，哪个才是决定性的？

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被叫做充足理由律。

这个句子里的“理由”指的是原因，而原因在哲学里享有巨大声誉。只有知道原因后，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事物是现在这个样子，才有可靠的知识基础，才能最终说服他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则没有很高的价值。所以，长时间以来，寻找原因也是哲学工作的重要内容。

正因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一开始就确定充足理由律是错误的。认为所有事物都只有一个理由的想法是一个错误。事物有各种理由的原则才是正确的：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有各种理由。那些打算解释世界的人，总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于是，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意图，选择在特定情况下最为有利的那些原因。

第一个深入研究原因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单纯的事实只能说明某些东西是存在的，而原因却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原因。以回答“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的四种方式，他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多重原因理论。

为什么香蕉是弯的？

对这一问题，可以给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不同的回答直接指向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不同原因：

1. 因为每根香蕉都需要阳光：这是指向未来的目的因（*causa finalis*）。

2. 因为香蕉一侧皮的纤维比另一侧长得快：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生成原因，即动力因（*causa efficiens*）。动力因同目的因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确定目标后，才会出现生成的活动。反过来，目标只能通过生成才能达到。

3. 因为长成弯曲状是香蕉的遗传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形式因（*causa formalis*）。

还有一个原因是：

4. 因为情况允许这样，这是一个多少有点混乱的原因，被称为是质料因（*causa materialis*），指的是香蕉的物质本质，但也包括一些无法归纳到其他原因的偶然情况。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例子很可笑。但香蕉在哲学著作中，是一种很受关注的水果。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佛教经文中，香蕉就已经被神化。《古兰经》里也提到了香蕉。西方则通过亚历山大大帝才了解这种形状弯曲的水果。他出征印度时，手下的人看见智慧的婆罗门^[9]食用手指般的黄颜色水果。当植物学家林奈（1707—1778）需要赋予香蕉一个植物学名的时候，想到了这篇报道，于是就把这种水果命名为*Musa sapientum*，意为智慧男人的缪斯。一直到今天，专业人士还这么称呼这种水果。而“香蕉”这一俗名则来自阿拉伯语词*banan*，意思是“手指”。

关于香蕉就说这么多。下面是四个原因的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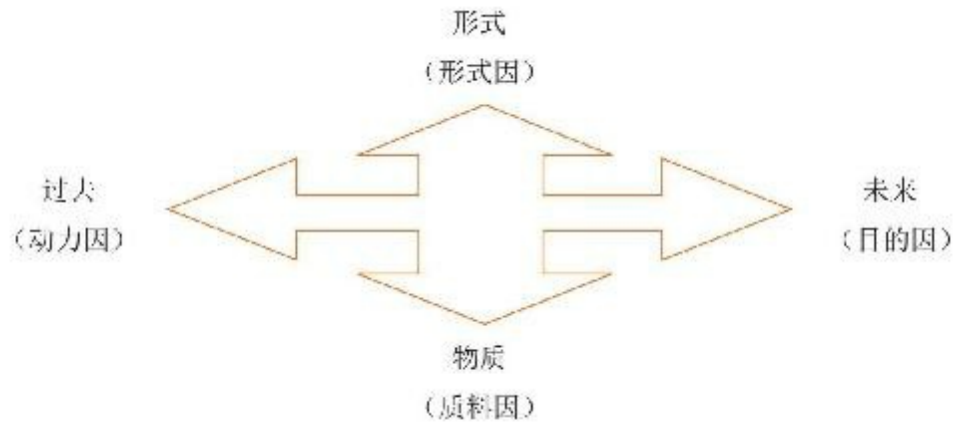
causa finali: 目的因

causa effieie: 动力因

causa formalis: 形式因

causa materialis: 质料因

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归纳到下列图表中：



我们肯定还能以其他方式组合这些原因。这样的一个图示只是给予大致方向。在亚里士多德以后，还有过许多试图体现原因体系的尝试，其中不乏相当复杂的试验。

相对于把原因区分成各种类型，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确定事实A为事实B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有在出现了A的情况下，才会出现B。虽然人们很想知道，事实A对事实B的出现是否果真必不可少，但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进行试验的可能性，其结果就是长时间的争论。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相互指责和请求原谅。人们通过猜想对方的目的而指责对方，而被指责的人则通过把责任推卸给客观情况来为自己辩解。

梅厄太太：你不是说好四点要回来喝咖啡的吗？

梅厄先生：突然来了个电话（外因，是无法控制的，质料因）。

梅厄太太：你可以不接嘛。我想，你是又要让我等你吧（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目的因）。

梅厄先生：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有关我们下一个项目，所以我非接不可（必须这么做，形式因）。

这里还有几个其他的例子：那些通过高考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通过考试是自己目标明确的努力所致。而那些考试失利的人一般都会认为是外部情况造成的，比如老师故意找麻烦。

如果一本书没有成功，作者（例如君特·格拉斯）就会指责批评家（例如赖希·拉尼茨基）把书批评得体无完肤，以至于把他的书“毁灭”了；而批评家则会反驳，书的失败会不会另有原因？比方说，这本书确实写得很不好。

政治讨论中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经济繁荣了，总理就会说，这可是我带来的经济增长！他把自己看作是积极发展的动力因。但如果连续出现经济滑坡的情况，失业人数猛增，总理则说，国际经济形势使然。他会把不利局面归结为次要的外部状况。正如老话所说，成功有很多父亲，而失败永远是孤儿一个。

在这方面甚至还有过一些社会研究。例如，美国的心理学家研究了夫妻一起开汽车时的态度。他们的结论是：在车里婚姻非常容易解体。为什么？因为坐在副驾的人总喜欢监督掌握方向盘的那一位，要是出现了抛锚、晕车或发生事故时，副驾上的人就会指责开车人。而开车人则认为这些情况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外部情况迫使他不得不这么驾驶汽车。

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只要当事人在其他地方找原因，就是故意不说真话。我们更应该认可的是，许多事实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角度来寻找不同原因。但这不意味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事实，而是需要其他的论据来决定是否找到了大家共同认可的原因，或者是否存在多种原因，并且各种原因的分量也不同。

罗马的衰落

对于原因的讨论自然也会出现在各种有关是非功过的讨论中，所以这一问题在审判时也起到关键作用。它也以类似的方式出现在许多科学讨论中。因为科学家要探讨的问题，多半是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往往会引出下面的问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几乎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像西罗马帝国灭亡那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受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西罗马帝国灭亡于476年，当时德国贵族和将军奥多亚克把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赶下台。自那时起，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受到了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的关注，因为这个帝国的毁灭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有些地方，如北非某些地区，直到今天其文明水平都没有恢复到西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所以，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就不足为奇了。几乎没有第二个话题，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之多的文献资料。

研究古代史的亚历山大·德曼特收集并研究了这些文献资料。他一共评论了五百种看法。他确认有二百一十个因素可以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其中包括一些奇怪的因素，如迷信、麻木不仁、缺乏性格、洗浴业、血中毒、铅中毒、美食、男人缺少尊严和少雨。他关注的问题并不直接针对目标，也不是要澄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他更多想通过比较和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某些的原因在讨论中要比其他的原因更受欢迎。也就是说，德曼特的目标是对第二个层面的情况进行观察，从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果。通过比较这些因素，德曼特很快就发现了，提出原因的人的职业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诗人荷尔德林把“缺少独特性”看作是键原因；矿业专家则认为，采铁矿是真正的原因；农业生化学家利比希认为是土地的碱化；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状况的恶劣是主要原因；而哲学家阿尔伯特·施威策则发现最大的灾难是缺乏肯定生命的世界观。所以每个专家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现实，并倾向于把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看作是最具决定性的。

更重要的则是德曼特的第二个观察结果。他发现，大多数的解释都遵循“外部诱导，内部原因”这一模式。大多数研究者和评论家都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在于帝国的内部状况，而不是外部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提出内部因素造成帝国灭亡的人可以通过这一解释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可以做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以警告者的姿态出现，并说：“西罗马帝国是缺少独特性而灭亡的，所以要帮助那些诗人和有创造力的人，否则的话我们也会重蹈覆辙。”强调原则上可以控制的内部因素，同时也是一种提醒，所以就多了一个附加值，但如果强调外部因素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附加值。

在探讨原因的日常讨论中，情况也非常相似，例如疾病的产生不是因为器官的因素，而是因为心理因素。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病人面前把自己提升为大师，并能给予病人如何改变生活的建议。当其他人在谈论原因时，永远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利益呢？”通过确定利益所在，就很容易动摇一个人对原因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这样和那样态度的“元凶”呢？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最关键的。人们也会考虑，正常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究竟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如此生气。而这一天发生的特别的事情，也就是使这一天区别于平常日子的原因。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能看到类似情况。

产褥热：如何找到原因

为了确定究竟是哪个原因造成了后果，自然科学家必须看到作为参照的第二种情况，或至少能回想起可以进行类比的情况。

那么该如何做呢？奥地利的医生塞麦尔维斯（1818—1865）对产褥热病的研究对此给出了最好的回答。产褥热是过去女人分娩后常患的一种疾病，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无法救治的。塞麦尔维斯从1844到1848年在维也纳综合性医院第一妇产科工作。

这所医院是国王约瑟夫二世创建的，用以改善秘密堕胎的状况。看病是免费的，病人不需用支付治疗、饮食和住院费用，甚至还可以把孩子留在医院里。育婴堂不收任何费用，院方还严格保密孩子的姓名，前提条件是孩子必须在医院出生。那么哪些人会在医院生孩子呢？一般来说，当时只要有点钱的妇女都把孩子生在自己家中。到医院去生孩子的妇女都是穷人，其中不少是妓女。来医院生产的妇女越来越多，以至于必须扩大妇产科，人们称增加的妇产科为第一妇产科，而把老医院称为第二妇产科。一开始，这两个医院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产妇的死亡率也几乎一样，都是6%。1840年，医生和助产士的培训分开了。从那时起，医学院学生和医生在第一妇产科工作，而助产士在第二妇产科工作。区分的结果是惊人的：在医生的妇产科里，产褥热死亡率上升到10%，而助产士的妇产科里，死亡率降低到3%。全维也纳都听说了医生的妇产科有这么高的死亡率。住进第一妇产科的妇女必须做好自己可能会死去的心理准备。尽管这里十个产妇中也有九个会活下来，但在每个房间里，每天都有一名妇女死去。

塞麦尔维斯后来写道：“产妇们确实非常害怕第一妇产科，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因为有时会看到痛心的场面，那些产妇跪在地上，绞着双手，请求离开妇产科……”人们对造成第一妇产科和第二妇产科之间区别的原因一无所知。塞麦尔维斯写道：“一切都不清楚，一切都令人怀疑，只有死亡人数的巨大数字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事实。第一妇产科的主任约翰·克莱因教授决定把濒死的妇女转到其他科室里，以美化自

己的统计表。

塞麦尔维斯调查了所有可能造成这一可怕现象的原因。他从不先入为主，不会从一开始就把某种猜测看作是荒诞的。有人猜测，为即将死去的妇女祈祷的神父会使其他产妇失去力量，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塞麦尔维斯也调查了这一假设。第一妇产科的神父到达病房前，必须要穿过五个大厅，所以人们猜测，神父的出现，特别是神父前面敲小铃的仆从更容易使病人成为产褥热的牺牲品。第二妇产科则没有这种情况，因为神父可以直接进入病房。于是塞麦尔维斯呼吁神父设身处地为产妇着想，说服他们绕道，而且不要敲铃。但第一妇产科的死亡率并没有下降。

塞麦尔维斯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他注意到，在第一妇产科，产妇们是躺着分娩的，而在第二妇产科产妇们则是侧躺的。这样，塞麦尔维斯又在第一妇产科引进了侧躺的做法，但死亡率还是没有下降。

塞麦尔维斯也研究一些神秘的原因。例如，有一种猜测认为，产褥热受到空气和瘟疫的影响。于是塞麦尔维斯问道，难道这些影响只出现在第一妇产科，而第二妇产科就没有这样的影响吗？还有别的能反驳这一猜测的理由：一些已经被第一妇产科接收的孕妇，但因为住得离医院太远，所以在半路就出现了阵痛，实际上孩子是出生在街道上的。尽管街道环境很差，但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产妇的死亡率也要低于第一妇产科的平均数。

1846年，对死因不明的情况感到不安的院方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最终委员会得出的原因是：医学院的男学生在检查女病人时，要比第二妇产科那些细致的助产士简单得多。委员会特别批评了来自国外的大学生。结果把大学生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而且不允许外国留学生对孕妇进行检查。在短时间内，死亡率降低了，但不久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甚至还要高出一点。

终于，一个不幸的事件给了塞麦尔维斯决定性的启发。他的同事、法医雅各布·科莱施卡常常与他的学生进行尸体解剖。在一次解剖中，一个学生用一把切过尸体的小刀不慎割伤了科莱施卡的手指。结果他不幸染病去世。他得病的症状同产褥热妇女的完全一样。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细菌的作用，尽管如此，塞麦尔维斯明白，是“尸体身上的东

西”通过学生的解剖刀进入科莱施卡的血液，从而引起了致命的疾病。

科莱施卡同第一妇产科患病的妇女的相同症状促使塞麦尔维斯得出结论：女病人也是因为同样类型的血中毒而死的，而且感染源也很清楚——医生和医学院学生是感染源。因为医生和学生常常在进行尸体解剖后，马上就来到病房。而他们检查产妇的手仅仅用肥皂和水清洗了一下。

于是塞麦尔维斯猜测，这样的洗手方法不能有效地清除“尸体上的成分”，并且双手常常还留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在第二妇产科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尸体解剖不属于助产士的培训项目。

塞麦尔维斯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还作出了一个新决定：要求所有的大学生在进行尸体解剖后用漂白水洗手，以去除味道和所有可能传染的物质。第一妇产科的死亡率开始迅速下降，1848年降到1.27%，而第二妇产科为1.33%。但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又使人怀疑起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有一天，有十三个妇女躺在产房。第一个被检查的妇女患有已经化脓的子宫癌。医生对她做完检查后只是用水洗了洗手。结果其他十二名待产的妇女中，有十一名死于产褥热。塞麦尔维斯认识到，除了尸体外，活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也能传染疾病。所以，他要求只要手受到污染，就必须用漂白水清洗。这样也就结束了维也纳医院的产褥热。

塞麦尔维斯通过逐步排查，最终发现了真正的原因。这样的一种试验性做法当然不适合所有情况。如果人们很想知道原因的事件发生在过去，我们便不能把它们找回来，再进行试验性调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在思想上重复塞麦尔维斯的行动。首先要尽可能找到有关信息，然后逐一排除一些因素，正如塞麦尔维斯逐步排除导致产褥热的一些原因那样。如果人们找到了某种无法排除的原因，而且没有这些原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的话，就找到了真正的原因。英国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原则与此非常相似：“排除不可能的因素，剩下来的就是真相，即使看起来很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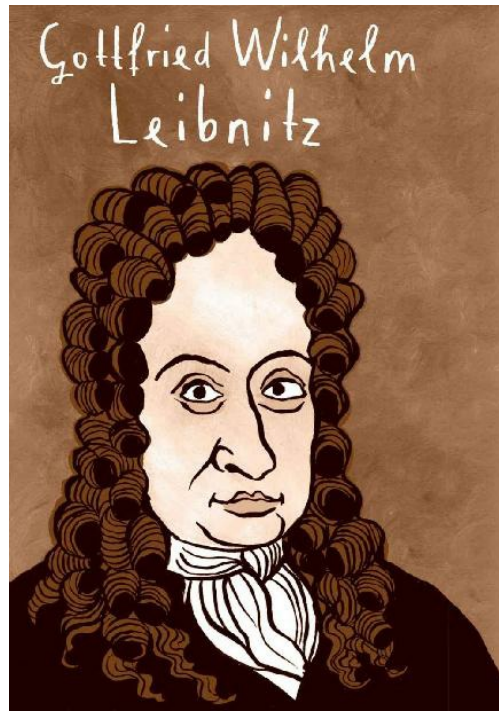
当然这样的思想实验要比医生或自然科学家做的真实实验更容易遭到攻击，所以研究医学历史的专家很难揭开天才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职业生涯之谜，或者说他落魄的原因。因为一个悲惨的事实是，被后人称

为“母亲的拯救者”的塞麦尔维斯在生前根本就没有得到承认。相反，他因为拯救了无数产妇而受到惩罚！他被自己供职的妇产科解雇，遭到同事排斥，最后被迫回到故乡布达佩斯。1865年他甚至被送往一个精神病医院，穿上禁锢服，几个星期后死于血液中毒。

为了说明他的命运，研究医学历史的专家想出了许多可能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塞麦尔维斯提出的“尸体解剖间接造成了产褥热”的看法让约翰·克莱因教授大为恼火，因为是他要求大学生必须上这门课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公众不了解塞麦尔维斯的贡献是因为他唯一的出版物又厚又难懂，很多人刚读了开头就无法读下去。

还有人说，塞麦尔维斯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所以他和同事们都吵翻了，同事们拒绝给他应有的承认。还有一种观点是，塞麦尔维斯的理论同当时公认的医学观点大相径庭，所以他的同事们，除了个别人之外，无法把他的理论看作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这些猜测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呢？这样我们又有了一个需要寻找原因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塞麦尔维斯自己还能把第一个妇产科同第二个妇产科进行比较。而那些研究他命运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行类比的可能性，所以尽管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的说法还是难以证实。



/莱布尼茨/

6. 用反例进攻

举例是争论中使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人们试图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巩固泛泛的见解，就像用一根稻草来支撑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借用例子，最多也只能使一种普遍的说法变得可信，而无法证明这一说法。哪怕是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如“骡子（马和驴交配的产物）是不能生育的”，最终也不能通过举例来得以证明，再多的例子也不行。相反，只要有一个反例就足以反驳这一说法。2002年秋天媒体争相报道，摩洛哥的某个村子里，一头母骡生下了一头健壮的小骡子。当时，科学家们设法解释母骡是如何克服遗传障碍的。他们提出的观点是，自然界会时不时地打破自己的规律。所以证明一般看法的例子即使很多，也不完全可靠，我们必须估计到出人意料的现象。

检验智慧

一句话的内容越全面，就越显得有说服力，当这句话出自于有名的哲学家之口时，便更是如此。但我们仍然应该努力通过例子和反例，来看一下这一观点是否可信。真要这样做，有些教诲马上就不成立了。例如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那句话：“我的语言的界限也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猛一看，这句至理名言很有道理，也许是因为总觉得在什么地方曾经读到过这句话。“我的语言的界限……我的世界的界限”，这听起来很不错。但问题是，这句话是否正确？一开始会想出很多肯定的例子。比如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越好，他能感知的东西就越多，他的经历也就越丰富，起码看上去是这样。但如果稍稍变换这些例子，马上就会出现麻烦。我们设想一个还不能说话的孩子，这句话是否适用于这个孩子呢？几乎不适用。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咨询师都知道，不能因为孩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就得出他们无法感知事物的结论，要是真这么做，就大错特错了。孩子们的情感世界超过了他们的表达能力。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反例，当然还能找到其他类似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用例子来加以说明，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它夸大了语言的意义。

另一个例子则是来自于实践理性领域，就是康德（1724—1804）的绝对律令：你的行为一定要使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复杂的措词和使用像“准则”和“原则”这样的外来语，暗示了这句话的精确性。对有些人来说，这句话是哲学的永恒“结果”之一，所以也可以找到许多可以证实这句话的例子。例如，人难道不应该尊重他人、不得欺骗他人或偷窃他人的财物吗？这一点不就可以上升为一般法律吗？但如果我们用一些次要的例子来看这句话，就会出现麻烦。如果把“节约并把每一分多余的钱存入银行”列为一条准则会怎样？这条准则本身非常理智。但这能否成为立法的根据呢？回答多半是不能。普遍的节约对个人来说也许是理性的，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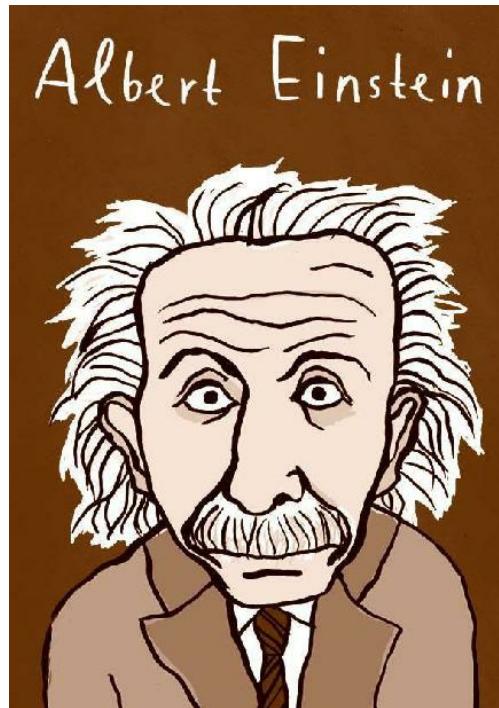
还可以举一个康德私生活的例子。康德终身单身，这里所表明准则就是“永远单身！”。毫无疑问，康德本人一定认为这条原则很有意

义。但如果把这一准则变成普遍立法的原则，就很不公平了。如果真有这么一条法律，从长远来看必定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爱因斯坦的斗争

提出普适理论的人最害怕那些寻找推翻这一理论论据的人。理论越普遍适用，找到反例的机会就越大，也更容易使理论家难堪。

但另一方面，反例的进攻同时也带来一种特殊的机会。如果反例不奏效，而且受到反驳，就会使受攻击的理论的地位越发巩固。那些提出某种特别理论或观点的代表人物越是经常被拿来讨论，给人留下的印象便越深刻，就像那些交战的部落喜欢展示伤疤，以证明自己战无不胜。



/爱因斯坦/

在讨论量子理论时，使用反证进行致命攻击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这场争论早已载入科学史册。争论的舞台是物理学家大会，也就是1927年举办的第五次索尔维大会。参加争论的一方是爱因斯坦（1879—1955），他坚信量子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则是量子物理学的奠基人，属于物理学界年轻一代的沃尔夫冈·保利（1900—1958），维尔纳·海森

贝格（1901—1976）和尼尔斯·玻尔（1885—1962）。每天吃早餐的时候，爱因斯坦总要遇到他们三人，并向他们提出反对这一理论的看法。爱因斯坦总能想出一个实验来，并从中得出这一理论不正确的结论。保利和海森贝格虽然听了他的不同意见，但并不理会，而玻尔却认真地对待爱因斯坦的看法，他一整天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反驳他。到晚餐的时候，他就能使爱因斯坦的论据失效。

但爱因斯坦并不服输。三年后，在第六次索尔维大会上，他又想出了新的点子——光子盒实验。他想用这一实验来推翻测不准原理，这是量子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爱因斯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后，玻尔非常激动，因为他不能马上找到爱因斯坦的漏洞。他的一个同事后来写道：“对玻尔来说，那是一个真正的恐吓……他整个晚上都十分不安，从一个人那里走到另一个人那里，试图说服他们，如果爱因斯坦确实有理的话，这也不意味着物理学的终结，但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反证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两个对立者离开俱乐部时的模样……高大的爱因斯坦看起来是那么威武，嘴角还露出一丝微笑，而玻尔则激动地紧跟在他旁边……第二天早上，玻尔则大获成功。”

玻尔发现了爱因斯坦论据中的一个错误。他反驳爱因斯坦时，还恶意引用了爱因斯坦不久前提出的相对论里的话。这场胜利提高了在场的物理学家对量子学说的认可。而爱因斯坦当然没有服输。一直到死，他都认为量子理论是错误的。

会笑的马

反例可以动摇一种观点，但不会使观点自动投降，而是能以各种方式削弱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否认例子。如果不奏效，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例子说成是例外。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的设想来反驳这些例子。最终我们还可以提出细微的差别，并通过这一方式使例子失效。

下面的对话说明了该怎么做。这一对话是根据罗伯特·穆齐尔^[10]的故事改编的。当然这个例子与光子和量子无关，而是涉及到马是否会笑的问题。许多人相信，马不可能笑，因为笑是人的一个特点。梅厄先生也持相同的观点：

梅厄太太：不久前，我看见一匹马笑了。他感到身上发痒，就笑了。

梅厄先生：怎么会呢？怎么痒痒？

梅厄太太：当然会，是腋窝底下痒痒，马有四个腋窝，所以痒痒的程度是我们人的两倍。

梅厄先生：这能证明什么？不管怎么说，只有人才能笑。

梅厄太太：马在大腿的内侧有一个地方特别敏感。

梅厄先生：你在做梦吧！

梅厄太太：只要硬刷子靠近那个地方，它就会把耳朵甩到后面，很烦躁，想去摸那个地方，可又摸不到，所以就露出牙齿来。刷子离那个敏感处越来越近，马就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上。耳朵越来越往后，突然，它的牙齿全露出来了，马笑了！

梅厄先生：胡说，马只是露出牙齿，没有笑。

梅厄太太：它当然没有狂笑。确实没有。只有你才能狂笑。

梅厄先生：你什么意思？

梅厄太太：没什么呀……然后，又开始用刷子逗马了，它不想笑，而是等着刷子继续靠近……

梅厄先生：它根本就没笑，而只是呲牙咧嘴。

梅厄太太：那好，如果你的意思是，马不像你那样，只要听了酒桌上的笑话就会笑的话，我没有意见。马即便不会笑，但我也不会因为它不会笑而抱怨它。

预言

一般来说，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事实，提出某个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某个观点的有效性。但还有一个比举例更让人吃惊的做法，就是预言，即提出一些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的例子来证明某种观点（或理论）。人们把手伸向那些不知名的事物，就像孩子们把手伸进神奇糖果袋一样，如果确实找到了人们已经预言的东西，就会引起轰动。

自然科学把这一做法看成是其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其判断的方法不是看一个论点是否包含已知的事物，而主要是看这个论点是否能推论新的事实。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用他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来预言那些尚未发现的元素。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周期表里还有几个空缺的地方。门捷列夫当时也完全可以对自己说：“行了，我的表只是一个系统图表，不可能完善。”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解释道：“这一图表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空缺之处应是那些至今没有被发现的元素。”他的这一预言很像打赌。用于打赌的不仅是他的周期表，还有他作为科学家的名声。后来，当门捷列夫预言的元素真的被找到的时候，他的周期表的地位便大大提高了。这样，门捷列夫与其他五位同样发现元素周期规律的化学家相比，就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那几位化学家都太小心翼翼了，没有用这张表来预言那些未知的元素。

借助预言来作证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效果。但事实上，一个成功的预言不能最终确定一种普遍理论的正确性。成功的预言只是拓宽了例子的范围。

例子和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写道，我们可以在公众辩论中使用举例的方法，而在和哲学家谈话时却不能这么做。同哲学家谈话，必须得提出证据。数学中的一个现象可以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个现象就是一条规律：把奇数按顺序加起来，并看一看出现的数字：

$$1+3=4$$

$$1+3+5=9$$

$$1+3+5+7=16$$

$$1+3+5+7+9=25$$

这些奇数相加得出的数字是平方数，并且依次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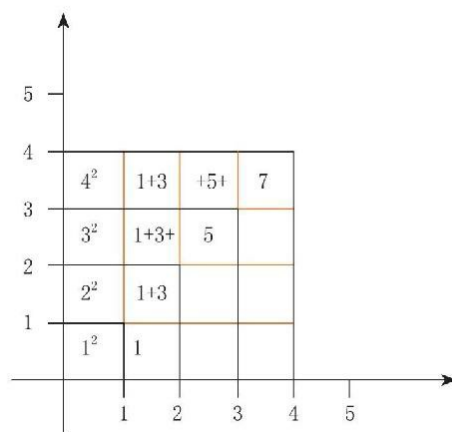
$$4=2 \times 2$$

$$9=3 \times 3$$

$$16=4 \times 4$$

$$25=5 \times 5$$

这是不是永远正确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算几百次，然后说，行了，我现在有足够例子了。但人们还会不满意，因为只有知道这一规律的原因时，人们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证明一个推论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规律的外部知识，而且还可以更深地了解原因。但不利之处是，求得这样的证明非常麻烦。上面这个例子也不例外。



用几何图形可以证明这一例子。我们先来看看等式的右边，即那些平方数。在坐标中，这些平方数以方格的形式体现。接着我们来看坐标，这上面由小方格组成了大方格。和坐标上的1相对应的，只有一个方格，因为 $1^2=1$ 。而 $2^2=4$ 时，方格的数量相当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也就是 $1+3=4$ 。以此类推，便可以得出 n^2 到 $(n+1)^2$ 是什么情况：纵向增加 n 小格，横向也增加 n 小格，如要组成新的方格，则右上角还需要增加一个方格，这样一来总共需要增加 $2n+1$ 格。这个命题于是就被证实了。

上面这个数列的例子是我在莱布尼茨那里发现的。他在给索菲·夏洛特·冯·汉诺威（1668—1705）的信中讨论了这个例子。莱布尼茨同汉诺威夫人曾有过多年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汉诺威夫人肯定更欣赏哲学家的思维方法，因为宫廷里的证明方法都非常粗暴。汉诺威夫人有一个崇拜者，冯·霍尔斯坦因公爵。有一次，公爵陪同汉诺威夫人游玩。为了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公爵突然提出要一口气喝光一大杯啤酒，以祝愿夫人身体健康。但表演失败了，那杯啤酒超过了公爵的能力，他不得不把酒都吐出来。而爱情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公爵又试了一次。正如索菲·夏洛特写的那样：“他又狂饮了一次，以证明他对我怀有巨大的热情。”

Kürbis



/南瓜/

7. 为什么没有面面俱到的定义？

罗瑟先生：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就是要为我的家……服务了。

小罗瑟：你的意思是，你退休了？

罗瑟先生：是的！可以这么说。

谁要是像电影《吝啬一家》中的小罗瑟那样，把父亲想表达的内容精确化的话，就要用另一个表述来取代原先的那个，而且这一新表述几乎没有被再解释的余地。在拉丁语中，动词`praecidere`意味着缩减。这样的缩减，无论对日常生活的辩论，还是对哲学讨论都管用，正如下面的对话所表明的那样。这是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曾学过木工、后来成为理论家的卡尔·波普尔之间的对话。哈贝马斯踢出了一个斜传球：“理论只有在具有多样性后，才可以被证明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对象范围。”卡尔·波普尔简化了这句话，并突出了其核心内容：“一个可以使用的理论，就可以运用于一个特定领域。”

从技术上来看，精确化可以把一个表达转换成另一个表达，也就是“你真正想说的是……”，或者是进行区分“你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个……”。精确化不仅可以用于攻击，也可以用作防卫。

梅厄先生：你又迟到了。看起来，你这个人不会遵守约定。

小梅厄：不，我不是不会遵守约定，而是我不会遵守规定。

约定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相反，规定只是一个人所定。所以，在这段对话中，牵涉到的是约定还是规定，两者的区别非常大。

词语国度

在日常争吵中，精确化是有用的手段。那些力争使自己的表达精确和细致的人、希望对方能理解的人，也喜欢使用这一手段。许多哲学研究也具有这类性质。

对旁观者来说，这样的做法显得特别麻烦。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清楚表达的简单方式呢？实际上，人们只需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想说的意思，就像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一页上是画有东西的图片，另一页上是说明东西的文字。

但一个字的含义，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可以通过具体例子予以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把这个字同其他意思接近的字联系在一起，犹如要了解一个人，最好也熟悉这个人的家庭一样。

例如，一个学生发现自己成绩册上的化学、物理和数学的成绩都是“差”，这份成绩单告诉这个学生，他的成绩很差，仅此而已。如果他也这么想，他就完全可以安慰自己道：“唉，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但他如果真这么做，就完全没有理解成绩册的意义，因为只有在同其他成绩册比较的情况下，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

这一情况同在哲学讨论中使用词汇的情况非常相似。孤独地看字的含义是不可靠的，必须要把这个字同意思相近的字联系在一起，起码要把两种近似的、但又不是完全吻合的说法进行对比。同时还可以走得更远，可以把单词放在一组同义词里，以确定这个字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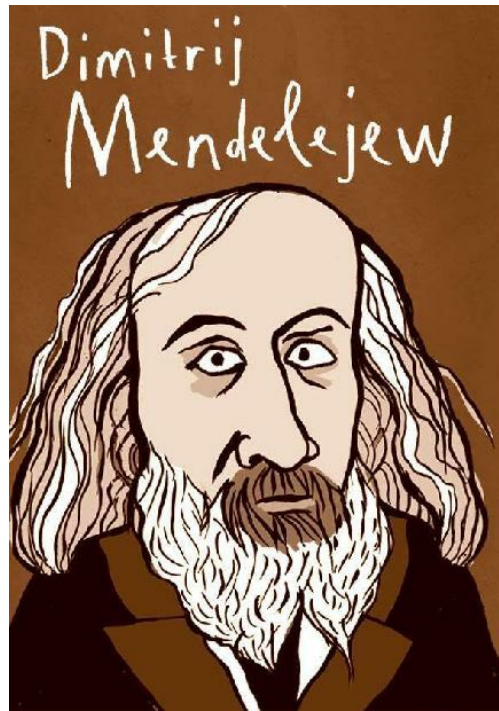
至少那些研究语言细微区别的哲学家和语法学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研究同义词，也就是语言中意思相同的词汇。第一个研究同义词的是名叫普罗蒂克（公元前五世纪）的诡辩家，他很可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自那以后，时不时地会有人对词语的细微区别产生兴趣，但一直到十八世纪，也就是启蒙时代，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同义词研究热潮。法国人阿贝·吉拉尔（1677—1748）是这方面的先驱，他的著作《法国语言的准确性》是后来许多同义词词典的榜样。文化底子深厚的吉拉尔，非

常注意词汇极其细微的区别，并能够非常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他正是通过这一能力把自己同没有文化的人区别开来。同义词就如同试金石，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同义词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意思，而有文化的人就能分辨其中的区别，并能在思考和说话时考虑这些区别。

吉拉尔的著作给他的同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受到那些启蒙者的欢迎。上流社会也开始关注他的作品，一个同代人甚至提到当时的同义词热，并认为全巴黎都在研究词义差别。这一股潮流发展迅速。在德国，施托斯（1714—1796）以吉拉尔为榜样。1770年他出版了《确定德语中一些同义词的尝试》。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意思完全相同的词汇，因而在书中他只提到了“意思相似的词汇”。哪怕面对两个看起来意思完全相同的词时，如表示“徒劳”的“umsonst”和“vergeblich”两个词，目光敏锐的施托斯也能发现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学者如果既得不到一分钱，又没有得到别人的喝彩，他就白写了（umsonst）；如果他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而且没有传递自己的意思，他则是白干了（vergeblich）。”

施托斯自己的著作肯定没有白写。他的著作充满了智慧和令人惊讶的观点，他本人因此而成为德语同义词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他的神奇著作中发现了词汇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一般人根本就不会考虑。如都含有“平”这一含义的“glatt, eben, platt, flach”，这些词听起来难道不是相同的吗？描写的不都是一目了然的几何现象吗？难道不应该把这些词汇的多样性磨平，并把这些多样性看作是语言衣服上的褶皱吗？不，施托斯发现，这些词是有区别的：“glatt是粗糙的反面，eben是隆起的反面，platt是崇高的反面，而flach是高或深的反面。”

施托斯在词义国度的发现无非就是探究细微区别。他的发现也是与他人共享的产物：在家中晚餐时，他把他的想法供全家人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而他则做笔记，然后他把笔记给朋友们看，最后再进行加工和处理。寻找准确的词义区别是一种极具娱乐性的游戏，犹如猜谜。并且，以玩票的心态参与这种游戏是成功的先决条件。除了路德的《圣经》外，身为牧师的施托斯在写作时，很少使用文献资料。他找出了许多精彩的区别，其中就有zufrieden（满意）和vergnuegt（满足）之间的区别：“如果人们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就会满意；如果不再继续向往了，就很满足。”



/门捷列夫/

定义

定义同精确化很相近。这里的关键也是要确定一个单词的意思。但定义的形式更为严谨：因为定义不仅是确定内容，而且同时也是一种共识。大家一致认同：从现在开始，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下定义往往离不开简化。一般来说，细微差别也会因此而丢失，但这一损失又通过获得准确性而得到弥补。自古以来，确定定义就是哲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旁人会觉得这太可笑了，正如古希腊一个喜剧片断所证明的那样：

A： 斯珀西波斯，迈内德姆斯，柏拉图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在做什么？

B： 哦，这我可太了解了。一群学生站在科学院的练习所，我听到他们不可思议的讨论：他们在给大自然下定义。南瓜也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他们想知道南瓜属于哪一类东西。一开始，他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弯下身子，深思默想。突然，有一个人说，南瓜是一种圆的蔬菜！另一个人大叫，是一种草！第三个人喊道，是一种树。一个也站在那里来自西西里的医生笑了，并说道，这些人都疯了！

A： 那他们肯定气死了？因为在教室里说这样的话是不恰当的。

B： 谁说的？他们才不把这当回事呢。站在旁边的柏拉图一点也不气愤，他轻声轻气地说道：“好吧，现在重新开始定义……南瓜是什么？”就这样，他们继续工作下去……

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8）和他的学生们很有可能是出于练习的目的给南瓜下定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探讨的是严肃或者是更高级的东西。美德是他们非常喜欢辩论的话题。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提倡道德，而且更多的是要探讨究竟什么是美德。柏拉图在早期的题为《拉赫斯》的对话中，探讨了一种美德，准确地说，就是勇敢的问题。谈话

是在苏格拉底同两个雅典将军之间进行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名叫拉赫斯的将军，另外一个将军叫尼基阿斯。史料证明确有这两个人。一个名叫吕西马克斯的年迈贵族是引起这场谈话的起因。

勇敢到底是什么？谈话围绕着这个题目展开。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也许多少有点陌生。勇敢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过时，尽管这个概念在几年前还被看作是“迸发热情的能力”，也曾流行一时。但今天我们更喜欢把“灵活性”看作是一种基本美德。古代雅典是非常崇尚军事化的社会，当时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战争，其价值观念和现在截然不同。对孩子们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军事教育。古希腊的中学都是男校，学校尽管也设有哲学、音乐和语法的教程，但教学大纲的核心是锻炼身体。

和苏格拉底谈话的这两位将军性情迥异。拉赫斯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勇士，而尼基阿斯看上去则更有文化，也更有口才。苏格拉底首先求助于勇士，向他提出了“到底什么是勇敢？”这个问题。拉赫斯用一个例子来予以说明：“如果一个人决心抵抗敌人而不逃跑，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勇敢的人。”

而苏格拉底则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普遍性。因为在军事以外的范畴，也存在着勇敢的现象。例如忍受疾病也是勇敢行为，航行也是如此。拉赫斯又开始寻找新的定义，这次他的观点是：“勇敢是灵魂的某种坚定性。”但苏格拉底还是不满意。他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灵魂的坚定性也可能意味着是毫无理智的固执。接着，拉赫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勇敢是灵魂理性的坚定性。苏格拉底还是不满意，他又找到了反驳这一解释的例子：一个患有肺炎的小孩提出了一些愿望，可他的医生没有满足他的愿望，尽管在孩子没有生病的情况下，医生一定乐意成全他。在这里，医生表现了灵魂的理性坚定性，但不能把他称为是勇敢。

拉赫斯不得不暂时放弃，但他还是对苏格拉底的吹毛求疵表示了愤慨：“尽管不习惯这样的做法，但我还是决定不退出。听了你的话，我甚至更产生了要试一试的野心。当我发现自己不能把想要说的话表达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叫勇敢。奇怪的是，突然我抓不住勇敢这两个字，以至于无法用言语来总结到底什么是勇敢。”

苏格拉底回答道，要给勇敢下定义本身就需要某种勇敢，并鼓励他要坚持下去。然后尼基阿斯说话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级的看法：“勇敢是知道应该害怕什么和不害怕什么，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别的地方。”他还没有完全说完，拉赫斯就开口了。他说，这样的定义很可笑，因为知识和勇敢是不同层面的东西。然后，他也使用了刚才苏格拉底对付自己的手段，举了一个反驳的例子。他说，一个医生或农民肯定都知道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应该担心或不担心什么，例如疾病或雹灾，但知道这个不等于就是勇敢。

然后，球就这么来回抛了好几遍，最终的结果是尼基阿斯也无法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一会儿，对话就终止了，而且没有找到最终的定义。谈话的结果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尼基阿斯的回答总结了勇敢的三分之一，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勇敢的全部。”

这场讨论无疾而终。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许多尝试突然就停止了，没有任何结果，即使有结果也矛盾重重。柏拉图同时代的人就发现了这点，他们在有关定义的讨论中，看到的只是无端地浪费时间，所以有人就把哲学家看作是以一种极其神圣的方式研究南瓜的人。

定义的意义

有关定义的讨论真的永远是那么复杂吗？是否能得出一个定义取决于想达到的目的。如果一个定义必须概括方方面面，那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产生于活生生语言的单词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用一句话来概况定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非是一种暂时的简化表达而已。

但许多定义并没有决意要表达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更多考虑其实用性。人们只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决定这个词的意思，即使人们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式并不能完全开发日常语言中一个活生生的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许多人的决定来规范定义。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参照颁发战争奖章的做法。颁发这样的奖章，不需要对勇敢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从一开始，大家就都清楚，这里不是指任何情况下的勇敢。一般来说，只需要提出战争中的勇敢标准。如果这些标准使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并能保证奖章确实颁发给了勇敢的人，这一定义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从哲学上来看，这么做也许非常肤浅。为了不使我们讨论的内容太军事化，我们来举一个女性奖章的例子。这是一种奥地利的奖章，它有个很漂亮的名字：美德的女仆。这一奖章问世于1662年，是费德南特三世夫人爱莱奥诺拉（1630—1686）提出的。该奖章是为了表彰勇敢的女性，尽管它的名字并没有体现这层含义。这里的“勇敢”特指勇敢地抗拒情欲的诱惑。在宫廷中，这样的诱惑比比皆是。所以奖章发起人的目标是要“在巨大的尘世生活的喧嚣中保持纯真的美德，并让恶习看到其不可战胜的力量”。

当然很快就出现了麻烦：奖章盖颁发给谁呢？谁是具有美德的人？发起这一奖章的王后当然心中有数。她提出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也许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不是很成功，但在现实中却是可行的。在她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美德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得到奖章的夫人必须“出身高贵，来自名门望族”。因为高贵的身份看起来是美德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这么做也很容易确定谁具有美德。而第二个标准有点含糊不清：这位夫人值得尊敬的生活广为人知。这样的定义肯定不能使像苏格拉底那

样的人感到满意，但对于解决应该把奖章颁发给谁的疑问却是足够了。从1662年到1675年，一共有七十二名夫人得到这种奖章。

王后的做法和苏格拉底对定义的高标准要求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一个定义是否有用，就看这一定义是否能回答一个特定的问题。我们可以把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松鼠之谜”作为例子。这里讲的是一个散步的人看到了一只松鼠，这只松鼠正在一根树干上跑来跑去。那个人决定要更近地观察松鼠，所以就跟踪它。但那只灵活的小松鼠总是躲开他，所以那根树干总是挡在松鼠和那个人之间。而那个受到戏弄的散步者只能围着树干转，除了树干后面露出的松鼠的两只小眼睛和两只竖起的耳朵，什么也看不到。从而产生了下面的问题：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围着松鼠转？



/拳击手/ /拳师犬/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大多数人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很明显，要么是散步者围着小动物转，要么就是围着树转。找到答案的关键就是定义。因为“围着什么东西转”可以有两个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一步一步地以一定的方向，例如从南，到西，到北，到东走向一个物体，那这个人肯定是围着小动物转。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围着某样东西转的人，先是从前面，然后从侧面，然后从后面，再从侧面看这一物体的话，那么这个人在这个例子中，就不是围着松鼠转。因为松鼠为了躲避他，始终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永远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所以要弄清楚答案，首先就要约定条件。

依照这一方式，小松鼠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过，什么是真发生了或没有发生，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使用的词，以及人们对这些词的定义。

失业

定义不仅在猜谜语时有用，对许多公共讨论也有重要的意义。主要的原因是，定义是做统计的先决条件，而统计又是无数辩论的基础。根据定义，人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统计数字。例如失业这一概念就给一系列定义提供了余地，这些定义是具有代表性的，根据定义就会得出不同的数字。对位于纽伦堡的联邦劳动局来说，满足下述条件的人员是失业人员：

- 愿意一周工作超过十八小时
- 不只是寻找临时工作
- 十五岁以上和六十五岁以下的人
- 随时可以就业

一个七十岁的退休者，无法找到新工作，但这样的人按照这里的定义不能被看作是失业者。事实上，官方的定义同人们对失业的直觉概念互为矛盾。人们直觉地把失业者想象成想通过工作赚钱、但又没有找到工作的人，而且不管一周工作多少个小时。这种“直觉”的概念要比官方的概念内容更为丰富——这一概念也包括了没有登记入册的失业者，例如一些愿意一周在一个服装店工作十小时的家庭妇女。那么鉴于这一概念，失业的人数是不是会大幅增加呢？

在官方的统计中，一般来说，并不出现失业人数，而是失业比率，所以，整个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这一比率是通过失业者的人数和就业者的人数得出的。这样一来，难度就增加了一倍：谁来定义哪些人有工作呢？在德国，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定义，按照这一定义，例如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和士兵都不属于就业者的范围，所以在计算失业者比率时，也不会把这些人计算在内。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可以降低失业率的简单做法。我们只要通过一个

合适的定义，就可以增加就业者的人数，失业率也随之而降低。这种方法在别的地方已经成功地运用：在英国，1986年失业率从13.6%降低到了12.2%，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寻找工作的人如愿以偿。

失败的定义

定义是艰难的艺术，在下定义时，很容易出现错误。下面要介绍一些绊脚石。

① 反例

定义应该起限制作用，因此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定义是否能起这个作用。这一试验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本应该符合这一定义却没有被包括进去的东西。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定义太狭窄了。就像上面所提到的拉赫斯最早提出的定义，他认为，在战争中坚持战斗的人就是勇敢的，他把勇敢的概念限制在军事范畴的一个具体例子上。基于例子而得出的定义，一般来说永远是狭窄的。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放弃检验定义是否太宽松。在这方面也得做一下试验，那就是寻找能被这定义包含的例子，但这些例子本又不应该属于这一定义的范畴。例如尼基阿斯认为，勇敢就是知道什么是应该害怕的，什么是不应该害怕的。他的同事拉赫斯举了医生和农民的例子。医生和农民在各自的领域都知道什么是应该担心的，而什么是不必要担心的，但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勇敢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大伦理学：给年轻听众做的道德报告》中写道，士兵们对有些事情非常了解，例如对某一个特定的地区，他们知道，即便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个地区也不会有任何危险。鉴于这一认识，士兵们可以在这些地区放心地活动，而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却有可能陷入恐惧之中。士兵们确实知道，应该害怕什么和不应该害怕什么。那么，能不能把这些士兵称为勇敢呢？多半不能。士兵们之所以感到轻松，是鉴于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② 永远是负面的

负面的定义，会达不到预期目的。例如“好的教育就是你不是现在

这个样子”，这句话并不能说明什么。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喜欢使用负面定义，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说出人们不赞同的事情，要比诚恳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意图简单得多。

③ 循环论证定义

如果被定义的东西，或隐藏或毫不掩饰地又出现在定义中，那么这一定义便被称为是循环的。请看下面德国文化部长会议对“优秀”这一成绩下的定义：“如果成绩以很高的程度符合要求，就可以给予‘优秀’的评定。用另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成绩很好，就可以给予‘优秀’的评定。”没有文化部长会议的定义，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出“优秀”的含义。不需要循环论证，就可以定义“优秀”，例如“优秀”是满足老师所有期待的成绩。

“大拇指在左侧的地方就是右边”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文字游戏，此游戏也是基于一种循环论证的定义。但这里出现的问题很难得到克服。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就可以确定右还是左，在没有循环论证的情况下，几乎都无法定义。必须用手表示哪里是右，哪里是左，才能弄懂左右的意思。

④ 比喻

对定义的另一批评是针对定义的清楚性。如果定义是通过形象的画面来表示的话，就会出现这一问题，比如把勇敢定义为是“美德的眼泪”。当然这不能算作是定义，而只是试图通过某种强烈的画面来回避下定义罢了。

⑤ 是否适用的试验

一般说来，定义总是如下形式：某表述X在下述情况下，意为Y。当一个作者引入某种定义时，得实实在在地注意自己的论断是否合用。因此他总需要检查，自己的定义是否有缺漏。一个很实用的做法是，把所有带有X的句子中的相应内容都替换成Y，然后看看是否有问题。

这样的替换法，对于检验或者批判某一项理论非常有用。要知道，很多人随意引入一个定义之后，又把它抛之脑后，这样的做法屡见不鲜。

如何下定义？

关于下定义，有一个段子。一次高中升学考试，老师出了一个题：何为勇气？一个学生想了五分钟之后，站起身来，交了答卷。上面除了一行“这就是勇气”的小字之外，空空如也。关于评分结果，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中，老师给了这个学生满分；另一个版本中，老师扣了他一分，因为他的回答中，“勇气”一词的词性写错了[\[11\]](#)。

尽管如此，肢体动作不是总能让棘手的难题迎刃而解。因为这些动作始终和场景联系在一起，而一个定义则能够独立使用。为了更利于开展工作，事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很有必要。去查一查百科词典是个不错的开端。

要想下一个定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首先得找到事例。收集工作是着手进行定义的第一步。尤其那些极端例子很有启发性。这和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的情况非常相似。通过收集不同的事例，对它们进行比较、分类、再分类，事物的定义就会慢慢显现出来，至少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目标。这样，大家构建出一系列定义，并且随后就会出现一组互相关联的概念。

通过这种方式，就产生了重要的科学分类，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也包括医学或化学。我们上面提到过发现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他不修边幅的形象印在许多化学书上。据说，他在坐火车穿越俄国的漫长旅途中，玩一种一个人玩的纸牌游戏，他的纸牌上都注有化学元素的特点，他总是不断重新排列纸牌。这样最终就出现了同类元素的组合，甚至还出现了被视为化学心脏的元素周期表。

多重意思

定义的用途是要把多层意思变成一层意思，而且这层意思要非常清楚。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不要求这么做。因为具有多层意思的词也有自己的用途。这些词不仅可以表达礼貌和表现良好的意图，也提供了开玩笑和娱乐的素材：

一个怀孕的女子来到面包房，她对面包师说：“我要[\[12\]](#)（怀上了）一个面包。”面包师说：“真是无奇不有啊！”（他是指：她怀上了一个面包。）

“好朋友”游戏

同义词是指两个词（看起来）是同一个意思，而多义词则相反：一个词有两个意思，例如四重奏（Quartett）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一种纸牌游戏。德语中“皇冠”这个词也有牙冠的意思。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事物要比单词多，所以有些单词必须承担好几个任务。“好朋友”游戏就是基于这一想法。当车堵在高速公路上时，这是一种受人喜爱的家庭游戏。两个人找出一个有双重意思的词，然后各自向对方描绘这个单词的意思，例如：

梅厄夫人：我的“好朋友”是可以买到的。

小梅厄：我的也是。

梅厄夫人：我的“好朋友”是可以抚摸的。

小梅厄：我的也是。

梅厄夫人：我的“好朋友”是会移动的。

小梅厄：我的也是。

梅厄夫人：我的“好朋友”喜欢啃奶酪。

小梅厄：我的“好朋友”从来不饿。

梅厄夫人：我的“好朋友”会挖洞。

小梅厄：我的“好朋友”能在一块橡胶板上转动。

答案：老鼠，鼠标[\[13\]](#)

Frau Me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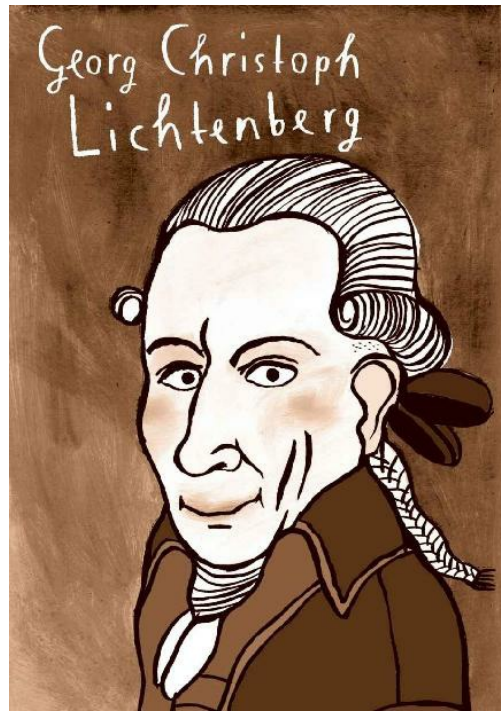


Herr Meier



Meier Junior





/利希腾贝格/

8. 画面感，决胜的关键

2002年德国联邦议会竞选时，在民意调查中，社会民主党落后于基督教民主联盟^[14]。统计数字传得沸沸扬扬，可以读到的数字确实不少，但没有人能一针见血地描绘出当时的气氛。弗朗茨·明特费林是当时社民党竞选小组的组长，他终于想出了一幅具有暗示性的画面：“最后的十五分钟开始了，我们还必须踢进两个球。”他以这样的画面向支持社民党的人说明形势，告诉他们社民党目前的处境和必须要做什么。

那年恰逢足球世界杯，德国国家队令人吃惊地进入了决赛。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用足球赛来形容竞选是有缺陷的，因为许多人听到的不是：为了获得胜利，我们还必须踢进两个球，而是我们现在输了两个球，可只剩下一刻钟的时间。所以基民盟政治家沃尔夫冈·朔尔布勒马上就利用了这一具有画面感的比方。《明镜》周刊采访他时，他大方地扩大了双方的比分差距：“那好，现在是4：1。”基民盟总理候选人埃德蒙·施托伊贝尔也非常赞同这个比喻：“比赛结束时，那个人（指总理施罗德）会跑过来，说道，等一下，裁判，我们在前八十五分钟的战术完全错了，所以我们只是以0：3的成绩落后。”

按照施托伊贝尔的观点，比赛的结果是3比0。

后来，施罗德在答记者问时说道，他不认为自己是处于球赛的最后几分钟，而只是处于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足球比赛的比方已经变不出什么花样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具有画面感的比方来取而代之。当时的外交部长费舍尔及时地想出了新招，他对记者说：“你们想象一下，你们是在参加马拉松，你们知道，马拉松要到三十八公里后才开始决定胜负。所以有些人虽然一开始是在前面，但到了结束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

具有画面感的比方可以让人开心，可以起到教诲、谴责或美化的作用，这完全依说话人的目的而定。具有画面感的比方可以用在各个方面，所以在所有类型的辩论中，不管是政治还是科学的辩论中，具有画面感的比方都是令人喜爱的手段。人们区别不同类型的具有画面感的比

方：其中有类比、隐喻、比喻和讽喻。比喻的重点是故事。类比是一种冷静的具有画面感的比方，重点不是具有吸引力的叙述，而首先是逻辑结构。讽喻是根据一个特定的密码设计的具有画面感的比方，更多用在艺术和文学中，而不是在辩论中。隐喻最终是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例如足球，而不是联邦议会竞选）。这么多类型的具有画面感的比方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过渡，所以对我们来说，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具有画面感的比方（或图画故事）就足够了。这当中永远会涉及到，要把一种情况与另一种具有游戏性的情况相比较，例如把联邦议会选举比作足球赛。

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与一种不具有画面感的表达方式相比，有哪些优点呢？下面的例子是最好的说明。这里有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一句是从《德语句子语义学》中选出的抽象描写：“德语句子构造法的形式是，具有最高信息价值的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动词，放在句子的结尾。”

这句话至少要读上两遍，才能明白其意义。但如果用一个隐喻来说明这一现象，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马克·吐温（1835—1910）是怎么说的。他在一篇题为《可怕的德语》的文章中写道：“当一个德国作者开始写一句句子时，他就潜入了一个很深的海洋。很长时间人们看不到他，直到他嘴里含着一个动词出现为止。”通过潜入海底这一具有画面感的比方，一个信息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故事。具有画面感的比方不仅有更多的娱乐性，而且也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

具有画面感的比方会使某种情况变得形象。通常，必须通过一幅合适的画面，才能使人明白事情的原由：一场足球赛要比一场长时间的竞选更让人一目了然。一旦形成了一个画面，就可以把这幅画面像招贴画那样高高举起，并传递给其他人。发明具有画面感的比方的现成办法并不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幅好的画面要依靠突然产生的奇思妙想，它是才华的产物。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几个基本规律。例如，通过画面来表现的场景或事实必须要比原来的说法更简单、更具体和更清晰。来自一个高级范畴的画面会提高这件事的价值，相反来自低级范畴的画面则起贬值的作用。如果在一次讨论中已经出现许多具有画面感的比方，应该考虑一下，是否要重新组合这些具有画面感的比方。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过程。

重新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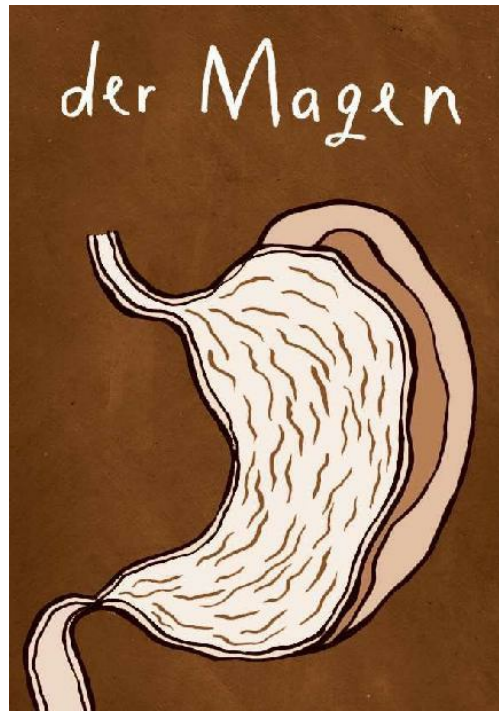
这一故事发生在罗马，它与哲学上的分歧无关，而关系到一次真正的权力斗争。废除了君主制以后，贵族和平民之间出现了矛盾。贵族们私分统治权，城市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相反，平民们被政治部门排除在外，而且在别的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这正中贵族们的下怀，而平民们很不满意。平民们十分清楚，没有他们国家就会瘫痪，特别是军队如果没有来自下层的士兵就会崩溃，所以他们就奋起反抗。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罗马出现了所谓的等级之争。

有一天，平民全部离开了罗马。他们带着自己的东西在城市对面的圣山安营扎寨。他们决定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新城市，一个没有贵族的城市。因为大家根本就不需要那些无用的懒人，这些懒人靠别人的劳动生存，他们坐在衙门里，拿着高薪，无所事事。

贵族们知道平民们如此放肆地撤离，神经也紧张起来。谁来替他们工作呢？谁去打仗呢？难道要用武力迫使平民们回来吗？最终贵族们取得一致意见，他们要派一个使者去平民那里。那是一个名叫阿格列帕的人，他本来也出生于平民家庭，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贵族地位。阿格列帕的任务是说服平民回到城市，尤其要让老百姓们明白，他们对贵族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阿格列帕出了城，登上圣山，来到了平民们的营寨。他被允许走了进去，他走到营寨的中央，让大家聚集在他四周。然后他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基本上是讲述了一个含有画面感比方的故事：“当人的结构还没有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時候，每一个器官都有自己的意志。所有的器官都抱怨，它们的劳动成果都送给了胃，而胃的唯一功能就是充分地享受。所以，这些器官决定要让胃知道它们的厉害。双手不再把食物送到口中，嘴巴也不吃东西了，牙齿也不咀嚼了……他们是要让胃饱受饥饿之苦，可自己也饿得够呛，身体马上就消瘦下来。这么一来，它们就看到了胃的功绩，那就是胃消化食物并让其他器官获得力量。”



/胃/

这个故事打动了那些不满的平民。当然，可以把贵族比作胃，没有胃，其他的器官也好不到哪里去。老百姓们的这个想法让阿格列帕十分满意，看起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正在这时，人群中站起来一个衣衫褴褛的平民，他说道：“哦，阿格列帕，欢迎你。你刚才说的胃和器官的故事很不错，但我觉得你的比喻大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你的目的不就是要让我们接受贵族和他们懒惰的生活方式吗？胃这个器官太有用了！它接受，它也分配。但我知道的那个版本与你的版本不同。请允许我讲一讲我的版本。这是一个低级的版本，是无产者的版本，但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无产者吗？”这时，人群开始窃窃私语，还能听到一些人的喊声：“好好听，好好听！”或者是：“你快说！”

那个平民继续说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当第一个人被造出来的时候，每个身体部分都想当国王。大脑说它应该当国王，因为它干所有的工作，控制思维和进行思维。双手开始反驳，它们觉得当国王的荣誉理应落在它们身上，因为它们干活、喂狗和数钱。心脏跳得特别厉害：‘不，不，不，我才是身体的发动机，没有我就没有生命，所以我应该是国王。’性器官则认为，没有它就没有后代，它给予生命最高的享受，所以应该成为国王。每一个器官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当国王。最后说话的是肛门。是的，阿格列帕，是肛门！大家不由地放声大笑，谁也

没有想到，竟然肛门会提出要当国王的要求。”说到这里，人群中有人大声疾呼：“他说得对！”还有人说：“就是如此！”那个平民继续说下去：“肛门非常生气，它把自己关上了，拒绝提供服务。由于肛门的罢工，整个身体都中毒了：大脑开始做出错误的决定，并有失效的危险。胳膊酸痛，手指可怕地抖动。性器官变得毫无兴致，一点活力也没有。身体的所有部分陷入极度的恐惧，大家决定让肛门来当国王。结果是，身体的所有部分都为每日的工作而忙碌，而肛门则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并制造出一大堆的粪便。”

这就是那个平民讲的故事。群众发出阵阵欢呼声。那个平民继续说道：“你们不要上假故事的当，这个阿格列帕是市议会雇的人，他要欺骗我们。你们得坚定。我的比喻要比他的比喻有更多真理。我们知道，贵族是怎么对待我们的。”这就是那个平民说的话，把阿格列帕气得脸通红通红。那个平民甚至高呼：“平民们，大家联起手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李维乌斯（公元前59—公元17）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故事。准确地说，他只写了阿格列帕出场。迄今为止，历史书里没有提及那个平民——也许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物。不管怎么说，平民说的故事表现了应该如何看待含有画面感比方的故事：我们可以把故事的主要内容稍微改动一下，并进行重新组合，一直到出现一个新画面，从而得出新的结论。

继续思考

含有画面感比方的故事隐藏着某种风险，因为这些故事可以用来反对讲述故事的人，条件是，如果我们能证明，讲故事的人实际上并不熟悉他要讲述的事情。

可以举一个新例子来说明这点，那就是关于奶牛的故事。从内容上来讲，这场讨论牵涉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事实，以及是否真的有事实。一种哲学学派即所谓的结构主义的观点是，事实最终只是发明出来的东西。倾向于这一学派的一个女作者，科学社会学家卡琳·克诺尔·塞提纳在她的《制造认识》一书中提出了下面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的出处是创作侦探小说的女作家多萝西·塞耶斯）：“先生，事实就像奶牛。如果你盯着奶牛看，一般来说它就会跑开。”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较，除此之外，这一比较中还包含了一种惊人的观察。但法兰克福的社会学家罗塔尔·哈克恰恰对这一观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尽管社会科学家作为奶牛饲养者的画面非常引人注目，但真正的牛仔都知道，换了地方的奶牛一般来说依然还是奶牛（除非是在屠宰场被一步一步地分解）。”哈克认真地对待上面的比较，但只是想得更远一点。他得出的结论是，仔细看的话，这一具有画面感的比方并不成立。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只有非常胆小的奶牛才怕人的目光。大多数的奶牛则是平静地与人对视，并继续啃草。

凡是出现动物的比喻常常会有漏洞，因为那些使用这类比喻的文人，不一定有足够的动物学专业知识。例如惯用语“露出狮子的猛蹄”就证明了这点。许多艺术评论家喜欢用这句话来赞美一部巨作。很明显，他们并不知道，狮子作为猛兽根本就没有蹄子，而只有前爪和前爪上的钩爪。但在家养的猪身上则可以看到蹄子，所以才会有口蹄疫这个词。

照搬他人的话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题篇》中写道：“照搬他人的话，也能使这个人难堪。”这么做，很容易产生像文字游戏那样的玩笑。有些狂欢节上的讲话和歌舞讽刺表演就是依靠这一手法：照搬口语和俚语中形象的表达或者把这些话连在一起。

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制造笑话，而且还可以使伟大的举动失去神秘性，如布莱希特（1898—1956）在他《来自一个读书的工人的疑问》那首诗中写的那样：“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难道是他一人所为？凯撒打败了高卢人。他身边不是至少有一个厨师吗？”

替代

那些批评别人使用具有画面感的比方的人，最好自己也提供一个比方。叔本华（1788—1860）反对一种关于记忆的普遍说法，即记忆就像一个专门堆放回忆的集装箱。叔本华认为，这样的一幅画面不足以反映一个重要现象，即无法说明那些几乎是自动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出现。例如，有些人听到最初几个音符时，就会回忆起整个曲子。记忆的这种独特性是集装箱这个比喻所无法包含的，所以叔本华就建议，要替换这种传统的说法：“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画面来描绘我们思维惯性的特点的话……我想，最准确的画面应该是一块布，这块布会按平时的褶印自动折叠在一起。”很明显，叔本华指的是那种老式的厚麻布桌布。如果经常熨烫桌布的话，似乎桌布会按照熨出的褶印自己叠起来。叔本华认为，这一画面说明了为什么那些经常想同一问题的人，会有很好的记忆力，因为他们不断地熨烫自己的记忆。而那些也许有很强创作力的人，那些老有新想法的人，按照叔本华的说法，记忆力就会很差。

这一画面也有其局限性，而且也没有被众人所认可，但叔本华的想法表明，一幅画面总会带来一定的联想，所以改编一个画面也会引起新的想法。

噱头

在这章的最后，我想提一下含有画面感比方的故事的一种类型，这类故事很受讽刺歌舞表演的演员以及政治家的喜爱，这就是带有噱头的故事。这是一种介于谜语、笑话和类比的东西。下面举几个例子：

■ 你跳起来的时候像头老虎，可落地的时候充其量是床前的脚垫！

■ 这是香蕉软件，到了顾客那里才会熟。

■ 学问犹如果酱，果酱越少，就得涂得越均匀。

■ 一个政治家同科学家的关系犹如一个瞎子同路灯的关系：他只是寻找能依靠的东西，而不是光明。

这些例子的噱头里，都有一种没有预想到的关系，这一关系打破了读者或听者的期待，从而就产生了某种娱乐效果。如果以这样的包装来提出某种看法的话，这一看法就会更具有说服力，所以人们经常使用带噱头的比较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噱头不仅用在日常生活的争论中，而且也用在哲学上。莱布尼茨下面这段话就说明了这点：“人的认识不同于动物的认识。动物仅仅是依赖于经验，并按照已有的例子行事。因为，据我们所知，动物永远也不会去造句子，而人有能力从事科学研究。动物得出的结论同经验主义者的结论处于同一水平。经验主义者声称，重复多次的行为，在遇到一种类似的情况时又会出现。所以动物很容易被人抓到，而那些简单的经验主义者则容易犯错误。”

莱布尼茨认为，人天生拥有一定知识，这些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获得的，例如基本的数学知识。经验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他们的出发点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于经验，所以莱布尼茨把经验主义者同动物进行比较。这一例子从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让我们突然看到掉入陷阱的动物和爱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我们以前当然没有想到过这种联系。莱布尼茨把一个简单的类比变成了一种使人惊讶

的观点，同时他也让读者看到“具有示范性的科学”的崇高性。他的想法非常惊人，不过，带有噱头的观点当然与其他观点一样，也是可以被反驳的。

那怎么才能想出带有噱头的比较呢？也许我们可以向利希滕贝格学习，使他出名的不仅是他的充满智慧的观察，还有他勤奋的收集工作。他会把所有觉得奇怪和引起他注意的东西，记下来，一开始并不抱有什么目的。后来，他就利用他的这个充满想法和有意思的细节的宝库，给他的论点增添光彩和机智。有一次他看到了西班牙语中剪烛刀的表达：“在西班牙语中，剪烛刀叫Despavilladera，西班牙人说，这是一个大将军的头衔。”他把这个记到了本子上。后来，他把这变成了一种观点，并利用这一观点有效地反驳了他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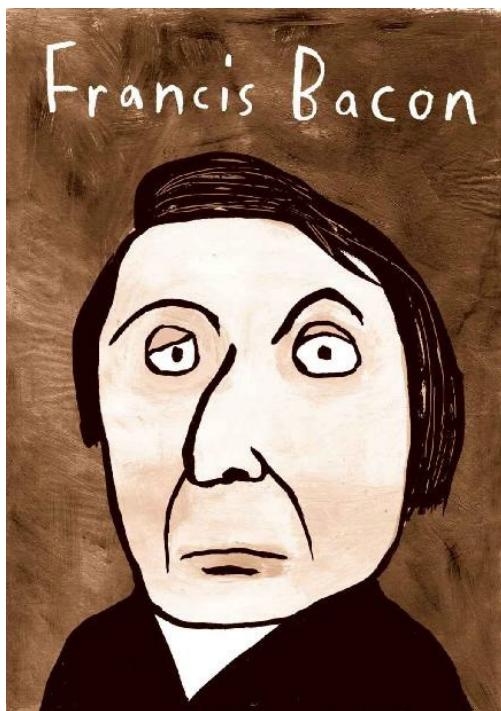
事情源于他同荷马的译者弗斯（1751—1826）的一次争论，弗斯想用符合古典发音的方法来翻译古希腊神明的名字。例如Zeus（宙斯）要翻成Zevs。许多人都不理解这一革新。利希滕贝格用了上面的例子来反驳弗斯：“在西班牙人看来，Zevs对一个神的领袖来说是一个多么索然无味的名字，西班牙人甚至给剪烛刀都起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Despavilladera。不熟悉这两个词的人肯定会以为，Zevs才是剪烛花的剪刀，因为这个词听起来确实有‘把东西剪断’的意思。”

练习：反转画面

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计算机博览会上，比尔·盖茨把计算机产业与汽车工业进行了比较，在讲话中，他提出了以下极有意思的观点：“如果通用汽车公司能像计算机行业对待自己的产品那样，不断改进汽车，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开上二十五美元的汽车，并且这些汽车用两升油就能跑一千公里。”

设想一下，你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发言人，你要用极其具有画面感的语言对上面那段话做出回应。你该怎么做？

答案：把比尔·盖茨设计的画面作为出发点，但要从反方向去想。你要回忆起一切计算机产生的麻烦，并想象通用汽车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毛病。在互联网上，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打上搜索“通用汽车”、“计算机”、“比尔·盖茨”这些关键词，或许会找到一些灵感。



/弗朗西斯·培根/

9. 如何高效率地进行“思想收纳”？

当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家的工作看作是最好的生活形式时，他也许想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收藏呵护有加的收藏家，这位收藏家把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观看并寻找新的藏品。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收藏家。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8）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很富有，购买了很多稀有的哲学文章，而且常常是高价购买。据说，他为了购买三卷有关毕达格拉斯（公元前570—前497）论点的文章，花了一百个迈纳^[15]（当时一个建筑工人全年的工资只有大约四个迈纳）。

亚里士多德拥有一个很完整的图书馆，他死后把图书馆留给了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特（公元前372—前287）。但藏书只是哲学收藏的表象，哲学家本身就是思想收藏家。读书——哲学家的首要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收集形式。读书和收集，这两个词在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意思，即通过整理找出值得保存的东西。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用Weinlese^[16]这个词。采摘葡萄同阅读一本书很相像。读者在字里行间穿越，就像是穿过葡萄园，不时地在路上收集精神果实。

许多人为了找到要读的内容，有在书中划线的习惯。一些人用铅笔把重要的地方划出来，并在页边做笔记，而另一些人则使用荧光笔突显重要的词句。还有一些人一边读书，一边把整个段落都抄写下来。这种做法和书一样古老。诡辩学家伊里斯的希庇亚斯（公元前五世纪）就写了一本题为《值得知道的事情的阅读笔记》，他把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中的摘录都记在这本册子里。

亚里士多德也是自然科学家，他收集有关动物和植物的信息。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他常常通过同渔夫、牧人、猎人和旅人交谈来收集资料，他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他当然也收集哲学观点。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提倡自我思考的著作《论题篇》也许就来自于他对定义和论据的收集。

不愿意收集的人不可能在哲学里继续前进。收集哲学论题本身就具有启蒙的效果，因为不存在唯一的观点，它们可以被其他的观点所取

代。一种特定观点的特点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被更好地看清。这就像一枚古钱币，只有把这枚钱币放入一组收藏品中，才能更好地看到它的美丽以及与其他钱币的各种关系。收集定义和观点能有助于人们在辩论中反败为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们有了一定的储备以后，在需要的时候就不会捉襟见肘。

在收集过程中，自己和他人的界限很快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这没有什么不好，思想必须流动，从一个头脑流动到另一个头脑，所以要找到思想产生的源头常常会很困难。人们时常会发现，那个被认为是源头的奇异脑袋其实也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想法。虽然我们不应用别人的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但那些坚持只用自己的想法的固执之人也只会降低自己的创造力。

如何收集完全取决于收集人本身。许多人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想法和观点记下来，记在一个本子上。与笔记本不同的另一种做法是做一个卡片箱，这一做法自十六世纪以来就有了。苏黎士的全才康拉德·盖斯纳（1516—1565）是这一做法的发明人。他建议把所有重要并可以使用的东西都记在一页上，而且要用质量好的纸张，然后用剪刀裁开并进行分类。从那时起，卡片箱就越来越受人喜爱。因为收集资料决不是什么死气沉沉的工作，也不是和旧东西打交道，而是在培育一个神奇而有表达力的花园，收集人常常会在花园里度过他最美的时光。



卡片箱大到一定程度（也许在几年后才会出现这一情况）时，收集人本人也会感到糊涂。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卡片箱已经无法使用了。一个混乱的卡片箱甚至比一个井井有条的卡片箱更能促进创作力。总而言之，有经验的卡片箱使用者都建议，不要按固定的学科分类，而是要让卡片箱逐渐地生成一个由想法和笔记组成的网络。下面是由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提出的一个使用说明：

1. 把A4大小的纸从中间剪开，做成你的记录卡片。
2. 在这些卡片上写下你现在想到的事情，你认为有意思的事情，或者你听到或读到的有意思的东西。
3. 只在卡片的一面记录所思所闻，这样一来，虽然卡片量增加得很快，但你仍然可以在卡片里翻阅，而不需要把卡片抽出来。
4. 把所有有关同一个话题的卡片都放入同一个抽屉里。
5. 用一个同内容有关的字母标记抽屉（例如P^[17]指戏拟），把这个字母也写在抽屉里的所有卡片上。
6. 给抽屉里的每一张卡片编上号码（例如P9）。这样理论上而言每一个卡片都能被找到，只要它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7. 在每张卡片上写上与之相关的所有卡片的号码。这样一来，尽管每一张卡片只能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但它可以显示其他的卡片，而其他的卡片上又注明了更多有关的卡片。如此，卡片就会有其自己的网络，使用卡片箱的时候，也就是在使用这些网络。
8. 如果卡片只是摘录书上的原话，建议要把这类卡片单独做成一个卡片箱，并根据作者来归类。

如果定期充实卡片箱的话，几年之后，就会出现一种思想体系，人们不只是单向地往这个体系里输入内容，也同样可以从中提取创意。你从一张卡片翻到另一张卡片，就会发现一些灵感。这些几乎是自动产生的偶然组合会使我们产生新的想法。尼克拉斯·卢曼在上大学的时候就

开始建立他的卡片箱，他甚至认为，卡片箱要比他本人更聪明，卡片箱是一个可以进行交流的东西。他说，由于有了卡片箱，他的著作几乎是自动写成的。

那些觉得卢曼建立卡片箱的方法比较麻烦的人，也许培根的方法更为适用。这一方法并不是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所创，而是与他同名同姓的画家培根（1909—1992）的发明。这个培根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拥有一个没有抽屉、只分区和层，甚至还有泥团的“卡片箱”。此外，人们还可以走进他的“卡片箱”。是的，培根本人就住在里面。这一卡片箱包括艺术家伦敦画室的地板、家具和墙。如何建立培根式的“卡片箱”，可见以下的提示：

1. 收集报纸，把报上的文章和图片撕下来，扔在地上。
2. 把书和广告目录中有意思的页面撕下来，扔在地上。
3. 收集朋友的照片或你自己的照片，还有X光照片，用沾满油的手指去抓这些照片，并把照片扔在地上。
4. 把老唱片扔在地上。
5. 把你自己的旧油画（和草图）撕碎或让别人撕碎，然后扔在地上。
6. 把旧衣服和鞋扔在地上。
7. 在这些东西上泼上油彩或啤酒，好让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或凝成块。

如果用这种方法干了几年的话，就会产生很可观的一堆东西。就像好的葡萄酒一样，“卡片箱”也需要发酵和成熟，而且还要经常受到摇晃，甚至用脚踩。有些人也许会忍不住地问道，如何使用这一“大杂烩呢”？如何重新找出这些纸片和画片呢？当然，如果有目的地寻找某一张纸片或画片是没有成果的，尽管如此还是能找到一些东西，即通过来回地走动或在纸片和画片中到处乱翻。在这样的寻找过程中，原来的秩序自动被打乱，并形成新的秩序。然后人们就可以在地板上观察新的组合，搜集灵感，并抓起一些东西进行加工，也就是把这些东西扔到新的

位置。

有人证明培根本人就是这么工作的。他坦承：“处于混乱中的我，感觉非常舒服，因为混乱能激励我创作出新的绘画作品。”他的不少作品就是受被撕碎的、被折坏的和被粘贴的照片启发。这些照片非常偶然地从纸堆里露出来，引起了他的注意。

培根他死后，他的继承人把他堆满画片和纸片的画室赠送给一家有名的画廊——休·莱恩画廊。培根是二十世纪最重要和最昂贵的画家之一，所以画廊马上派了一个考古小组去考察那堆混乱的东西。这些专家把每一个碎片都保留下来，拍照并存储到计算机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运到博物馆，恢复原状。今天在大师的故乡都柏林可以参观这个画室。

游戏：我属于哪种读书类型的人？

阅读是一种收集的模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有的人逐页读书，另一些人只是把读书看成是点缀。有些人买书，另一些人借书。下面是对各种读书类型的一个总结，还附加了一个有关偷书的故事，我们应该十分感谢那个偷书人。

① 喜欢展示书的人

按照你的看法，书籍主要是用于展示的，好让书架看上去不那么空。所以你只有精装书，这些书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可以让书柜显得很高雅。书是根据大小排列的。

② 摆弄图书的人

这些人必须把书拿在手里，检查一下书到底有多结实。有些书外观很不错，看起来很结实，而有些则很松懈。你使劲地把书拧来拧去，使得每个关节都发出声响，直到散架为止。另外一些书看起来就已经没有生命了，而且旧得只要碰一下就会散架。你当然知道书是用来读的，但你宁可去检查每一页。在翻页的时候，你会把页面抚平，并用指甲在上面蹭来蹭去。

③ 重视知识的人

阅读必定会带来好处，至少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否则就不值得去读书，所以你最喜欢读的就是专业书。有时也看小说，但只在假期这么做。没有笔在手中，你不会看书。从一页到下一页，书里的文章就变成了你的笔记，但没有过脑。当然这样看书要快一些。

④ 恋书者

你爱书籍，特别是老书。你不是在读，而是在看、在感觉和嗅气味。在有些书里，你还发现远古年代的芳香。你拼命地吸取那种气息，感觉到很大的享受。你非常熟悉字体和书籍上的小花饰、纸张的类型和出版社。你在拍卖行购得珍本善本、头版书和老版本，或者去偷这些书。你收藏了许多书，而且有一些是孤品，但你很少读书。

⑤ 读书上瘾者

如果你身边没有书，就会感到不安。要是你去度假，你大约会带上三公斤的书，这远远超出了你的阅读量。你在家有许多书，熟悉每一本书，就像动物熟悉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样。你可以很快就在书里找到你想找到的地方。与人的接触对你来说，只是阅读两本书之间的一个暂时现象。有些书你还必须去偷，因为这些书买不到。在紧急情况下（从理论上来说）为了书你还能去杀人，不过当然还没有真发展到这一步。

⑥ 喜欢因书拍案而起的人

书籍会让你激动，尤其当书里有些错误的时候。你只要一拿起一本书，就会气得直哆嗦，越翻就火越大，直到你无声无息地把书合上为止，就好像是在吵架时把门关上一样。一般来说，合上书的时候你会说出你的判决，例如“什么玩意”或“都是胡说”。在合上书的时候，你达到了一种强烈的兴奋状态。你可以用两个手指关书，这样书就蹦了起来，马上会自动地关上。

附录：偷书贼和西方

有书癖的人是些疯狂的收集家。他们为了得到稀有的书籍，可以不惜一切。冯·阿柏里康（死于公元前87年）就是其中的一个。下面我要讲述他的故事。他曾经因为偷书而判过刑。但是在书籍的历史中，他占有重要一席，因为他使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免遭损失。如果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没有被拯救的话，也许由科学造就的欧洲文明就永远不可能诞生。

对亚里士多德的同代人来说，他只是许多哲学家中的一个，而哲学家是特殊一族。对许多人来说，哲学家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英雄，而只

是一群古怪的人。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完全没有用处。再加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离开了雅典，因为那里有人控告他亵渎上帝。所以，在他逝世四十年后，他的作品就遗失了，这当然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名叫内洛斯的人——也是最后亲眼见过亚里士多德的人——在公元前287年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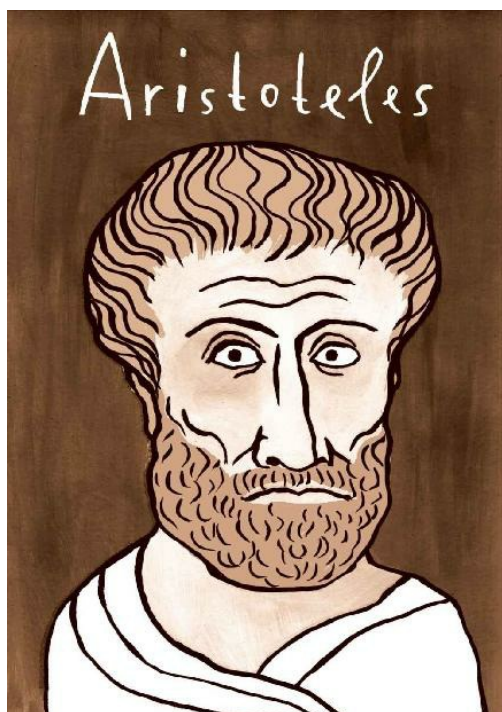
因为他本人并不是学者，所以他把一部分著作卖给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当凯撒征服那个城市后，这些书都被烧毁了。另一部分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演讲稿被内洛斯当作纪念品。当他从雅典中心回到他的故乡斯开普斯（位于今日的安纳托林）时，他带上了这部分著作。后来他死了，他的孩子们继承了这些书籍。但他的孩子们都对哲学不感兴趣，他们把这些羊皮书放在了一个地下室，专心致志地务农。然后这些孩子们过世了。他们的孩子们也离开了人世，最后重孙们也故去了。地下室的书籍受了潮，并开始长霉。这时就出现了阿柏里康。

阿柏里康属于雅典的上层，他非常富有，并曾经拥有过最早的钱币行。他酷爱古老的书籍，不惜重金购买他想要的书。遇到那些不能买到的书，他就设法去偷，例如那些古老决议的原本就被他从雅典的国家档案馆中偷得。他的这一丑行被发现后受到了处罚，并在一段时间内被逐出雅典。但这一结果并不能使他改掉偷书的恶习。有一次，他偶然听说，在海的另一侧，即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还有一些老书。于是，在大约公元前100年，他前往斯开普斯（起码历史资料上是这么写的）。他在那个地下室里找到了那些手稿。由于潮湿和虫咬，这些手稿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总的说来还是可以读的。阿柏里康买下了这些手稿并把它们带回到雅典。在雅典，他让人制作了备份，但没有高兴多久，雅典就被罗马大将军苏拉（公元前138—78）包围和占领。在大屠杀中，阿柏里康也不幸遇难。

对城市进行大肆掠夺的苏拉特别喜欢阿柏里康的图书馆，并把图书馆作为战利品带回罗马。在那里这些手稿得到很好的保护：一个名叫安德罗尼哥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奴隶（大约为公元前70—50）检查、整理、复制和出版了这些手稿，从而使得这些文章能得以流传。

这是一批数量很大的书籍：按照古代的计算，一共106本书，每本书大约二十页。文章写在羊皮纸上，每卷纸平均六至八米长，三十厘米宽。流传下来的著作大约是亚里士多德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我在本书

的导言中提到的《论题篇》也在其中。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其他著作我们只能从古代的目录中获悉，对我们来说，这些书永远地消失了。



/亚里士多德/

10. 用三个圈告诉你什么是“逻辑”

“这不是很有逻辑么！”要让他人相信那些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时，人们常常会这么说。一旦提到逻辑，对方就很少有辩解的可能性。对方就必须同意，情况就是如此。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以逻辑说事的人，常常是错误的，他们说的其实并无逻辑。为了证明这点，当然需要具备一定的认识。

我们常说的“逻辑”一词应该追溯到希腊人。这个词自于希腊语 *logos*，意思就是理性的谈话。很长时间，亚里士多德被看作是逻辑学的奠基人。尽管古希腊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如斯多葛派，对逻辑学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这不能减少亚里士多德的功劳。在《前分析篇》里，他提出了逻辑结论的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也是科学争论不可动摇的基础。几乎没有其他的思想成就能在这么长时间里享受如此高的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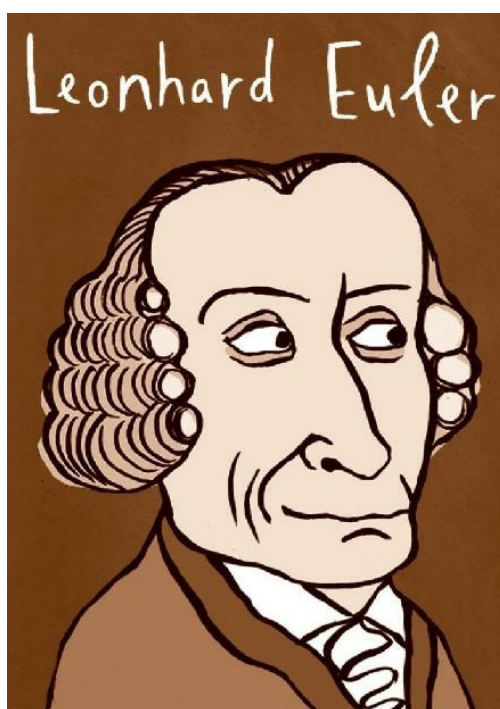
一直到二十世纪逻辑才有了新的发展。新的体系被提出，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非经典的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中，古老的逻辑规律已经不再适用。逻辑出现了全面的数学化。极其复杂的新体系是各种技术用途的基础，特别是用在数据处理中。

对哲学讨论来说，除了一些特殊领域，新体系不那么重要。几乎所有情况下，依靠古典逻辑的一些元素就能解决问题。下面我要说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我建议，从一开始就系统地介绍这一体系，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这一体系的概貌。几个具体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形式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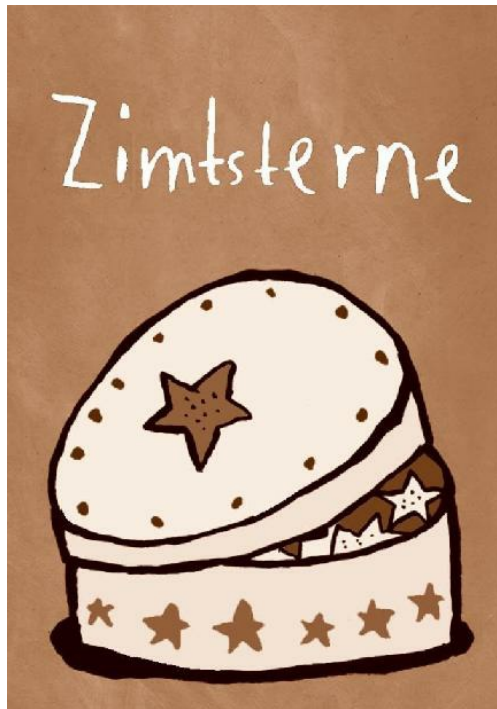
数学家莱奥哈特·欧拉（1707—1783）早在十八世纪就提出了一种用画面来表示逻辑结构的有用方法。在《给一位德国公主的信》中，他以一种无以伦比的方式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基础：用画圈的方式来表示逻辑结论。逻辑学家费尽心血要证明的东西，被他变成了画面，从而显示出意义。这是一种基本的简化，下面我会介绍这种简化方法。这种简化方法的内容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

已知的命题中得出一种新的命题”，前提是新的命题肯定是从已有的命题中得出的。

命题，一般人们把它理解为一个描述某些东西和主项之间从属关系的句子。一般来说，主项和谓项是概念。它们不仅是指示某个物体，而且还把几个物体归为一个整体。应该提醒一下的是，有些命题不适用这个公式，就是那些与事件有关的命题。例如，在“Esschneit”（下雪了）这个句子中，“es”只是形式上的主项。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基本上是一种简化，但这不是任意的简化，而是一种基于欧洲语言语法的简化。



/莱奥哈特·欧拉/



/月桂饼干/

一种命题肯定或者否定某样东西，例如“每一块月桂饼干都是饼”。这里我们有两个概念：月桂饼干和饼干。两个概念通过这一命题产生了一定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月桂饼干”是所谓的主项，通过谓项“饼干”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没有一块月桂饼干是永远不会坏的。”这是一种否定的命题。在这个句子中，主项通过加上一个谓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两种命题是普遍适用的，说明了有关所有月桂饼干的情况。除了普遍的意义外，还具有局部的意义，也就是肯定和否定的意义。例如“有些人喜欢饼干”或“有些人不喜欢甜的东西”的命题。这里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表示至少两个人。在逻辑学中，数字继续减少，表示至少一个人。

所以，在逻辑学中，人们区别下列四种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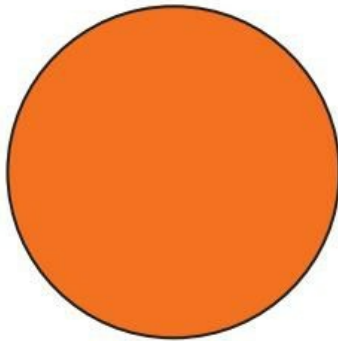
1. 所有的A是B——普遍适用的肯定命题。
2. 没有A是B——普遍适用的否定命题。

3. 一些A是B——局部的肯定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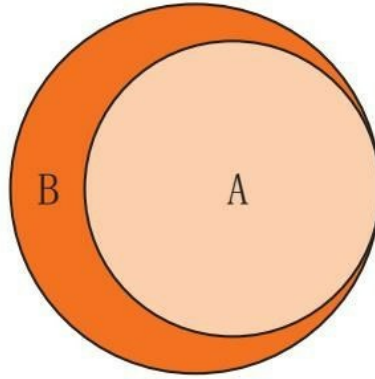
4. 一些A不是B——局部的否定命题。

所有这些命题都包括两个概念：A和B，人们把这两个概念称为名词的词项。第一个概念，正如上面指出的是主项，主项是进行肯定或否定的主体。第二个概念是谓项，即被肯定或否定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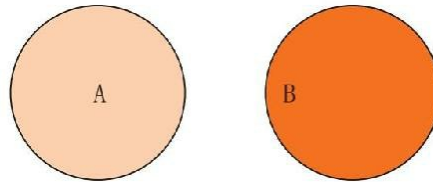
在“饼干是甜的”这个句子里，饼干是主项，甜是谓项。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圆圈来表示四种命题，从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句子的意思。因为像饼干这样一个概念包含无数单个饼干，我们可以把这一概念看作是一个集合，所有的饼干都在这一集合中。我们可以画一个圈，然后说，所有的饼干都在这个圈里，也就是这一集合是一个巨大的饼干盒（有些逻辑学家把这称为是“饼干的宇宙”）。



甜的概念是可以类比的，所有甜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不管是饼干、糖块，还是狂欢节吃的糖果。如果我们说“所有饼干都是甜的”，我们可以让第一个圆圈包含在第二个圆圈里。也就是说，在放有所有甜食的盒子里，还有一个饼干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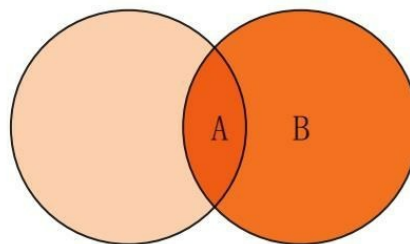


在这里A圈表示主项，B圈是谓项。对普遍的否定命题（没有A是B），例如“没有饼干是不含卡路里的”，可以用下面的图案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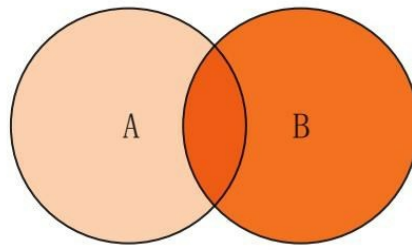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饼干盒同不含卡路里的东西的盒子是分开的。一个范畴里的东西没有出现在另一个范畴里，反之亦是如此。分开的圈圈就体现了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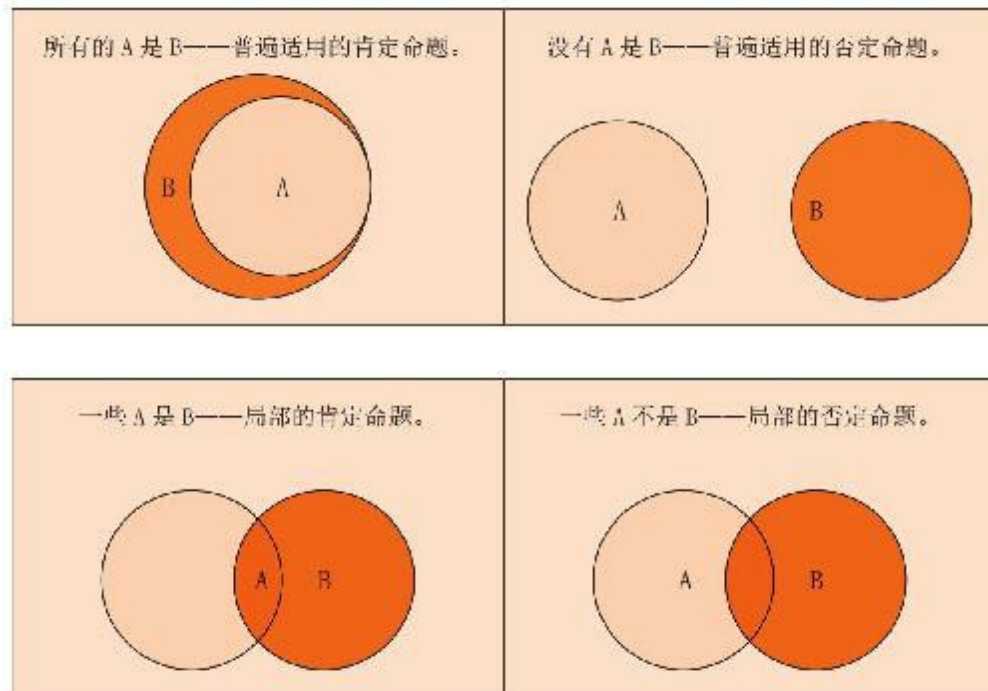
对于局部肯定命题（一些A是B），例如“一些饼干里含有榛子”，圆圈的关系就变成：



对局部的否定命题（一些A不是B），例如“一些饼干里没有巧克力”，就必须用下列图案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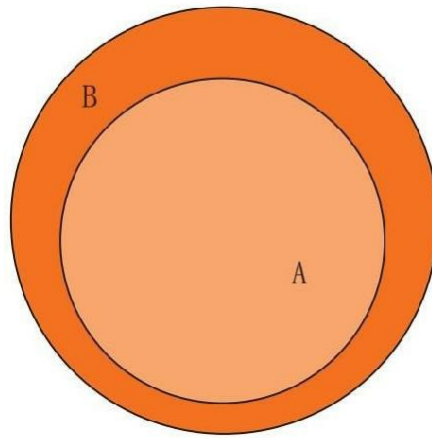


下面是一个概况图，表现了各种盒子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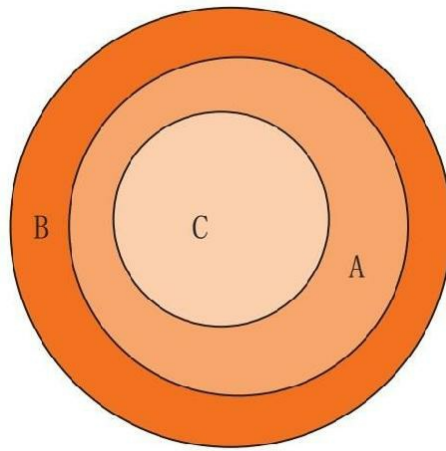


在局部命题中，字母的位置不能任意置换：因为字母的位置表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肯定会出现一个元素。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所有带有图案的命题。画圈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我们可以区分有效逻辑结论和非有效逻辑结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所有的A是B”的命题，可以用下面的图示：



但如果出现了第三个概念，会怎么样？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C完全包含在A里：



从中就可以得出演绎推理的下列公式（形式上的结论）：

所有的A是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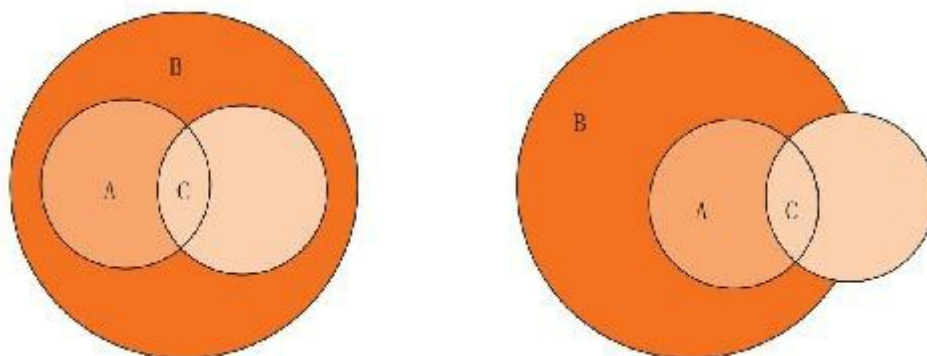
所有的C是A，

所以，所有的C是B。

最后一个句子是推理。在两个前提中出现的A，被称为是中项，因为它把两个句子连在一起。但在推理中，它并不出现。

如果C仅有一部分属于A，那么这一部分当然也包括在B中，这样就

会产生两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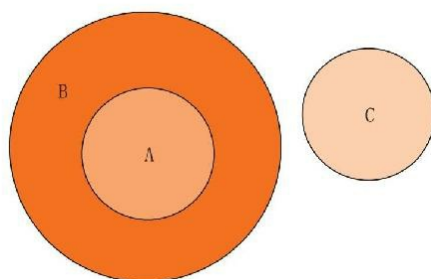
从中可以得出第二个有效结论：

每一个A是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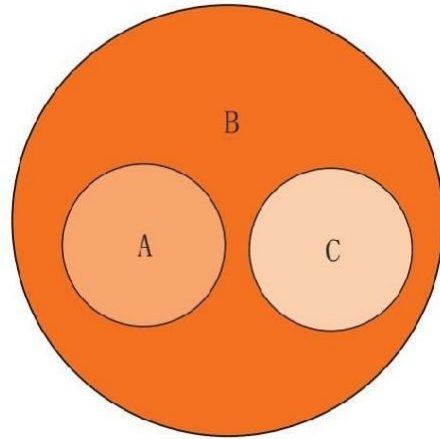
有一些C是A，

所以有一些C是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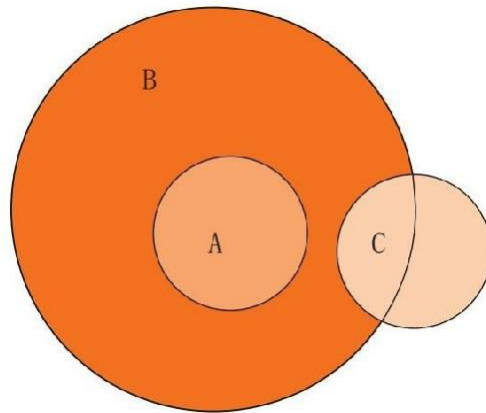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解一个演绎推理。但如果C完全不在A的位置里，也就是，如果第二个句子是：没有C是A，那会怎么样呢？那样，就会产生三种可能性，首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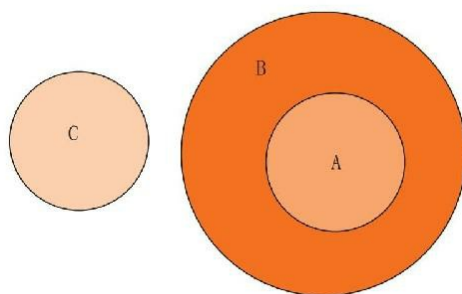
或者是：



或者是：



这三种可能性都成立。那么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得出的结论是，从B的角度来看，什么结论也得不出来，因为不可能出现任何必然的结果，非常肯定的结果。正因为这样，就无法得出结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如果我们非要把这四种命题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至少 $4^4=256$ 种可能性，但大多数的可能性，同我们刚才看到的组合很相似。下面我只集中地讲一下可以得出结果的组合。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如果说，没有C是B的话，在所有的A是B的情况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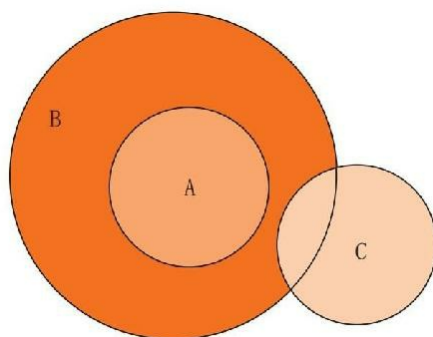


每一个A是B,

没有C是B,

也就是说, 没有C是A。

如果C的一部分处于B之外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也在A之外, 因为A全部在B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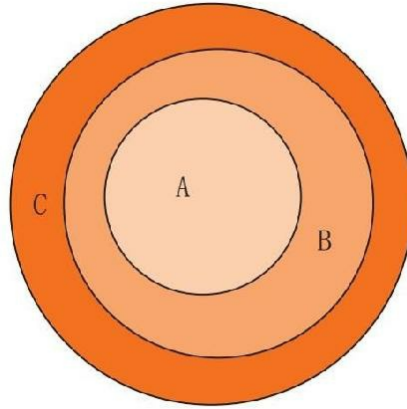
从中可以得出:

每一个A是B,

一些C不是B,

也就是说, 一些C不是A。

结论: 如果C本身包含所有的B, 那么一些C也是A。



所有的A是B,

所有的B是C,

也就是说一些C是A。

如果我们是从一个普遍肯定的前提出发，就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考虑：如果我们从一个普遍否定的前提出发，或者是一个局部肯定前提或局部否定前提出发，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案？为了减少篇幅，我在这里只写出结果：

1.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C都是A,

那么，所有的C是B。

2. 所有的A是B,

一些C是A,

那么，一些C是B。

3. 所有的A是B,

没有C是B,

那么，没有C是A。

4. 所有的A是B，

没有B是C，

那么，没有C是A。

5. 所有的A是B，

一些C不是B，

那么，一些C不是A。

6. 所有的A是B，

所有的B是C，

那么，一些C是A。

7. 没有A是B，

所有的C是A，

那么，没有C是B。

8. 没有A是B，

所有的C是B，

那么，没有C是A。

9. 没有A是B，

一些C是A，

那么，一些C不是B。

10. 没有A是B，

一些A是C,

那么, 一些C不是B。

11. 没有A是B,

一些C是B,

那么, 一些C不是A。

12. 没有A是B,

一些B是C,

那么, 一些C不是A。

13. 一些A是B,

所有的A是C,

那么, 一些C是B。

14. 一些A是B,

所有的B是C,

那么, 一些C是A。

15. 一些A不是B,

所有的A是C,

那么, 一些C不是B。

16. 一些A不是B,

所有的C是B,

那么, 一些A不是C。

17. 所有的A是B,

一些A是C,

那么, 一些C是B。

18. 没有A是B,

所有的A是C,

那么, 一些C不是B。

19. 没有A是B,

所有的B是C,

那么, 一些C不是A。

20. 所有的A是B,

所有的A是C,

那么, 一些C是B。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 第16种形式同第5种是一样的, 只要把C换成A, 把A换成C, 并以第二种命题来说。这样, 实际上就只有19种形式。在需要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这些形式。如果一个感兴趣的人问道: “亚历士多德的演绎推理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就能回答道: “亚历士多德的演绎推理是研究四种类型的命题, 即普遍肯定的命题、普遍否定的命题、局部肯定的命题和局部否定的命题。在这些命题中, 存在着 $4^4=256$ 种组合。从中要筛选出有逻辑结论的组合, 这些组合是永远有效的, 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违背这些组合的例子。而这些组合都可以通过圈圈来表现出来。”

如果提问的人觉得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规律来予以说明。根据这些规律, 很快就可以判断出什么时候可以得出结论, 而什么时候不可以得出结论。

1. 从两个否定的前提中不能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说，高卢人不是罗马人，凯尔特人也不是罗马人，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什么呢？高卢人是凯尔特人还是不是？从这些信息中得不出任何结论。

2. 不能从两个局部命题中得出结论。如果说，一些狗四处乱串，一些狗长虱子。从这两个信息中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吗？当然，乱窜的狗会长虱子，这有可能，但绝非此不可。

下面还有三个规律，这些规律虽然不是很清晰，但仍然有效：

3. 如果前提中的一个是否定的，结论就一定是局部的。

4. 如果前提中的一个局部的，结论也一定是局部的。

5. 如果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结论也是肯定的。但要注意：即使两个前提都具有普遍性，但结论不一定非具普遍性不可。

另一个重要问题与名称有关。我们在上面得出的结论都是从名称上得出的，这些名称从一开始就指复数的形式，例如“饼干”，“月桂饼干”。换句话说，就是命题的主项和谓项都是概念。

但如果我们的命题是指单一的东西，情况会如何呢？

如果我们说：我现在给你的这块饼干，是月桂饼干。

乍看这是一个局部命题，因为这里指的是一块饼干。如果只有一块的话，那么它要比一部分还要少，所以是不是要把这一命题看作是非常局部的呢？尽管这一命题猛一眼看上去非常令人信服，但还是错误的。因为“我给你的这块饼干”看起来似乎很少，但这里的饼干指的还是所有的饼干。

事实上，一个单数的命题，哪怕一个只牵涉到一样东西，都必须被当作普遍的东西来对待。这一规律使我们能把普遍命题的所有演绎推理都扩展到单数的命题，从而就提高了逻辑学的实际用途。

叙述逻辑

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只对包含两个概念的命题感兴趣，但我们常常会遇到更复杂的命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得出结论，就需要其他的规律。

在一些复杂的命题中，条件句是特别多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条件句，这对其他命题的逻辑关系也会有用。条件句包括两个完整的命题，所以，如果一个命题是正确的话，那另一个命题也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句子：

如果总理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经济繁荣指日可待。

用“如果.....那么”这样的句型连在一起的句子，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的范围，所以就必须寻找新的规律。如何能从这一句子中得出结论呢？一种有效的做法是：有人要说服我们，总理讲过的话都是真的，这时，我们就必须得出“经济繁荣指日可待”的结论。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事实证明经济繁荣并没有近在眼前，这时的结论就是，总理每天允诺的东西不全是真的。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第一种形式：

如果A是B，那么C也是D。

现在A就是B，

那么C也是D。

第二种形式：

如果A是B，C也是D。

现在C是D不成立，

那么A也不是B。

除了这两种形式，没有其他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可能性。而下面流行很广的形式则是错误的：

第一种错误结论：

如果A是B，C也是D。

现在C就是D，

所以A也是B。

第二种错误结论：

如果A是B，C就是D。

现在A是B不成立，

所以C是D也不成立。

我们还是用上面那个例子。如果从“总理不是永远说真话”中得出“经济永远不会繁荣”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同样错误的是，从“经济繁荣确实到来”推导出“总理永远说真话”的结论。还有许多能把几个命题连接在一起的可能性，但这么做更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是：通过连接得出错误的结论。

错误的结论

一个逻辑结论的特点是，如果前提是正确的话，其结论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理不可能失去。这对所有想获得真理的人来说，当然很有意义，恰如一个管理财产的人希望，他的资本在流通过程中至少不贬值。不过逻辑学并不是发现真理的合适途经，因为即使逻辑能从老的命题中得出“新的命题”，但这些新的命题的内容不会超过前提的内容。逻辑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能发现命题之间的关系。出于这一目的，人们主要是在形式学科，例如数学或几何学中进行逻辑分析。而在实际讨论中，发现错误的结论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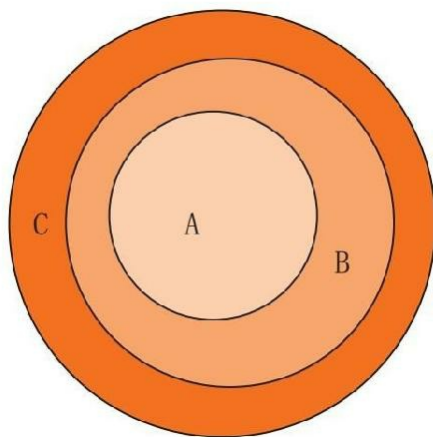
我们来观察一下下面的想法：

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极端分子。

所有的极端分子都很狂热。

所有的狂热分子都是恐怖分子。

如何来判断这一结论呢？这里也可以用形象的图示来说明这一点：



用这个例子很容易就看出来，正确的结论应是（见推论20）：

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极端分子。

所有的极端分子都很狂热。

那么，一些狂热分子就是恐怖分子。

我们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手法来说明上面的第一个结论是错误的，也就是通过从其他的命题中找到一个反面的例子。请看下面的例子：

所有的圣诞老人都热爱孩子。

所有爱孩子的人都很友善。

那么，所有友善的人都是圣诞老人。

在许多讨论中，都会出现错误的结论。这些结论常常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要推论出一个全面的命题，而实际上只能证明一个局部的命题。事实上，在十九个演绎推理中，只有一个推理是允许得出一个普遍肯定的句子，这就是第一种。这当然太少了，所以许多人试图用另外的方式来胡诌出一句普遍适用的句子。恐怖分子的例子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

所有的骗子都应坐牢。

一些政治家是骗子。

那么，所有的政治家都应坐牢。

简短推论

上面提到的那些形式的结论，在日常的讨论中很少出现。反之，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完整的结论，在那些结论中，总是缺少一个前提。许多人通过一个被接受的事实来得出结论，尽管如此，逻辑上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前提。因为仅仅从事实中是得不出任何结论的。听者可以重设一个普遍适用的前提，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批判这一前提。下面是一个来自日常生活的例子：

梅厄先生：不要和那个人吵架，他可明白事理。

梅厄太太：那就是说，我只能和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吵架？

这一回答揭示了梅厄先生的建议背后的前提，并以这种方式提出了观点。凡是和简短推论有关，常常可以这么做，因为在语言的短兵相接中，有时最令人头疼的前提就被忽略了。

许多简短结论是善意的，无意欺骗他人，只是不想让读者或听者感到无聊。亚里士多德本人也经常使用短结论的手法，他把这一手法称为“省略三段论”。例如在讨论私有财产时，这一讨论不是以复杂的演绎推论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把作者认为所有理所当然的东西都省略掉。他在《政治学》中，用这一方式鼓吹私人财产的优越性：“如果大多数人共同拥有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得到的爱护是最小的。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对集体的东西却很少上心，即使关心也是因为与自己有关。”要得出保护私人财产优先于财产社会化的结论，其前提是有必要尽可能地爱护财产。但因为这个前提是大家公认的，所以去掉也合理。

似乎符合逻辑的逻辑

现在就逻辑的问题还要提一点别的内容，即似乎是逻辑的逻辑。这是一个我刚刚发明的命题，是指那些尽管合理、但与上面提到的结论相比不太严格的结论。这些结论都与极大的可能性有关，也就是在这些可能性中间还有一些可信的结论。一种特别重要的模式如下：

X要比Y更有可能性。

X不存在，

那么Y也就不存在。

例句：

他竟然连烤一块冻比萨饼都不会，

又怎么能做圣诞节吃的饼干呢？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那些连容易的事情都不会做的人，做困难的事情就肯定会失败。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绝对可靠的结论，这就使它区别于上面所讲过例子。但如果是在同一个上下文中间移动，这一结论又有其成立的地方。

下面的例子也是似乎符合逻辑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上面那个句子的置换：

X要比Y更不可能。

X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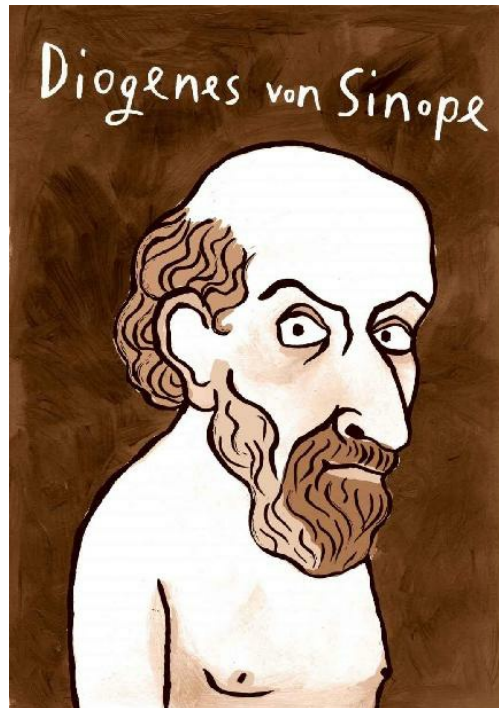
那么Y也存在。

例句：

他是学过数学的人，

所以他当然能管理俱乐部的财务。

这一结论模式也常常是有效的。但在一些情况下，会得出一个错误的推理。这种模式不那么严格。只有认清“似乎符合逻辑的结论”的使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类结论，否则的话，这些结论就会成为滋生偏见的土壤。



/西诺普的第欧根尼/

11. 为什么特立独行的人更容易红？

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挑衅。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生前就是不断引起公愤的典范。他衣衫褴褛的外表就是对公众的挑衅，与他那些富裕的学生不同，他从不佩戴首饰，而且永远光脚走路，这既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欣赏，也遭到了一部分人嘲笑。他对普世价值观念，如成功或者富裕，都提出了疑问，或者嘲弄。当他因为亵渎神明被起诉和判决时，不但没有谦卑地为自己辩护，反而指责法庭无能。他要求法庭给予他荣誉而不是惩罚，因为他对年轻人的影响是雅典的幸事。法官非常恼火，决定用毒药把他处死。

挑衅的历史并没有以此而告终。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又把这一历史推向新的高峰，其追随者中还有一小群犬儒主义者。苏格拉底的清心寡欲给一个名叫安提斯泰纳斯（公元前455—前360）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成为了这一流派的创始人。然而使这一流派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学生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00—约前328）。他把苏格拉底简单的知足心变成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即兴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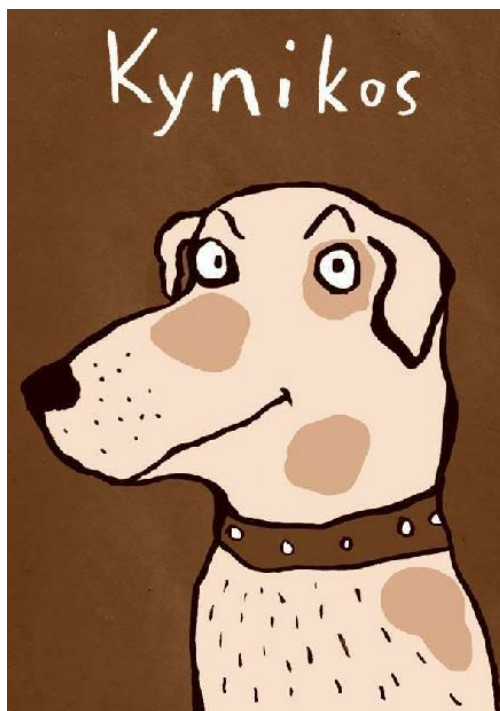
第欧根尼认为，人们应该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因此断定自己发现了通向幸福的捷径。在实际生活中，这条捷径大约是这样的：第欧根尼在雅典的集市上公开手淫，同时还扬言，人不能通过搓肚子来满足食欲，实在太遗憾了。

第欧根尼居无定所。据历史记载，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一个一人高的、泥做的储物桶里，这就是有名的第欧根尼桶。如今我们能找到的第欧根尼仅有的画像，是保存在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中的一幅马赛克拼贴画。那上面表现的就是第欧根尼在桶里的样子。第欧根尼靠野草、橄榄和大麦面包充饥。有时，他披一件羊毛大衣，不然就赤裸着身子。他喜欢对别人竖中指，所以他是朋克文化最早的身体力行者。他喜欢在众目睽睽下放屁，为此雅典人称他为狗。在雅典人眼里，狗是最粗俗低级的动物，因为狗肆无忌惮地放屁，见残羹剩饭就翻，并在公共场所满足自己的性要求。第欧根尼却把这一称呼看作是对自己的尊称。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给他立了一个上面刻有狗的纪念碑。狗成为了整

个学派的标记——犬儒主义者（Kyniker）这个词的词根是希腊文里的 kynikos，意思就是像狗一样的下流。而今天的玩世不恭者（Zyniker）与他们相比只是些恶毒的讽刺者罢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希望旁人把他们的行为理解为讨论和抗议的一种形式。

第欧根尼以他的风趣和应变力而著称。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来找他，并问他想对自己这个伟大的国王提出什么愿望时，第欧根尼只是眨了眨眼睛说道：“走吧，别挡住我的太阳！”但他不仅仅只是说一些警句，还写过悲剧，这些悲剧自然都带有犬儒主义的味道。据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政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颠覆了所有传统的习俗，例如，他认为受国家支持的婚姻关系应当被废除。他提倡自由的性爱。这当然会引起很多问题，目光敏锐的第欧根尼自然也想到了这点。对此，他的解释是，在一个性爱自由的社会中，正因为无法判断谁是谁的孩子，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父母，当然也就必须共同关心孩子的教育。

他所有的悲剧也都以这样的观点为导向。这些悲剧没有能保存到今天，但我们可以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其他作家的评论中，推测这些悲剧的内容。据说，他曾经写过一版《俄狄浦斯》。在经典的《俄狄浦斯》版本中，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挖掉了自己的眼睛。而第欧根尼相反，他认为，同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性行为并非不虔诚的行为，所以在自己的剧本中续写了反转的结局。所以我们必须把他的《俄狄浦斯》看作是“为什么不？”这一哲学的早期代表。



/犬儒主义/

据称，在另一个犬儒主义的剧本中，有一个人发现，他吃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故事里，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用下面的哲学思维来安慰大家：“按照正确的看法，所有的东西都相互包含，相互渗透：面包里有肉，蔬菜里有面包，同样在所有身体里，各种东西都通过看不见的毛孔渗透进来，然后又蒸发出去。”因此，第欧根尼得出的结论就是，吃自己孩子同吃其他东西没有原则上不同，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所以没必要小题大做。

第欧根尼的戏剧作品想表现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改铸钱币”。在希腊语里，这具有双重的意义：希腊语词nomisma不仅仅是指钱币，也有习俗的意思。第欧根尼确实颠覆了习俗。

挑衅的历史后来是怎么继续下去的呢？犬儒主义之后，反叛的哲学结束了。第欧根尼死后，罗马人占领了雅典。哲学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得以恢复。然后就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哲学虽然重新复苏，但没有给犬儒主义留出生存空间。所以我们就离开第欧根尼的桶，转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公社”。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来自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一个极左分裂小组。公社创始人的议题同老犬儒主义者的议题非常一致：抗议、革命、自由爱情。公社创始人汉斯·狄特尔·昆泽

曼在回答“为什么要成立公社？”这一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有达不到性高潮的毛病，并希望公众能知道这点。”

不过，他们关注的当然不只是昆泽曼的个人问题。公社成员打着“什么时候柏林的商店会着火？”的口号，抗议越南战争。这一口号被理解为是怂恿纵火，因此昆泽曼的朋友弗里茨·陶符尔（当时二十三岁）和赖纳·朗汉斯（当时二十七岁）被送上了法庭。他们俩一步一步地把法庭审理变成了一场闹剧。仅仅是两位被告的亮相，就预示了后面将精彩至极。

赖纳·朗汉斯和弗里茨·陶符尔穿着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装异服出现在柏林州法院的法庭上。把自己弄成满头鬃发的赖纳·朗汉斯活像一个巴布亚巫医。他身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上搭鹅黄色外套，外套的扣子是桔红色的，领子是中山装式的，袖口则是蓝色的。一对伤感的“猫眼”透过鬃发和无框圆片眼镜小心翼翼地望着四周。而弗里茨·陶符尔则穿了一件长至膝盖的桔红色外套，外套的银扣子闪闪发光，紫色的袖口和中山装式领子十分刺眼。相比之下，他的头发、胡子和无可挑剔的发型非常得体，他目光柔和，绝非杀气腾腾。陶符尔下身的穿着则表现出对西方着装要求的讽刺：细条纹的黑裤子，配上黄袜子和麂皮鞋。很明显，两位大学生的这副打扮，是为了颠覆权威的穿着要求。

几个指向明确的玩笑让法庭炸开了锅，也让这两个被告很快反客为主，成为了审讯的真正法官，审判也失去了控制。而开庭时一切正常。法官瓦尔特·施维特纳尔当年五十三岁，显然代表了被告父辈那代人。他开始审讯：

施维特纳尔法官：陶符尔先生，请用几句话介绍一下您的简历以及您的成长过程。

陶符尔先生：今天是我第四次因为政治案件出现在法庭上。通过第一次审判，大家对我的了解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然而那次审判因为法庭的无能而失败。

坦格检察官：我请求法庭记录：被告陶符尔说，第一次审判因为法庭的无能而失败。我要求法庭以破坏秩序罪给予他惩罚。

陶符尔先生：正因为那次是因为法庭的无能而失败，所以我认

为，为了弄清复杂的事实真相，不妨让检察院和法庭的成员也介绍一下自己的简历和成长过程。我想，公众有权利提出这一要求，而我则会对他们每个人的讲述逐一发表看法。

施维特纳尔法官：不需要您发表看法。

陶符尔先生：我可不会让你们轻松过关。

过一会儿，法庭又考虑要让被告去做一次精神病学检查。被告立即提出反驳。

陶符尔先生：如果法院和检察院的成员也做精神检查的话，我就同意。

这时，法庭里响起激动的叫嚷声，并出现骚动。施维特纳尔法官不得不要求所有旁听者退场。一直到旁听者写下了不再扰乱法庭的书面保证后，才又重新开庭。交锋继续进行。

施维特纳尔法官：尊敬的旁听者，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书面保证，我们看到了。但还是请你们不要制造麻烦。相信你们不会破坏承诺。陶符尔先生，您说想发表一个声明，法庭同意您的请求，但是在声明里，请不要再出现刚才的内容。

陶符尔先生：朗汉斯先生想说几句话。

朗汉斯先生（讽刺地）：我不清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说，但我首先要同意我的朋友弗里茨的申请，而且还要加上以下内容：法院和检察院的成员和被告除了要进行精神检查外，还应该进行智商测试，其全部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布。

陷入极度恐慌的法官们匆匆退场，但马上又回到了法庭，并宣布朗汉斯犯了破坏秩序罪。尽管后来这两个被告都被判为有罪，但法庭的权威受到很大破坏。对1968年那一代人来说，柏林法庭上的那场闹剧是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动摇小市民世界是十分容易的。

当年的英雄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弗里茨·陶符尔住在柏林，他骑着自行车送快递。赖纳·朗汉斯则致力于秘传学。他依然还是犬儒主义

者，挑衅、干扰固定秩序带来的乐趣看起来还一直吸引着他。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在法庭传奇一幕发生了三十年后，他从极左转向了极右，这一变化让许多老朋友吓了一跳。某次接受柏林《日报》采访时，他说：“今天真正的精神领袖应该是希特勒。”哪怕在纪念1968年那代人的怀旧活动上，他也重复了这个观点，令在场的客人大惊失色。同时，他还组建了一个“后宫”。对此，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道，这样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能够大大丰富参与者的生活。这位善于制造公众烦恼的艺术家非常清楚，怎样才能触动大众的神经。

那么挑衅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大多数情况下，它通过重新评估既有的价值观来达到效果。提高低级的东西，例如第欧根尼纪念碑上的那条狗；或者贬低高级的东西。关键是要增加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禁令和惯例的敏感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恰恰是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是最难被觉察的。应变力和勇气也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因为攻击默认的思想观念，常常会遭到排斥和迫害。

今天进行挑衅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干扰一个价值体系固定、组织又很严密的社会要比干扰一个多元化社会简单得多。在人人都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没有东西会引起观众大惊小怪。挑衅的姿态已经过时了，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被淹没在掌声里了，挑衅者成了被社会承认的弄臣。但即使如此，今天，我们偶尔还会听到几千年来闻名遐迩的怒吼声，这一喊声表明，即便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依然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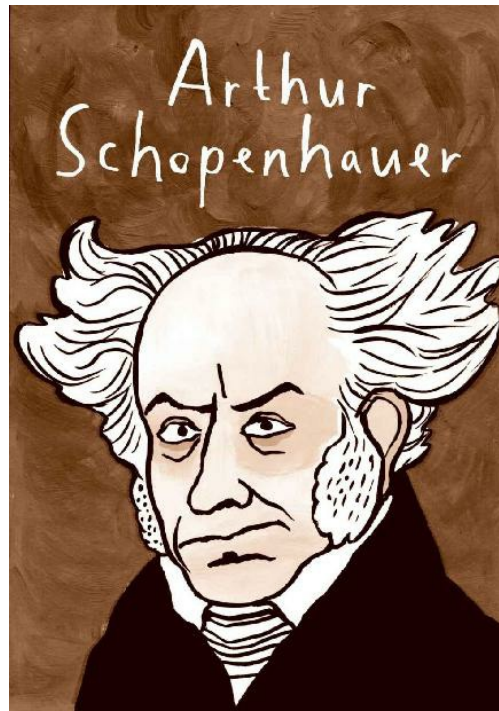
游戏：光脚走路

某个美丽的夏日，我们把鞋脱了，光着脚走路，不仅在家，就是在外也如此——在街上、在步行区、在学校或在办公室都光着脚。走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只有很少的路适合光脚走路。就算漫游在林间小道，由于铺了碎石，光脚走在上面也像是走在长满刺的地方，而且小腿和脚关节还会疼痛不已，就好像是第一次学走路。但另一方面，脚底就像充了电，几天以后，还能感到热乎乎的。

在周围的人看来，光脚走路与赤身裸体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光脚无伤风化，但总让人感觉有伤大雅。光脚族的网站上（www.barfuss.org）记录了他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令人吃惊的是，在德国不仅有人偶尔光脚走路，一直光脚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说，这不会引起身体不适，相反，光脚时间久了，便能敏锐地发现尖锐的碎石、玻璃或针。对于这群人而言，即便在冬天，脱鞋也不成问题，只是不能走得太快，以免损伤韧带。此外，不同国家对光脚族的宽容度也不同。喜欢光脚走路的尤丽亚·费奥娜在她的自述里（见上文提到的网站）写道，在法国和德国，她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在美国常常有人要求她穿上鞋。作为有经验的光脚族，她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场面：“2001年早春，我在佛罗里达时，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争吵。我当时引用了美国宪法（‘自由的国度……’），我还说，真不敢想象，这个国家允许私人持有武器，却不允许他们脱鞋。这样一来，对方就无话可说了。”



/光脚走路/



/叔本华/

12. 人身攻击，哲学家也不能免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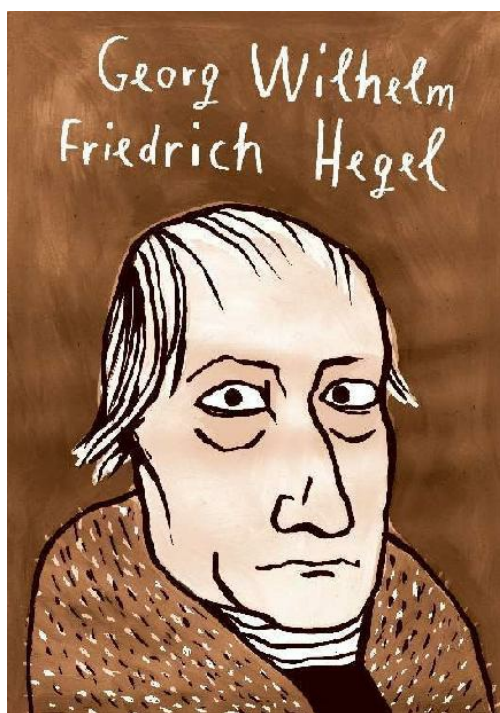
和别的领域不同，人身攻击在哲学中经常出现。好些哲学家在雅典因为蒙上了亵渎神的罪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受到敌对同行的起诉，被驱逐和流放，甚至被处以死刑。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非常不客观，但谁可以保证在哲学中永远实事求是呢？倘若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哲学讨论最理想的境界了。就连思想家也喜欢使用破坏性的手段，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实事求是的层面转换到人身攻击的层面。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破坏的游戏，这一话题能写一本书，但在这本书里写一章就足够了。写这一章的目的不是鼓励大家去模仿，而是要让大家看到，这类游戏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毁灭他人的游戏，即使只是动动嘴也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哲学历史上好些充满仇恨的悲歌应归功于哲学家叔本华，他的悲观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对生存的诅咒。他在哲学领域的努力受到一种永不沉睡的仇恨的驱使。有的时候仇恨会出击，有的时候则是默默地燃烧，不管怎么说，这种仇恨都能被人感觉到。如果一个哲学观点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会大发雷霆。例如在讨论康德的哲学时，叔本华认为，康德的绝对律令是“给驴子用的歇脚垫”。然后他又抨击康德“人必须从道德上尊重其他人，但不包括动物”的观点。身为动物之友的叔本华大怒道：“正因为……基督教的道德没有考虑到动物，所以动物在哲学中也失去保护，它们只是‘东西’，可以用作任何目的，例如被活活解剖、被追赶、角斗、竞跑以及被绑在石头车上鞭打而死等等。”

以上是叔本华对康德的发难。他对其他的学家也无好话可说。他把对手黑格尔（1770—1831）称为是“冒牌货”，并宣布黑格尔的哲学是“滑稽戏”。他对黑格尔的著作写过一句耸人听闻的评价：“无论什么时候打开《精神现象学》，我都会感觉到，自己打开了通往精神病医院的窗户。”叔本华在柏林试图与黑格尔竞争，他故意把自己的“世界本质和人的精神的理论”的讲座放在黑格尔课程的同一时间。这一做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来听叔本华讲课的只有五个学生，而在黑格尔的课堂上坐有两百多个听众。不言而喻，叔本华的责任对正处于巅峰地位的大师

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



/黑格尔/

下面的例子情况就不同了。我现在要讲的故事，第一眼看起来太文雅了，几乎没有任何一处表现出暴力，连一个粗口都没有，所有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就事论事。事件的主角是玛丽昂·佐莱特和伊丽萨白·施特勒克。她们曾是科隆哲学所多年的同事，但她们俩很不一样：施特勒克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发表过许多著作。相反，佐莱特教授在哲学界没有什么名气。她在发表博士论文（共六十四页）以后，只出过一本书（五十五页）和几篇文章。想必女同事的国际声誉让她感到不安。

1990年10月2号的晚上，伊丽萨白·施特勒克从汉堡出席一次会议回来后，在自己办公室的写字桌上发现了佐莱特教授的一本书。同玛丽昂·佐莱特过去的著作相比，这部作品的厚度惊人——超过四百页。看起来作者非常严谨，因为书中到处是注释和引文。但光滑的书皮下面隐藏着激愤。书的标题是《对伊丽萨白·施特勒克有关数字和空间的博士论文的批判性调查》，并附有对她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的评论文章。披上研究外衣的论文实际上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表演。玛丽昂·佐莱特声称，施特勒克的博士论文是抄袭之作，把别的书里的东西拼凑在一

起，都没有注明出处。她通过细致的比较来证明这一点：左边是施特勒克的博士论文中的段落，右边是施特勒克“占为己有”的有名的和不太有名的思想家作品中的相应段落。

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施特勒克难道是一个骗子？这本书是在玛丽昂·佐莱特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的，她把这一出版社称为是P&P出版社，意思是出版和玩蛋。公众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在许多文章中，如《时代周刊》和《科隆城市报》都从这本书中摘录了很多内容，玛丽昂·佐莱特的看法被认为是可信的，抄袭似乎已成定论。科隆大学哲学系也支持攻击者，并宣布施特勒克的博士论文达不到所要求的标准。授予施特勒克博士学位的波恩大学被要求进行表态，于是校方很快成立了一个考试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委员会接受了施特勒克的解释，那就是她当时提交给考官的论文已经找不到了，那一版论文里有更多的注释。另外，委员会还为被攻击的人辩护道，那个时候对引用的要求不像今天那么严格。委员会一致的判决是：施特勒克夫人没有抄袭，她可以保留自己的博士头衔。施特勒克获胜了。

不久后，被攻击者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出来打抱不平。在《哲学信息》杂志上的一封公开信里，有一百多个教授批判了在这件事上“媒体的片面报道”，他们认为，施特勒克夫人鉴于其许多著作理应获得尊重。这时，玛丽昂·佐莱特陷入困境。报纸和杂志发表攻击她的文章，说她怀有“盲目的仇恨”，并把她称为是“已被证明的不合格的学者”。伊丽萨白·施特勒克开始予以反击，并起诉玛丽昂·佐莱特，要求她赔偿精神损失。施特勒克在起诉书中不仅提到了她所遭受的名誉损失，而且也提到了受到玛丽昂·佐莱特指责后，她身心受到的打击。曾经有好几个月她无法工作，并且由于严重的健康问题不得不住院。但法庭的判决并不能满足起诉人的愿望，被告既没有坐牢，也不用赔偿，只是达成一项协议：玛丽昂·佐莱特有责任把后记中侮辱对方的八行字删掉。但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报纸上又发表了新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新的官司开始酝酿。后来公众突然就不关心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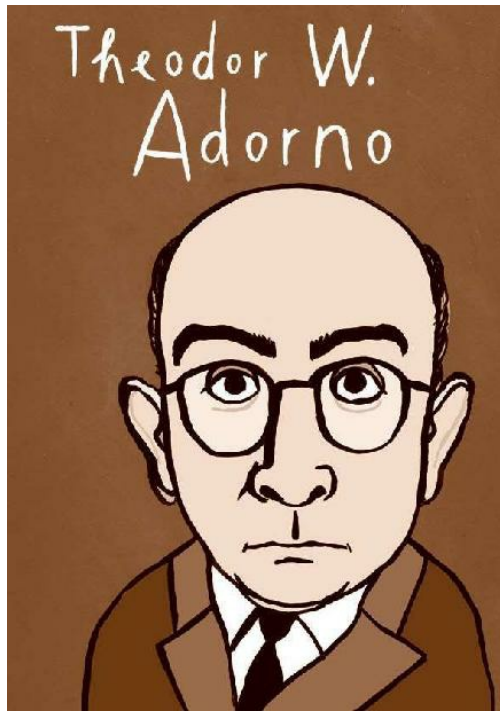
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篇博士论文究竟是不是抄袭呢？对毁灭性游戏来说，看一看各方如何看待攻击者，无疑是最有意思的。那些站在施特勒克夫人一边，并认为她没有抄袭的人，倾向于把玛丽昂·佐莱特的动机视为低下的，是对对手的病态的仇恨或嫉妒。在波恩委员会作出决议后，许多哲学家就持有这一态度，包括施特勒克夫人

自己和一些记者。而那些不顾委员会的决议，仍然坚持这一看法的人——这些人也为数不少——则用另外的目光来看玛丽昂·佐莱特和她的动机。有名的哲学家汉斯·瓦格纳认为，玛丽昂·佐莱特的著作中表现出的愤怒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攻击一个在全世界都有朋友并有地位的哲学家需要勇气。

最终，这一故事没有留下胜利者。玛丽昂·佐莱特在自己对这件事的记录中表示，她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形式上的胜利者施特勒克也没有因此而高兴。她的名誉不可能全部得到恢复。2000年出版了她的著作《以科学伦理的名义：一个大学教育遭受毁灭的年代1990—1999》。封面是黑白两色，就像是讣告的颜色。这是施特勒克的最后一部著作，几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下面是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人身攻击并不总是以撕破脸皮的方式发生，而是还可以以“玩笑”的面貌出现。一个强大的攻击如果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的话，更容易被容忍，甚至受到欢迎。下面的例子是哲学家阿多诺所经历的“胸部攻击”。这一攻击发生于1968到1969年学生运动期间，是这位哲学家所经历的一系列攻击中的一个。

这一事件众所周知。1969年4月22日，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第六教室开始《辩证思考维入门》讲座。大教室里非常乱，还有人吹口哨。这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行动小组策划的“扰乱行动”。阿多诺说：“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课上还是不上。”这时，三个身穿皮夹克的女大学生走向他。她们围着讲台旁的教授先生跳舞，还试图亲吻他。后来她们拉开各自的外套，把赤裸的乳房贴向教授。大家哄堂大笑。受到惊吓的教授拿起公文包，挡住自己的脸，跑出了教室。这件事被当作逸事流传。德国作家罗伯特·格哈尔特甚至还写了一首充满幽默的诗。和现实有所不同的是，诗中只出现了两位女主人公，整个场景被描绘如下：



/阿多诺/

突然这两个人上了台，
四只乳房大得吓人，
一丝不挂，
完完全全裸露着……
充满了诱惑，摇摇摆摆，步步逼近，
要吞下整个男人，
咄咄逼人，气势汹汹，
要颠覆所有的精神，
向教授发起进攻，
教授沉默不语，尴尬不堪，

恐慌地逃窜。

这样的场景，谁不想一睹为快呢？一切看上去都很开心，但是继续读下去，就会让人有点发愣：

乳房的攻击，

给予教授致命打击，

就在这一年，

他离开了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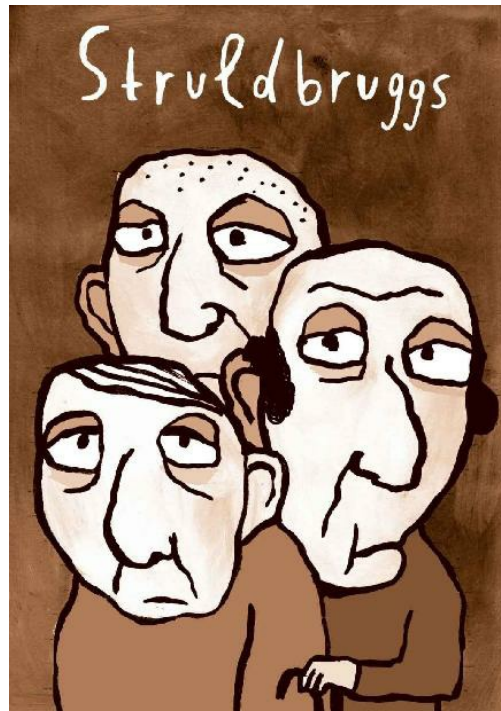
是的，阿多诺确实是在那年过世的，准确时间是1969年8月6日。这是否和那次攻击有关呢？诗歌里说得轻描淡写：

所有的创伤都会被时间治愈，

只有阿多诺老兄没能幸免于难。

谁知道呢，也许这件事对阿多诺来说可没那么好笑。事情发生后不久，在接受《明镜》周刊的访谈时，我们能清楚地感到这位哲学家内心的混乱。电影人吉多·克诺普是见证人。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大学生活。他说：“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我坐在很前面，感到尴尬。三对乳房就在他眼前晃动，这个书呆子男人试图用公文包进行抵御。我发现，他完全不知所措，用公文包挡着自己，流出了眼泪。后来助手们把他带走了。这场面真是令人感慨。”

他哭了吗？诗歌里没有提到受害者的眼泪绝非偶然。笑和同情是矛盾的，如果其他人感到高兴，谁又会指指点点呢？那些抵御可笑事情的人，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致。笑转眼就会使那些攻击者得到更多同伙，因为一起笑是很开心的事，且不管笑什么。所以在笑声的掩护下，使人缴械投降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手段。



/小人国/

13. 在头脑中建一座实验室

在古老的年代哲学里经常会使用寓言。现在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思想实验。

现在人们不会用“从前.....”开始谈话，而是说“我们可以设想.....”或者是“我们想象一下.....”这就是说，他们扮演的是自然科学实验者的角色。这么做也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想象尚未出现、但有可能出现的东西。例如，如果赢了彩票会干什么？但这还称不上思想实验。只有想象的故事被用作讨论的依据，并证实某一个特定的看法，才算是思想实验。

“你想象一下，现在打仗了，却没有人去打。”这句话出自一位古典大师之口，听起来像是和平运动的口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思想实验。如果士兵、将军甚至敌人都无视宣战的话，宣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思想实验不是指出了一条阻止战争的简单道路吗？至少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和平主义者都这么看。

永生

如果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实验有时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可以把下面的问题作为例子：如果人不一定非死不可，生活会怎么样呢？如果能永远活下去，人们就可以实现每一个计划，而且还会获得更大的信心，因为有的是时间，永恒的时间。这时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嫉妒他人，因为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别人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即便不是现在，那就是在一万年以后。人们也不会沮丧和失望，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无止境的人生，就没有理由生气，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当然，也有人觉得永远活下去非常可怕，所以把死亡看成值得欢迎的东西。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就是其中一个。在小说《格列佛游记》中，他为这个话题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

斯威夫特问道，如果人永远不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讲述了小人国的故事。格列佛在一次旅行中得知，小人国的国民永远不会死，他们将在其他会死去的人中间出生。这些不死的人有一个标记，左边眉毛下面有一块红色的皮肤。这块红色的皮肤会随着时间改变颜色，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标记。有这个标记的人就是永生的。

格列佛对讲故事的人说，这太棒了。他认为，那里的人最幸福，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担忧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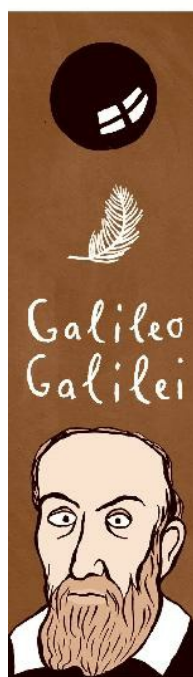
格列佛也设想，如果自己也能永生的话，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幸福。作为永生之人，他可以用其他的爱好来充实生活！他马上要去研究天文学，因为敢肯定，他一定能活到可以检验自己的预言是否正确的年代。如果一颗慧星的周期晚了几千年，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肯定能等到慧星下一次出现。

这时，格列佛的同伴们都笑了，并使劲摇头。他们解释到，永生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们说，从三十岁开始，小人国的人就会忧郁，而且逐渐地就有了老人的奇怪习惯。更可怕的是，这些奇怪的习惯还会加剧，因为他们预见了不死的可怕前景。他们渐渐变得毫无感觉，对人很不友好。他们嫉妒所有会死去的人，因为那些人终将安息。他们失去自己的

记忆，只记得年轻时学过什么。

在他们八十岁时，法律就会宣判他们死亡。于是后代瓜分他们的财产。到了九十岁，头发和牙齿都掉光了，两百岁以后，他们已经无法与人谈话，因为他们的语言已经过时。他们住在自己的国家就像是陌生人。

这一讲述使格利佛大为吃惊，他想象中的永恒生命完全不是这样。听他们一说，永恒生命更像是一种无休止的缓慢瓦解，更为悲伤的是，这一瓦解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很少的人。他不再希望自己能永远活下去。但我们认为，他的这个结论下得太匆忙了。他完全可以说：“小人国的人是在错误的时间不朽。而我把不朽想象成是永恒的年轻时代和永恒的春天，我希望，我能永远二十岁。”这一想法又与思想实验有关，下面我还会提到这点。我们先说一个物理学的例子。



/伽利略/

自由落体中的石头

思想实验也可以用在具体事物上。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在伽利略（1564—1642）身上找到。

这一例子与永生和死亡无关，而是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所有的物体自由坠落时的速度是否都一样？一般来说，我们倾向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掉落的速度更快。一根羽毛掉落到地上的时间难道不是要比一个金属球更长吗？物体越重，掉落的速度就越快，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流行了几百年。但作为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伽利略不相信这一理论，为了反驳这一看法，他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工作，而且还想出来一个思想实验。

他写到，我们可以想象两块掉落的石头，一块比较轻，一块比较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轻的那块石头掉落下来的速度要慢些，而重的那块石头要快些。但如果我们把两块石头捆在一起，那么那块轻的石头就会拖累那块重的石头，也就是说，速度要放慢。但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两块石头放在一起更重了，根据上面的理论，应该比单块石头掉落的速度更快！我们通过一个想出来的例子就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矛盾的。这一思想实验迄今为止在物理学家中还相当流行，并被看作是一个经典例子。不过，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其实也有一些事例，比如降落伞，能够支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18\]](#)。

无知的面纱

实用哲学是考虑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哲学。在这一哲学中，人们特别喜欢使用思想实验的手段。哲学家们沉醉于描绘一些挖空思想出来的场景。例如，在一个载有一百名落水者的船上，这些落水者问道，他们是否应该杀死一个人供大家食用。还有譬如一名消防队员进入一个着火的胚胎实验室，他必须决定先拯救那些试管中的胚胎，还是偶然放在实验室的那个哭喊的婴儿？

我们还是来看一些更加简单的例子吧。首先是一个与绝对律令有关的思想实验，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这个律令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绝对律令就是：“你的行为一定要使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从这一律令中，康德提出要全面禁止谎言。

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思想实验能反驳这一要求，它在文学中也被经常使用，康德也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讨论了这一实验。假设在第三帝国时期，一个人家中藏了一个犹太人。有一天，两个盖世太保站在他家门前，问他是否藏了犹太人。他应该怎么做呢？那个人应该说谎，从而救了那个犹太人（和自己）吗？还是应该说实话，完全遵守永远要说真话的绝对律令呢？

大多数进行这一思想实验的人最终确定，他们本能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说谎是道德的。在许多人看来，一个彻头彻尾只说真话的人是不正常的。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究竟有没有永远都应遵守的道德原则。不管怎么说，这一例子表明，一种思想实验，即使用五到六句话就能解释的思想实验，都能彻底动摇一种有名的理论。

有时候，实用哲学中的思想实验要复杂得多。下面举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分流行。它有一个漂亮的名称——无知的面纱。这个让人联想起东方童话的思想实验的内容是什么呢？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想知道，一个正义的社会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为了找到答案，他想象一群人正在就正确的社会状态进行商谈。这么做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罗尔斯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先决条件，即这些人必须是所谓的盲目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继承的遗产、自己的教育程度或才能一无所知。在有意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盲点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决定，愿意遵守哪种宪法。当然，尽管有这一奇怪的先决条件，这些人要保证就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达成一致，而不是同意一个只对他们有利的制度。

按照罗尔斯的设想，这群想象出来的人得出的基本原则如下：

1. 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同样的自由。
2. 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作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都有利，而且地位与官职对每个人开放。

毫无疑问，这些原则非常值得探讨。尽管如此，罗尔斯的考虑引起了一场争论。思想实验究竟是不是讨论一个社会的“正义”宪法的正确途径呢？难道道德要求不在一种成熟的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人的协商而得以建立吗？否则，这些要求如何才能生效？这些反对的看法主要是来自于所谓的社群主义者。到目前为止，约翰·罗尔斯和社群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

继续思考和变换思考

科学文章中的思想实验有一种奇怪的诱惑力，思想实验是叙述性的，而别的实验都是求证、进行区别或组合，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学习如何批判地对待思想实验。

我们再来看上面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想象一下，现在打仗了，可没有人去。”我上面说明了，和平运动人士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了这一口号。真要这么做，全面的拒绝参战会使战争消失，实现和平。这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但这个说法有什么漏洞吗？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思想实验，来检查这一实验是否有效。那些反对和平主义的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指出，如果我们从理想化的情况，即没有人去打仗，过渡到更现实的情况，即有一些喜欢打仗的人上战场了，这一前提的变化就会动摇整个想法。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今天，一些人参战就足以使其他人遭受战争的苦难。极少的人就能引发战争，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恐怖行为，就会认可这一看法。把思想实验稍微改动一下，就会发现这一思想实验的弱点。

此外，我们也可以证明，布莱希特——大家习惯认为这句话出自于他之口——实际上根本就不认为人们应该避免战争。相反，他是一个竭力主张斗争和战争的人，对反战人士他也没说什么好话。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一名句在它原来的上下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会恍然大悟。这个句子可以在布莱希特的一个非正规的出版物里找到，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一个匿名出版人出版。出版人把“想象一下，现在打仗了，可没有人去”这句话放在了布莱希特的一首诗歌前面。在原来的版本中，这首诗是这样的：

想象一下，现在打仗了，

可没有人去。

如果战争爆发了，那个留在家里的人，

让其他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去奋斗，

他必须小心：

没有参与打仗的人，

将分担失败。

那些想避免斗争的人，

根本就不能如愿：

因为没有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过的人，

将为敌人的事业奋斗。

我们清楚地看到，受到谴责的不是去打仗的人，而是那些留在家里的人。所以，这一思想实验在布莱希特那里不是展示和平的愿景，而是提出可怕的警告。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这里我又会回到“永恒”这个主题。但这次涉及的不是长生不老，而是一样东西不断地轮回。人尽管会死，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回到人间。人不知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生，然后成长、工作和生活，然后接着死去、重生……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想法。在东方的宗教里，这个想法非常普遍。在西方，这一想法受到尼采（1844—1900）的追捧。在尼采看来，同样的东西不断地轮回，不是一种奇怪的念头，而是可以被证实的。下面就是他在1888年早些时候提出的大胆设想：

“假如我们可以把世界设想为特定大小的力和特定数量的力之中心——而且其他任何观念始终是不确定的，因而是不可用的——那么，其结果是，世界必须在其此在（Dasein）的掷色子大游戏中经历一种数量上可计算的组合。在一种无限时间中，每一种可能的组合或许都在某个时候一度达到过了；更有甚者，它或许已经被达到过无限次了。而且，因为在每一种；‘组合与它的下一个‘轮回’之间，或许已经发生了所有根本上有可能的组合，而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都决定着同一个系列中各种组合的整个序列。所以，这

就已经证明了一个由绝对同一的诸系列组成的循环。”

（《权力意志》，尼采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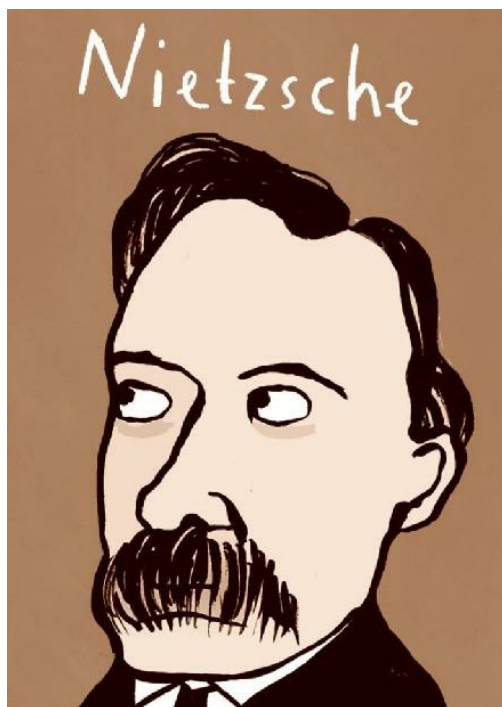
尼采认为这是“至高”的想法，并相信它也具有道德意义，因为人们在做所有的事情时，都必须问一下自己：“你只想做一次，还是无数次？”很明显，没有许多东西可以通过这个测试。

上面是尼采的例子。我们要怎样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思想实验呢？首先是要质疑他的先决条件。时间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吗？有没有一种可以被确定的世界状态？世界真的像尼采所提出的那样有边际吗？几乎所有的先决条件都十分可疑，所以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说，你的证明很不错，只是先决条件都不对。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看待思想实验，即把它引入一个模型中并看一看，这一思想实验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来举一个特殊的例子。

哲学家西美尔（1858—1918）想出了一个模型，尼采的理论在这个模型中很难成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它不牵涉重大历史事件，但需要一些数学知识。西美尔设计了一种机械过程：三个自转的轮子，也可以说是永恒轮回的轮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例子很合适。再说，尼采自己也是从自然科学的论点出发的，采用一个机械过程来反证他的观点也很合适。

我们来想象一下，三个大小完全一样的轮子，它们都围绕同一个轴转。我们在三个轮子上各画一个点，并使三个点在一条直线上。然后我们推动轮子，第二个轮子的速度是第一个轮子的一倍；第三个轮子的任务就是要动摇尼采的思想实验，这一轮子的旋转速度为 $1/\pi$ （ $\pi=3.14159265\dots$ ）。并且这些轮子能无止境地转下去。没有摩擦的情况下，什么时候三个点又会回到同一条线上？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轮回？



/尼采/



/轮子1/轮子2/轮子3/

我们看到第二个轮子旋转速度是第一个轮子的一倍，转两圈后，这两个轮子上的点又回到同一条线上了。再下次出现这种情况是转四圈

之后，以此类推。同一东西的轮回有了保证，尼采胜利了！但是，第三个轮子却制造了很多麻烦。它的旋转速度是多少呢？对了：第一个轮子围绕着轴心转一圈后，第三个轮子应该是转了 $1/\pi$ 圈。那么，第一个轮子转了两圈后，第三个轮子应该转了 $2/\pi$ 圈。如果 π 正好等于3的话，在第一个轮子转了三圈后，这两点就在一条线上了。不幸的是， π 是一个无理数，小数点后有一连串无穷无尽的数字，没有人可以得出最后的结果： $\pi=3.14159265\dots$

无止境的数字 π 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它的一口气比尼采的“永恒”还要长。 $1/\pi$ ， $2/\pi$ ， $3/\pi\dots$ 没有一个能成为整数，但我们又必须求得整数，因为只有这样，三个轮子上的三个点才能重新在一条线上。

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这说明至少有一种世界状态用数学证明是不能重复的。三个轮子上的点不能相遇，尼采的证明也随之失去了说服力。轮子尚且如此，比轮子复杂得多的历史事件又怎么能重复呢？

创造力在哪里？

许多人认为，思考同灵感、见解之类的东西有关，简而言之就是同创造力有关。特别是思想实验，没有创造力似乎就无法产生。

我们也必须看到，innovare这个词的拉丁文意思是要不断地让自己献身一件事。也就是说，创新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新东西，而是不断革新某些东西。这本书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观点——创新的前提条件是，某些东西已经存在，我们要改变这些东西的作用。

这背后的意思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观点是从旧的观点来的，如同新的画面产生于旧的画面，新歌源于我们熟悉的老歌一样。我们拿起已经存在的东西，并改变这些东西，不是僵硬地照搬，而是不断地接受和改变。正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说，若不能变得更好，这东西便也不再美好。同样，思想实验一般来说也产生于旧的思想实验，有的时候也可以把笑话或小说片断作为出发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举一个看上去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实验的例子。这是翁贝托·埃科的思想实验。其涉及的问题是，是否能完全准确地描绘世界。这不是什么多余的问题，因为物理学家们不断声称，他们即将找到所谓的“万有理论”。这样一来就可以用一道公式描绘世界的所有细节。

但这不可能做到，埃科的思想实验就说明了这点。他要从理论上来看一看，是否能给一个国家（他写的是“帝国”）画出一张1：1的地图。采用这个比例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准确性。还有一个前提是，这个帝国的大小相当于宇宙，即无限大。并且这张地图必须在这个国家之内制作完成。此外，这张地图还得像普通地图一样能够折叠起来。埃科把这样的一张地图分成三种类型：1. 不透明的、覆盖在领土上的地图；2. 挂起来的地图；3. 透明的、透气的，可以平放并卷起来的地图。

埃科首先确定，为了把地图卷起来和重新打开，肯定会出现没有被覆盖的地方。接着，他讨论制作这样一个巨幅地图会造成的经济问题。

此外，不管把地图放在那里，地图都会造成大风。所有这些考虑都很有意思，但还不足以让人完全打消制图的想法。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地图做成了，而且覆盖在领土上，也就马上改变了领土的面貌。地图所呈现的国家，如今已被地图所覆盖，所以地图反映的情况并不准确。除非再制作第二张地图。然而这将是永无休止的过程。

所以，埃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1. 一张1：1的地图不能总是准确地再现国家的领土特征。
2. 地图完成之时，国家的面貌也随之无法呈现了。

这便是埃科的思想实验。有人乐观地认为，人类总有一天会得到全面和完整的知识。这个思想实验使得那些对这种想法持怀疑态度的人更确信自己的观点。同样地，也不会存在一个万有理论，因为这一个理论公式必须包含自己才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这个思想实验是怎么想出来的？通过想象力和才华？还是通过创造力？其实都不是，而是人们在某个时候获得了灵感，也可以说是“偷窃”来的。

埃科的想法取之于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1899—1986）（埃科的小说《玫瑰之名》中那位保护图书的盲人叫博尔戈斯，就是为了向这位诗人致敬）。埃科在这个思想实验的一开始引用的故事，可以在博尔赫斯的著作《恶棍列传》中找到。故事内容如下：

“在那个帝国，绘图艺术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地，以至于一个省的地图需要一所城市的空间，而帝国的地图需要一个省的地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巨幅地图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绘图专家们制作了一张和国土一样大小的地图，而且非常精确。后来的几代人对绘图不甚关心，他们认为这些巨幅地图没有用处，并以一种十分不敬的态度让这些地图遭受风吹雨打。在西面的沙漠里，还能找到地图的残余，里面住着动物和乞丐。而在国家的其他部分，已经找不到任何地图的痕迹。”

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基本想法”。但埃科没有照搬这一想法。他继续思考这个故事，并以这种方式把它变成了新的故事。如果没有博尔赫斯的故事，就不可能产生埃科的精彩故事。不过，我们难道因此就

说，博尔赫斯很有创意，而埃科则不是吗？

实际上，博尔赫斯也不是最早想出1：1地图的人。地图传说还有一个更老的版本，博尔赫斯肯定是受到它的启发。最初想出这个故事的人逻辑学家和作家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在他的著作《西尔薇与布鲁诺》中提到了地图的内容。在那本书里，我们发现了女英雄西尔薇和一个叫“我的先生”的德国科学家的对话：

我的先生：按你的看法，能用的最大地图是怎么样的？

西尔薇：1：10000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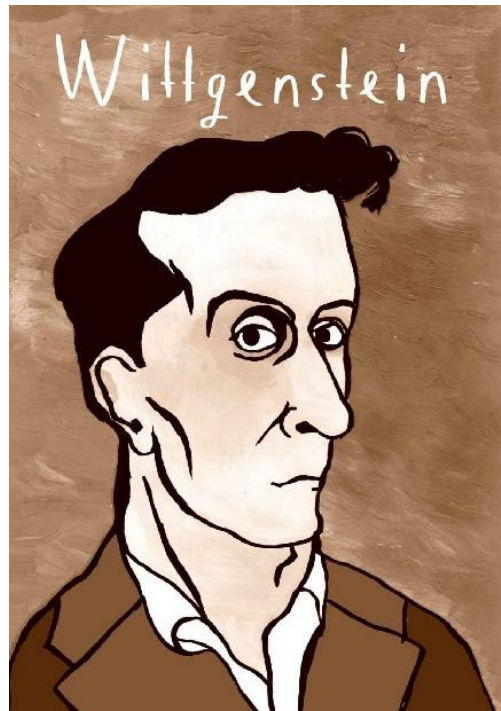
我的先生：什么？我们很快就做出1：300的地图，随后就产生了伟大的想法。我们做了一张比例为1：1的地图。

西尔薇：你们经常使用这张地图吗？

我的先生：因为农民反对，这张地图一次也没有平摊开来过。他们说这张地图会把全国的土地都盖上，并遮住阳光。所以我们现在用土地本身作地图。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做同样有效。

那些热爱创造力的人也许会说，那好，有创造力的是卡罗尔，其他两个人仅仅是照抄而已。但是，一方面很可能卡罗尔也是从别的地方看到这一想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说，博尔赫斯和埃科没有创造力，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增添了东西。这个故事从英国（卡罗尔生活的地方）传到了阿根廷（博尔赫斯写作的地方），然后又到了意大利，到了埃科那里。这个故事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变得更长，更详细。也更好。三个作者加工这个故事，花费了几乎一百年。

大多数创意实际上并不是突发奇想，也并不真的独此一家，而是把现有想法进行加工，使其更具有说服力。即使有时误解了原有的想法也无妨，上面那个反战的例子就是如此。一个想法之所以被看作是独特的，常常是因为其原来的版本被人遗忘了。只要一种想法出现在一个知名作家的作品中，一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把这一想法看作是这个作家独创的。例如，人们之所以把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看作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后人忘记了，这一做法自中世纪就有了：十四世纪哲学家和自然研究者阿尔贝特·封·萨克森就曾提到了这个方法。



/维特根斯坦/

14. 此处无为胜有为

思想的形成需要时间。在解决问题时，不仅需要目标明确的考虑，还需要有停顿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不思考的情况下，静默中就会出现答案。在无为而又有为的情况下，人们会倾听内心的声音，并等待即将出现的东西。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恰恰那些在我们看来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勤奋的人，会把“无为”看得非常重要，例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从他的一生来看，无论是他研究的范围，还是工作的强度，都令人惊叹不已。他的作品涉及语言哲学、逻辑学、色彩理论，他甚至还是个建筑师。我们印象中，他是一个从早到晚脑子从不停止活动的人，他不停地读书、写作和设计。但如果我们打开他的“秘密日记”，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记中写的都是“没有工作”，或“几乎没有工作”，或“没有工作，想了很多”之类的话。几个月以后，1916年初春，日记内容发生了改变。维特根斯坦写到“我在工作”或“工作过了”，甚至还有“我做了很多工作”。1918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这是他长时间工作和休息的成果。

有不少哲学家花很长时间等待他们的作品问世，他们坐在那里苦思冥想，甚至还会感到无聊。哲学家尼采描写了他如何产生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念头。那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名叫西尔斯玛丽亚的疗养胜地：

我坐在这里，等待，等待——却无所等待

超越了善与恶，有时享受日光，

有时享受阴影，永远在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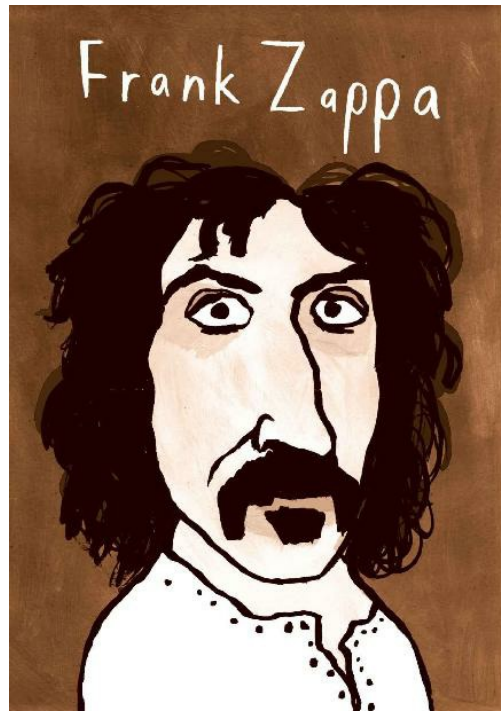
湖泊，中午，没有目标地度日。

突然，我的女友！一人变成了两人——

查拉图斯特拉刚刚从我身旁走过。

等待状态中的思想家根本就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在湖畔的酝酿，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意义重大，他在为一个伟大想法做准备。这也是哲学等待与日常生活中的等待的不同之处。生活中的等待从一开始就以一个特定目标为方向：等待红绿灯变绿，等待天气变好，等待交通不再堵塞。而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思想家是在酝酿，但他不知道，他想知道什么。有些新东西只能靠这一方式产生，因为新的东西并不在旧事物的视野中，它不能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而是闪电般地出现，也就是灵感出现的一瞬间。

古希腊时代的怀疑主义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等待”这一手段，以达到其哲学目标。那些怀疑论者的观点是，如果人们坚持相信某种东西，他们是不幸的，甚至会因此生病。所以人应该对所有的教诲都抱有距离，并要使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某些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和保持健康。怀疑论者还想出了许多手段来摆脱每一种被说服的企图。当一个人不能及时想出合适回答的时候，怀疑论者的建议是，不要去理会对方。对那些提出精彩观点的人，应该对他们说：“你用来说服我的理由，是过去的思想家所不熟悉的，同样，迟早也会出现一个相反的观点，这一观点也许我们今天还想不出来，但明天或者后天就有可能想出来，所以，你的观点尽管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我们还是不能同意。让我们再等一等。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不应该很快就下结论……”



/ 弗朗克·扎巴 /

15.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告诉我一个你的想法，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你意料之外的想法。如果我知道一种观点，也很容易从中得出第二种观点。这同超现实主义的拼贴很相似：从拣来的材料中变换出令人吃惊的东西。但最主要的是，一定是要对手头的材料通过重新分类、评估或颠覆原有的价值，制造出新东西。

下面的例子是献给摇滚歌手弗朗克·扎巴（1949—1993）的歌迷的。先讲一下故事。扎巴被邀请参加主持人乔·皮纳的访谈节目。这个乔·皮纳以恶毒的谈话风格著称。他通常的做法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客人，然后马上就开始攻击客人的才能、外表或信念。有些人认为，皮纳的这种行事方式一部分应归结于他的义肢，这是他愤世嫉俗的原因。另有些人认为，他天生奸刁。扎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的节目，那时男人留长发还很少见。皮纳简单地把扎巴介绍给观众后，就开始和他短兵相接——

乔·皮纳：我觉得，您的长头发把您变成了姑娘。

弗朗克·扎巴：而我觉得，您的木头腿把您变成了一张桌子。



/带刺的玫瑰/

扎巴的回答妙极了。他完全可以回答：“您怎么能仅从外表来评价人呢？”但他要是这么说，就太无聊，也太无力了。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扎巴这句话的结构同主持人那句的结构一样，只替换了两个字，却改变了整句的意思。正是这一改编使这句话出彩。如果单有这句话，而没有皮纳发出的恶意攻击，这句话就不会那么有意思。只有同开始的那句话联系在一起，扎巴的回答才能有力量。这是“反转”这种手法的独特之处。它需要跳板。下面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点。它是欧根·罗斯（1895—1976）的诗句：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

但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

还有很多不带玫瑰的刺。

这个例子与针锋相对的回答无关，而是罗斯把一个民间俗语变成了一个命题——不带玫瑰的刺，从形式上来看几乎与第一个例子一样，第一句话也是产生效果的跳板。通过一个小小的改变，使相反的内容得以成立，而且出现了一种令人赞叹的新意义。“不带玫瑰的刺”这句话的力量也是出自于第一句话，没有前一句话的背景它也就会失去力量。反

转的典型性就是这种双重结构：融新旧为一体，结合已知和未知的信息，因此显得富于创造性，令人耳目一新。

反转的办法有许多：你可以在原版本中去掉一些东西；可以加上某些东西；可以重新解释一些内容；可以重新评价一些内容；也可以调换一些内容（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交叉形式：不是从A得出B，而是从B得出A）。下面我会举例介绍。我们先来看一看重新分类，这一做法特别适合于谚语，只需花小小的力气就能改变谚语原来的内容。这里举一些常用的谚语：

- 学会受苦，但不抱怨。
- 没有勤奋，就没有成功。
- 宁可受穷但健康，也不要富裕却生病。



/带玫瑰的刺/

通过简单的交换，可以生成出新谚语：

- 学会抱怨，但不受苦。
- 没有成功，也无需努力。（没有勤奋，就没有麻烦。）

■ 宁可富裕和健康，也不要受穷和生病。

当然只有那些通晓老谚语的人才会感受到新说法的（一点）幽默。

代入法

特别受人喜爱的一种反转形式是你我角色的置换。这一手法几乎可以用在所有地方。特别是他人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更应该用这一手段来判断这些要求是否合理。问一下那些向我们提出要求的人，他们自己是否也符合这些要求，这么做再自然不过了！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从被责备方转换成责备方。我们可以把下面一个小学生同他母亲的对话作为例子：

梅厄太太：现在该喝你的牛奶了，牛奶的味道好极了！

小梅厄：干吗每天早上都要喝牛奶？

梅厄太太：牛奶是健康食品！

小梅厄：可我不喜欢喝牛奶！

梅厄太太：牛奶里有很多维生素！

小梅厄：既然有那么多的维生素，那你怎么不喝？

这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结论就是应该好好看一看：那个要求我们遵守规定的人是否自己也遵守规定？儿子并没有调换单词，而是转换角色。他把发出信息的人变成了接受信息的人，而信息本身并没有变化。“先管好自己的事”，这正是这一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旦有人在道德上自鸣得意，并随意把建议强加于他人，就可以使用这一手段。

剧本与反转^[19]

反转使人们以新的目光来看世界。各种形式的反转常常是通往新事物的路径。一个简单的角度变化会产生深刻的效果。“哥白尼式革命”早已成为一种固定说法。弗劳恩堡大教堂的神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反转了地球和太阳的角色：不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哥白尼利用了决定旧世界图像的相同的元素：太阳、地球和行星，他做的只是给世界剧院的这些主角写了一个新的剧本。

其他的剧本作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例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他在同弗朗索瓦·特吕弗（1932—1984）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一手段。这次与太阳、月亮和行星无关，而是涉及到一场谋杀的戏。希区柯克说：“一个男人来到一个地方，他很可能在那里被谋杀。通常会怎么拍呢？一般是漆黑的夜里，在城市狭窄的路口，被害人站在一个路灯的光束下。人行道因为刚下过的雨还很潮湿。一只黑猫出现在镜头里，它沿着一堵墙往前移动。然后镜头转向一扇窗子，照例窗户后面会出现一张往外看的脸。一辆黑色的大轿车慢慢地靠近等等。我问自己，与此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呢？在阳光下的一块荒凉的平地上，没有音乐，没有猫，没有窗户后面充满神秘感的脸。”这场谈话的结果就是希区柯克的恐怖片《西北偏北》中那场有名的戏，在戏里，加里·格兰特在空旷的田野里遭到一架飞机袭击。

如何用反转来驳倒爱因斯坦

在较小规模的讨论、辩论和书信交往中，也到处可以看到反转的现象。这里有几个经典的例子，按年代排列来看，最古老的例子也是最美的。它出现在《庄子·秋水》中。整篇是庄子同怀疑他的对手惠子之间的谈话：

庄子有一次同惠子在河畔散步。

庄子：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

庄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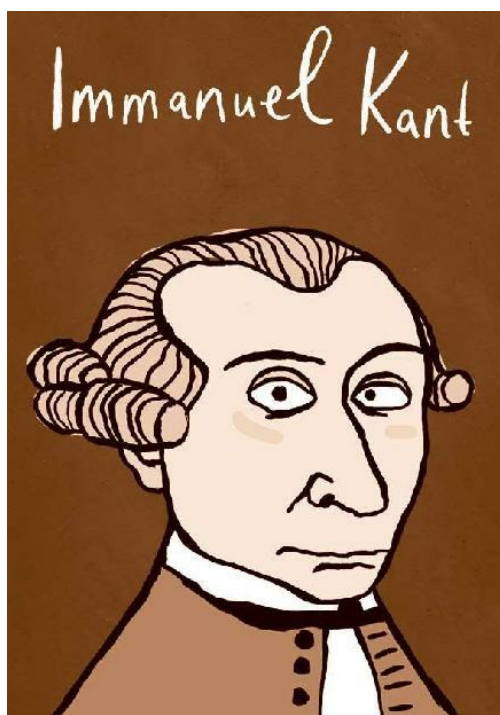
惠子：我非子，固不知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个十分精彩的有名对话把游戏式的交换看法同一种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观点的层面上来看，令人吃惊的是庄子的第一个回答：“您不是我，您怎么知道我不了解鱼的乐趣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大师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从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回答的妙处。他完全可以依据一种不容忽视的事实，说道：“我们可以从外表推断鱼的感受。例如一条欢迎我们的狗，会摇动尾巴。喜悦常常是通过跳跃来表示的。为什么鱼就不是这种情况呢？”但是庄子的做法是马上把反驳变成了进攻，这是一种更有效果的战略。

现在球到了惠子的手里。惠子本可以用反转的手法来予以回答：“我不是您，正如您不是我。您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您对鱼的乐趣一无所知呢？”这是一种回答。但惠子决非无聊之辈。太复杂的反转会

失去其魅力。他回答道：“我不是您，所以我不了解您。但您也不是鱼，所以很清楚，您不了解鱼的乐趣。”这一回答充满幽默，几乎是冷嘲热讽，表明了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怀疑论者。最具有道家色彩的内容出现在庄子的最后一句话里：“我是通过在河畔散步的乐趣了解鱼的乐趣的。”庄子在这里指的是生命，他与鱼共享的生命运动。因为他自己参与生命，所以他能看到具有生命的东西。这是一段很美的对话，具有很深的哲学含义！可惜我们下面要举的有关反转的其他例子没有这样华美，这些例子都来自于欧洲。



/康德/

首先是一个反对康德的例子。康德（1724—1804）《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现结束了哲学的自负。在康德之前，思想家们几乎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出有关宇宙或上帝的看法。康德把这样的看法批评为是超越感官直觉的。他嘲笑这些观点，并严格禁止这些观点。他认为，这些看法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随意得出的，所以就要结束这种做法。歌德的好友弗里德里希·雅各比（1743—1819）原本是康德热情的追随者，后来变成了康德执着的反对者。他第一个发现，康德的行事方式同他在著作中攻击的方式如出一辙，因为他本人也对没有得到经验检验的空想的事物提出看法。例如，康德的出发点是，“自在之物”是无法辨认的。但另一方面他也相信，“自在之物”会影响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按照康德的观

点，“自在之物”会引起我们的感官印象。但他是如何确定这点的呢？自在之物如何影响我们的感官，这一点是很难观察到的，也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空想。康德也做了自己要指责的事情。尽管他并不是像中世纪的思想家那样对上帝进行猜想，而是对“自在之物”进行猜想，但这一猜想是他思想体系的支柱，对此雅各比强调道：“不得不承认，我在康德哲学上发现的这一问题没少困扰我……我都快疯了，因为没有那个前提条件（不可辨别的自在之物对想象力的影响）我无法进入体系，而有了那个前提条件我又无法留在体系里。”这一观点是反对康德的经典例子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使用这一观点。

再举一个认识论方面的例子。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哲学的核心之一是他提出的所谓的经验感官标准。其内容是，一种看法只有在被经验（体验）证明后，才有意义，或者说这一看法具有纯粹逻辑的本质。与经验有关的看法是可以得到检验的，而纯粹逻辑本质也可以通过数学测试察觉其内部的一致性。所以，属于这两种情况的结论都是可以被检验的。按照这一看法，自然科学的论点就可以被证实。而哲学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何才能检验有关世界、上帝和灵魂的看法呢？所以分析哲学就开始鼓吹要攻击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没有任何意义。武断地推翻一种具有伟大精神传统的做法当然会引起轰动，然而感官标准本身具有什么地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很明显，这一感官标准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纯逻辑的——看起来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一标准本身也是形而上的，按他们的说法也就是无意义的。

当爱因斯坦（1879—1955）的好友米歇尔·贝索去世时，他写道：“对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只具有一种幻想的意义，即使是一种非常牢固的幻想。”这一看法的强大理论支柱就是他给现在这一概念下了新定义的相对论。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退缩。现象学家赫尔曼·施米茨的做法证明了，反转的手法也可以有效地用来反对爱因斯坦。施米茨认为，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家肯定是乐于学习的。但学习的先决条件是要估计到未来很可能发生今天尚不可而知的事情。要做到这点，必须严肃地把今天同未来进行区别，这一区别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幻想。只要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存在一天，就必须坚持这种区别，而不能用一种看破一切的姿态把这一区别置于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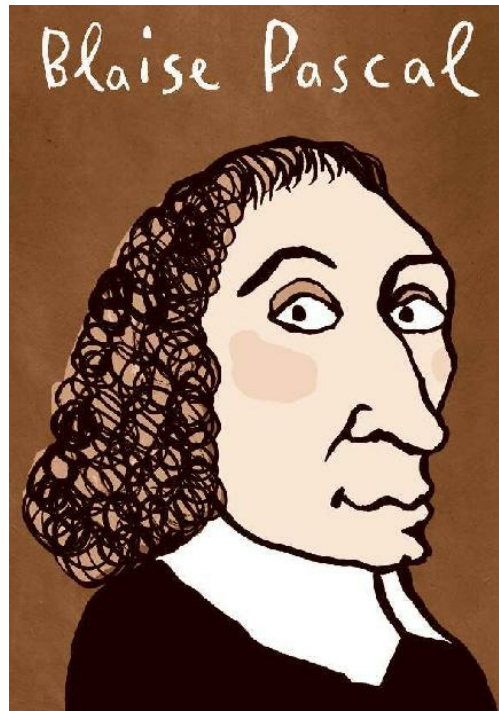
上面是一些小例子。这说明反转的手法在哲学里经常被采用。甚至有些哲学家认为，这是哲学最核心的思维方法。当然这有点言过其实。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手段具有一种十分方便的优点，即它借用对方提供的素材。对方所说的话冲击力越大，用反转方式予以回击的爆发力也就越大。

改变用途

观点的出现总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并持有一种特定的立场。从中可以产生反转的另一个形式，即通过重新归纳观点来重新解释观点，也就是说人们不完全按习惯的做法来运用这一观点。这样一来，人们不仅可以使提出观点的人感到尴尬，而且还可以花很少的力气加强自己的观点。

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曾深入研究赌博中的数学规律，概率论就是由此产生的。他提出和上帝打赌的说法，好让他的同代人相信基督徒生活的合理性。他要求人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假如上帝最终并不存在的话，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按照帕斯卡的说法，如果上帝不存在，生活就没有意义；但如果上帝存在，就可以赢得永恒的生活。与赢得一切的结果相比，过基督徒生活时作出的牺牲可谓微不足道。用帕斯卡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您赢了，就赢得了一切；如果您输了，您也没有失去什么。所以毫不迟疑地去为上帝的存在下赌吧。”

帕斯卡至少用他的信念说服了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他的确是按照基督教的教规生活。他晚年甚至住进了修道院。他的打赌说法也影响了不少同代人。一直到今天，教会在传教时仍然使用他的说法。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1903—1957）后来转为信仰基督教，他说，在做这一决定时，帕斯卡的“打赌说”也起了不小作用。这一观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似乎不是感情用事，而使用清醒的语言。这一想法不是说教和预言，而是像一种严格的理性思考。



/布莱士·帕斯卡/

在反对帕斯卡的观点中，也许最精彩的观点就是改变帕斯卡说法的用途，并把他的说法放到一个新的上下文关系中去。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1713—1784）写道：“帕斯卡说：‘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宗教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你们的宗教是错误的，你们就什么风险也没有。但如果你们深信，你们的宗教是错误的，一旦这一宗教是正确的，你们就会冒所有的风险’。一个伊玛目（清真寺的教长）也完全可以这么说。”

这确实是帕斯卡打赌说法的弱点。因为一个穆斯林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来宣传伊斯兰教，或者一个阿斯特克（十四至十五世纪墨西哥的一支印第安族）的神职人员用来宣传人祭。所有想要说服别人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使用帕斯卡打赌的说法。这样的话，这一打赌至少不适用于为某种特定的宗教生活方式作宣传。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相信所有的宗教？这可行不通，因为各种宗教是相互排斥的。所以这一漂亮的打赌说法就失去了说服力。而无神论者则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们不需要相信任何一个宗教。

从这一例子可以引伸出普遍的道德规范：人们在收集一种观点时，都应该自问一下，我还能够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什么地方？而要这么做，

就要改变应用的对象。

我们可以毫不胆怯地从别人那里拿来他们的观点，并使这些观点改头换面。创造力并不是从虚无产生的，而且从其本质来看，是要把现有的东西改变用途。

我们可以用大自然母亲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大自然所谓的创造力并不能归结为重新创造，而应该归结为是不断地把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再创造。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是在活生生的客体上进行拼贴：大自然把一个颌骨关节变成耳朵的踝骨，让一个肠袋起到肺的作用。鱼的脊柱是为了帮助尾巴的运动，而在人身上，就变成了支撑脑袋的作用。

水分子与逆向思维

最后，顺带说一个自然科学中的案例，因为在创造发明的过程中，反转法同样很有用。水分子分子结构的发现就得益于一个逆向的实验过程。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1778—1829）在1800年了解到，他的同行亚历山大·伏打（1745—1827）发明了电池。这种电池由金属板组成，中间填充有浸泡了盐溶液的纸板。它非常巨大，体积好比一个房间。伏打当时发明的电池，还不可以产生持续的电流。戴维推测，电流是通过化学反应过程产生的。是化学制造了电流！于是他推断，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利用电流来进行化学反应。事实证明，这个闪念非常惊人。戴维利用电流分解了水，并且证明，氢和氧总是能够以一种稳定的结构组合在一起。这为此后发现水分子结构 H_2O 奠定了重要基础。此为，戴维成功分离了钾离子、钠离子和其他金属元素，这些都成为了日后制定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戴维关于自己发现的演讲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后来女作家玛丽·雪莱以他为原型创作了《科学怪人》中的瓦尔德教授形象（瓦尔德教授是主人公弗兰肯斯坦的老师，后来被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所杀）。

游戏：倒立

1. 第一次尝试倒立的人，多半会像蹒跚学步的幼儿那样摇摇晃晃。如果没有支撑，人们在倒立时很容易就翻倒了。所以，一开始最好靠墙做这个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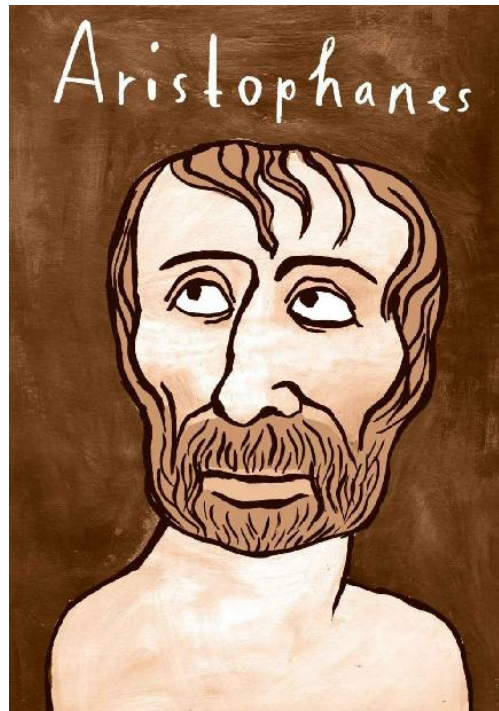
2. 蹲下身子，头顶着地，双手贴近后脑勺，用手掌侧边和前臂支撑身体。

3. 接下来抬起臀部，伸直膝盖，双脚小步迈向头的方向。

4. 竖直身体，保持这个姿势10至15秒。训练有素的人甚至可以坚持三分钟。

5. 放下双脚。

6. 瑜伽教练认为，这个练习有助于释放能量，而医生也证实了这一点：平日里，在正常站立姿势下，某些器官供血不足，而在倒立的情况下，这些器官会获得充足的氧分。



/阿里斯托芬/

16. 当笑声成为武器

下面的场面出现在小孩玩的沙坑里。一个孩子气呼呼地说：“不许你抓，那是我的！”他把另一个孩子的小铲子抢了过来，那个孩子就学羊叫：“咩……咩……”我们在沙坑旁看到的场面中，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相互模仿，不管是出于攻击的目的，还是出于欣赏，或者是因为无聊。

模仿另一个人的声音是一种特殊能力或至少是一种灵活性。被模仿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他感觉似乎是有人偷走并占有了他的灵魂，是一个可恶的奸计。

戏拟是一个假面。模仿的人戴上对方的面具，按照他自己的脚本，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有的时候是从一次搞怪走向另一次搞怪，以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这可以是没有恶意的玩笑，但也能成为尖锐的武器。笑声很友好，大家很高兴，这是快乐人性的表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每个笑声都是充满人性的。戏拟也可能是揭露的手段，或是杀人不见血的手段。Parodieren（戏拟）这个词源自于希腊语：para是“沿着”或“在一旁”的意思，ôdè意味着唱歌，这两个字组成的动词parôdein就是跟着唱，也有一点不着调的意思。

恶毒的模仿

只要有观察他人的机会，就会出现戏拟。模仿的舞台可以是校园、食堂、办公室或其他的地方——文学或音乐领域，甚至看上去不带感情色彩的科学界也不例外。狭小的研究领域会使科学家相互干扰，过于紧密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劳累，加剧了对他人特点的注意。这些特点既可以通过悠然自得的文明讨论得到批驳，也能通过恶意的嘲笑。

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5—385）是一个天才的讽刺者，他与柏拉图是同时代人。在他的喜剧中，他既嘲笑伟大的悲剧作者，也嘲笑政治家或将军，哪怕最早的哲学家也逃不出他的手心。

在他的喜剧《云》中，苏格拉底成了他嘲笑的对象。苏格拉底以“专说一些晦涩的话的神父”形象出现，他从一个筐里观察世界，并对一些十分紧迫的问题提出惊人的解释。在开场戏里，一个很可能会成为他学生的人来到他这里，此人名叫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一个苏格拉底的门徒向他介绍了大师目前在研究的课题：

门徒：斯费托斯乡区的凯瑞丰有一次问他：“蚊子的叫声是从嘴里还是从尾巴上发出来的？对此你有什么见解？”

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他是怎样回答的？

门徒：他说，蚊子的肠管很细，空气受压从这细管里通过，直到尾部，于是那里便因为这股冲出来的空气响了起来。

斯特瑞普西阿得斯：那么蚊子的屁股不就是一只喇叭了吗？这位善于观察的苏格拉底真是无所不知呀！一个连蚊子的肠管都知道的人必定很容易就能够打赢官司。

后来，苏格拉底甚至否认神的存在，而崇拜由雾气组成的能变换各种形态的云彩。结果一些激动的人要纵火烧掉苏格拉底的书房。自那以

后，哲学家们就不断地成为各种类型的戏拟的对象。哲学家们自己也相互模仿。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写道：“模仿是人与生俱来的本领，它给人带来快乐。”戏拟就是产生于对模仿能力的欣赏。一旦观众发现这是模仿，就会被感染。而被模仿的对象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觉得这没什么可笑。

有一种批判性的戏拟以伤害为目的。它模仿原型，并通过这一方式得到一个替代形象，并在它身上采取毁灭性的行动，类似巫毒教的巫师在稻草人身上扎洞，以伤害对手。原则上，一切都可以被模仿，无论坏行为还是好行为。实施戏拟的人只需要找到一些标志性特点，并通过模仿将其表现出来。唯一的关键是，观众能重新认出被模仿的人或事物。

所以，戏拟并不是永远都令人高兴，只是让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高兴。当有人向另外一个人解释自己为什么笑时，另一个人的反应几乎总是令人失望的：“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这有什么可笑的？”下面我要举的例子，只会引来那些了解背景的人的笑声。

第一个例子来自于物理学家和作家利希滕贝格，内容涉及所谓的面相学，也就是从脸部的特点和身体的构造来确定一个人的性格的学说。在《从蛛丝马迹到真相，到底有多远？》一章里，我已经提到过这方面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说，歌德非常喜欢面相学，他甚至还为拉瓦特尔的著作润色，使得拉瓦特尔的《人相学片断》极其富有诗意。

原文是这样的（对一尊荷马半身塑像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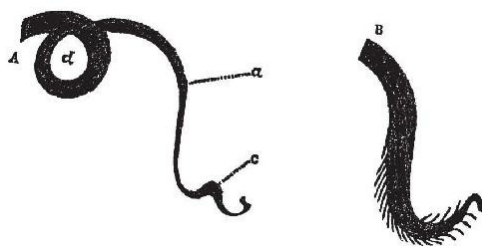
一张充满父爱的脸，善良且忠诚！这样的额角是先知的额角，而非研究者的额角。鼻子是敏锐之人的鼻子，这个人既不软弱，也不粗暴。上嘴唇显示出此人的善良和智慧。请允许我谈一下自己对这尊雕像的感受。当我一无所知地走到这一雕像的前面，我说：这个人不闻不问，无所求，无所为。这一脑袋所有感官的中心点在额角上面的凸起之处。所有的肌肉都往上拉伸，使得活生生的肢体都引向会说话的脸颊……这就是荷马！在这个脑壳里，伟大的神和英雄们获得了如同宽阔的天空和无边的大地一般的空间。

利希滕贝格挑战拉瓦特尔

启蒙主义者利希滕贝格相当怀疑面相学唤起的这股热情。他不相信，通过脸就能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他认为性格只有通过交往才可以得知。他在多篇文章里抨击了人相学。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戏拟文章，他模仿了歌德和拉瓦特尔激情高昂的文风，也戴上了人相学家的面具，并把自己说成是人相学忠实的门徒。这一假面舞会的噱头在于他没有把这一方法用在脸上，而是尾巴上。

尾巴相术的片断

对《人相学片断》的一个小贡献



1. 英雄般的、充满力量的

A 母猪的尾巴

B 英国哈巴狗的尾巴

A.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没有从这条尾巴上看到猪魔鬼的一面（尽管猪尾巴a处的强烈欲望不太了解c处的恐惧），并且不能用眼晴嗅到这魔鬼的一面，从d处看你的鼻子仿佛伸进了适合猪成长的烂泥；如果你无意违抗自然以及人厌恶的猪的本性，那就请你合上书，你就永远也不会对人相学感兴趣。

这头猪，也是最早的天才，每天在烂泥里滚动，用可怕的气味污染街道，在夜里闯进犹太教堂，并把那里搞得一团糟。当这头猪生崽后，前所未有地残酷地吃掉了三个幼崽，最终被想吃人肉的疯狂所驱使，扑向一个孩子。这时这头猪被复仇的剑刺中，它被乞丐打死，被刽子手吃掉了。

B. 亲爱的读者，你以温暖之心拥抱大自然，虔诚而惊讶地感受大自然的每一个杰作，看一看这条狗的尾巴吧。想一想，如果亚历山大有尾巴的话，他会不会感到羞愧。这条尾巴并不软弱，是十足的狗尾巴，没有任何躺在女人怀中撒娇的气质，不是甜腻腻的，

不是什么小东西。到处都散发着男性的气息，充满活力，但同时又小心谨慎，毫不炫耀自己的力量。

这一尾巴属于亨利八世的宠物狗，此犬名叫凯撒，也确实有凯撒般的气度。脖套上写着它的座右铭：不为凯撒，宁为虚无（aut Caesar, aut nihil）。金色的字母非常大。它的眼睛里也是这种神情，而且更明显，更热烈。在与一头狮子的搏斗中它献出了生命，但狮子比它早死五分钟。当人们对它喊道，狮子马克斯死了。凯撒甩了它那永恒的尾巴三次，像英雄一般死去。

如何戏拟？

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方子，但还是能找到一些经常出现的基本要素。首先，模仿原作者的风格，也可以模仿他的姿态，也可以模仿他的声音以及表达方式；第二个要素是替换，就是要用尽可能怪异的东西来替原有的内容。最合适的怪异东西就是那些比较低级的事物，例如尾巴。利希滕贝格也可以用屁股来套用人相观察。但狗尾巴有多层意义，所以也就更可笑。

利希滕贝格惟妙惟肖且细致入微地模仿了人相专家拉瓦特尔装腔作势说教的姿态。他不仅做出了复制品，而且还一本正经地对这一复制品进行评价，提出质疑，并用字母标识狗尾巴的各个部位。这样一来，他精确地模仿了人相专家故弄玄虚的伪准确性，给人一种机械性的“制作”印象。热情洋溢的风格和不起眼的物体之间的差距中——这种不起眼的物体常常出现在戏拟中——便产生了滑稽的效果。苏格拉底的同代人诡辩家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6—420）曾说过：“应该通过嘲笑去掉对手的严肃性，但又要通过严肃来消解对手的嘲笑。”

正如第一个例子表明的那样，戏拟一般短小精悍，因为它不可能让人一直笑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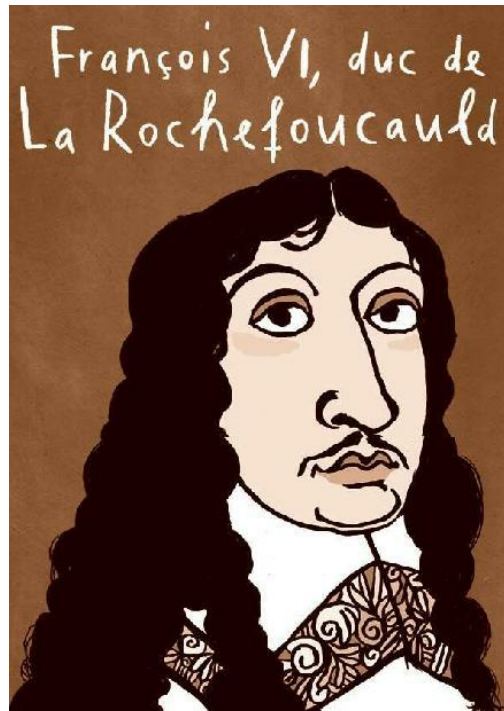
一封来自天国的信

还有一个来自法国的戏拟的例子，它同拉·洛希福考公爵（1613—1690）的著作有关。公爵是最早撰写格言警句的人之一，他把一些表现生活智慧的优美句子和观察写下来，既不详细，也不系统，只求简短。那些写格言的人喜欢暗示读者去继续思考。

在我国，公爵的著作不太为人所知。在法国，他可是个经典作家。他的一些警句甚至出现在教材里，例如他的战略要求：“在政治中，人们应该更多地利用已经存在的机会，而不是设法创造新的可能性。”

早在十七世纪，公爵的句子就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过世后还出版了一部著作。在这本著作里，收录了在他的遗物中发现的尚未发表的句子，即所谓的“被压制的警句”。在法国，有很多人崇拜格言文化，正是这一崇拜成为了恶意模仿的理想对象。

模仿者保尔·瑞布克斯和查尔斯·穆勒为此选择了一种有意思的做法。他们让公爵从天国发出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抱怨人们在他离世后还发表他的格言，并声称新书的内容乱七八糟，因为出版的东西恰恰是他不同意的东西。例如，他曾经写道“一个不把自己的智慧与他人分享的人，是智慧的”或“只有使人入迷的婚礼，但没有好的婚礼”。但印在书上却成了“不与别人分享自己智慧的人是不智慧的”或“只有好的婚礼，但没有使人入迷的婚礼”。



/拉·洛希福考公爵/

这样的戏拟是非常微妙的，与利希滕贝格的例子不同，不能使人开怀大笑，只能使有些人微笑。利希滕贝格以激烈的方式攻击神父拉瓦特尔，而保尔·瑞布克斯和查尔斯·穆勒则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攻击。来自天国的信表明公爵创造的警句，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是有效的，他的智慧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多的是在于形式，而不是内容。

弗里茨·海德格尔挑战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大概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正因为这点，他常常会成为戏拟的对象。他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下面我们从他的讲演《物》中摘录一段：

“壶是一个物。什么是壶呢？我们说，是一个器皿；它把其他东西容纳于身。在壶中起容纳作用的是壶底和壶壁。这个容器本身又有一个把手，可以供人们把握。[……]当我们灌满壶时，液体就在充灌时流入虚空的壶中。这种虚空（die Leere）乃是器皿的具有容纳作用的东西。壶的虚空，壶的这种虚无（Nichts），乃是壶作为有所容纳的器皿之所是。”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这种风格有点让人昏昏欲睡。在某些人听来，却具有某种使人安静的内涵。总而言之，这一风格不同凡响。马丁·海德格尔有一个名叫弗里茨·海德格尔的弟弟，他一直住在故乡梅斯基尔希。当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名扬四海的时候，弗里茨一直是银行职员。业余时间，他还是狂欢节上的演讲者，在梅斯基尔希非常出名。他是在狂欢节星期二出生的，他经常强调自己一生都看重某种“天生的小丑性”。

梅斯基尔希的居民公认，弗里茨要比他著名的哲学家兄弟更智慧。有些人甚至认为，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成名之作其实出自这位兄弟之手。

不管怎么说，弗里茨非常熟悉哥哥的著作，他不但保留了哥哥的手稿，而且制作了备份。弗里茨为马丁录入手稿三万多页，在战争期间，他把这些材料藏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弗里茨·海德格尔说话结巴，但正如梅斯基尔希当地居民所说的那样，在他想“严……严肃”说话的时候，或者要嘲笑别人时，就不会结巴。他有时候也嘲笑自己的哥哥马丁。下面的狂欢节演讲就是他对哥哥的即兴讽刺，是对马丁·海德格尔后期风格的戏拟。在演讲中，他保留了严谨和扎实的风格，只是改变了话题。

他的话题是狂欢节之夜。这是一次友好的搞笑，不像利希滕贝格攻击人相学家时，把脸转换成尾巴那么具有攻击性。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温和的模仿：

一个容器可以被把握的部分，是黑夜。它以度过漫漫长夜的方式，来容纳事物。提纲挈领地，就是容器度过黑夜。它的本质就是黑夜中的可包容性。何物包容？何物度夜？“存在”几近度过黑夜。因为容器神经质般的包容，让它精疲力竭。换句话说，黑夜保护了容器的存在，可把握的部分因而被容纳。人是容器的守卫者。这便是人的心绪。容器可以被把握的地方是虚空。不是容器包容了虚空，也不是虚空包容了容器。容器以容器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的自我便消失了。它将永恒留在黑夜之中。黑夜把永恒灌注到容器中。这种灌注给予的馈赠便是狂欢节。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X-标准

不仅作为个体的作者，就连整个学科也可能成为戏拟的对象。传统上4月1日是发表此类文章的合适日期。报纸上可以找到被巧妙模仿的虚假消息，评论非事实的文章，还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棋谱。1994年4月《科学广角》杂志发表了有关基本粒子变成企鹅结构的文章。

对学科的戏拟也出现在科学界最神圣的地方，即专业辞典中。专业辞典的内容通常是经过反复筛选才被收录进去的，它代表一代人的知识水平。但在许多专业辞典中，除了严肃的信息，还有杜撰的内容。这些条目是编辑为了愉悦自己的和困扰读者故意加进去的。这虽然令人吃惊，却是事实。在《哲学和科学理论百科全书（第4卷）》（斯图加特，魏玛，1996）中，有一则杜撰的词条很容易被看出破绽。它有关所谓的“X-标准”，内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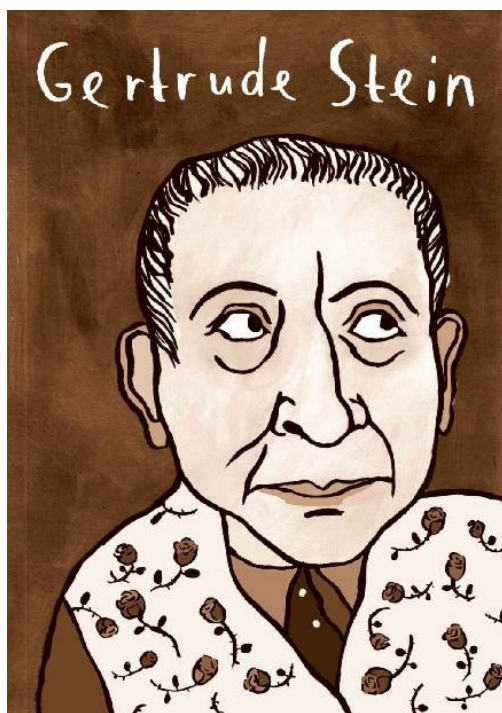
“X-标准”（英文为伦琴标准），源自俗语“我不允许有人把X说成是U”。理想的情况下这是定量的标准，用来评价哲学或科学论文的严肃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严肃出版物中也充斥了大量令人怀疑的、充满戏拟的、空洞的文章，所以，X-标准被证明是评价研究报告时急需使用的一个标准。

尽管这个词条的玩笑开得有点过，但是一本专业辞书不仅仅包含真理，这个想法本身很不错。据出版《哲学和科学理论百科全书》的梅茨勒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说，有好几本梅茨勒专业辞书中都有类似的条目。这些条目惟妙惟肖地模仿专业辞书的风格，以至于不少读者认为这些条目都是真的。

出于崇拜的模仿

戏拟不永远都是恶意的，也有人模仿其他人的姿态和风格，是为了显露自己也很时髦。这种情况早在中学校园里就出现了：学生们模仿那些他们认为很“酷”的人的举止行为，他们穿衣说话都类似崇拜对象。在哲学中，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模仿者（Epigonen）”。模仿者的模仿行为都出于好意。他们并不想嘲笑自己的偶像，而是要显示，他们“复制”了榜样，而且“非常时尚”。他们不仅模仿写作方式和主题，而且还模仿神经质的伎俩和语言上的错误。即便是再友好的模仿，也适用我们为恶意模仿制定的规则：

一种风格越奇特，就越适合成为模仿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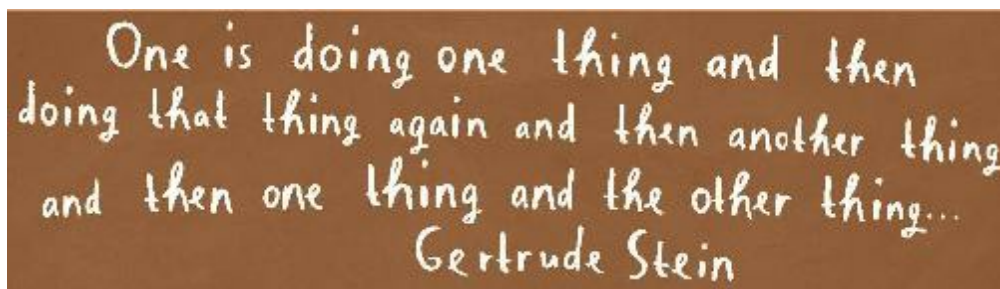
/格特鲁德·斯泰因/

17. 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

滴水可以穿石。只要不断重复，一个命题就会自然而然成立，甚至不需要提出一个理由。所以，广告商、政治家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尽可能地重复他们说的话，通过简单的重复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也可以通过把某种命题放入一系列类似命题之中来实现这一点。这样一来，那个命题看起来就不那么孤单，而是出现在集体中，产生的作用也要强得多。

也有一些重复是无法产生效果的。因为不是每一句话通过重复就能使人相信，它甚至可能一点一点地失去可信度，最终还显得非常荒诞。

如果不断重复一个命题，到某个时候，这个命题就会显得很机械，最终会变得很可笑。有些戏剧作品就利用这一效果，来制造笑料：演员们跑到舞台上装腔作势，隔不多一会儿就大喊“我恋爱了”或是“我是那么伤心”。话说得越冠冕堂皇，就越容易通过重复失去作用。戏拟常常会利用这一效果：不停地重复一个观点和概念，直到它变得可笑。这一技巧的另一种形式也适用于讨论。可以拿别人的观点并证明，这一观点并不新鲜，而是重复了一百遍。一则日常生活的例子可以说明它是如何生效的：



/某人正在做一件事，然后又做了一遍这件事，接着做另一件事，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格特鲁德·斯泰因

耶和华见证人信徒^[20]：今天我们来考虑一下世界末日的问

题。基督早就说过……

梅厄夫人：不错，耶稣相信，世界很快就要灭亡，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去”，因为不久以后上帝将会审判，而正义的人得到永生。自那以后，仅基督教的教堂敲响过世界末日的钟声就不下一百七十次。数学家兼神学家的米夏埃尔·史蒂费尔的故事非常可笑，他是路德的战友，他于1533年的新年在布道坛上宣布，那年10月19日清晨，世界就要灭亡。他用词语方程式得出这一日期。后来，那些相信他话的人就把自己的财产送了人，烧了自己的房屋。饭店老板也不再收酒钱。但是当那个日期过后世界依然安然无恙时，史蒂费尔不得不在军人的保护下逃离愤怒的人群。路德给他的朋友找了一个新职位。后来，他再也没有以预言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一心一意研究纯数学，对数表就是他发现的……

耶和華见证人信徒：您说得很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那些人不是耶和華见证人的信徒，不可能知道世界灭亡的日期。但我们……

梅厄夫人：……对了，耶和華见证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一开始宣布1914年世界就会灭亡，然后把日期延到1925年，最后又延到1975年。

耶和華见证人信徒：等等，等等，不能这么说。上帝保佑……

梅厄夫人：……是上帝决定要无限期地推迟这一日期。

耶和華见证人：主的道路深不可测。

严肃地宣布世界即将灭亡确实会惊动天下。但如果多次宣布世界灭亡的消息，这消息就会失去可信性。

令人吃惊的是，即便在最严谨的科学家圈子里，世界末日的景象也很有市场。英国物理学家和畅销书作者史蒂芬·霍金认为，他很快就会发现一个万有理论。这个理论一旦发现，物理学就会结束自己的使命。这一想法是他在伦敦首次讲课的主题——理论物理是否即将终结。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了解物理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想法本身的历史也很悠久。例如，开尔文勋爵（1824—1927）在1900年左右^[21]

就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落成，所剩的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过在小数点后面再添几位罢了。可那时，就连相对论也还没有出现呢！当量子论出现后，物理学家又嚷嚷物理学已经结束。例如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1882—1970）就说过，物理学在六个月以后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可当时还没有发现能量的强弱转换，也就是说，根本就看不到物理学的尽头。

有一些成见可谓根深蒂固。例如自古以来就有人说，机器可以节省时间并能减轻人的负担。古希腊诗人安提帕罗斯（公元前一世纪）在下面这首歌颂水磨的诗中写道：

女磨工的手不再疲劳，她们能安静地入睡！

不需要鸡鸣声把她们唤醒。

农神命令自然神完成姑娘们的工作，

现在这些神在轮子上轻松地跳跃，

滚轴不停地旋转，转动石头。

让我们像父辈那样生活，让我们感受无需工作的乐趣，

是神明带给我们这份快乐。

可惜的是，诗歌里提到的减轻女磨工劳动负担的时代至今都没有出现。技术的进步常常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最新的调查表明，现代工业国家的生活节奏前所未有地快。尽管如此，每一种要投入市场的机器都被吹捧成能够会节省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个通过重复会降低价值的做法：混乱的大杂烩。这不是指把类似的命题放在一起，以削弱某一种观点，而是对一个问题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回答。当这些回答汇总起来的时候，结果非常可怕。也就是说，追求的不是单调，而是混乱。自古希腊以来，人们总是努力地在浑水中乱搅，有的时候竟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下面这个例子由来已久，即劝说别人不要从事哲学。其论据就是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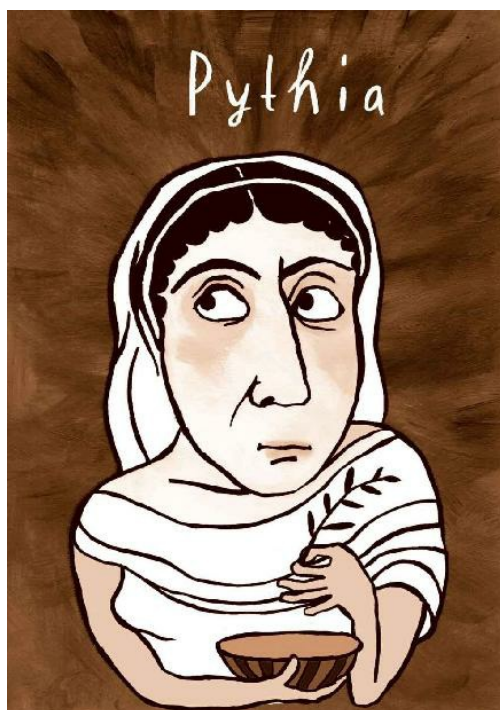
学家们教导的东西太五光十色了。一部分人持有这个观点，另一部分人则持那种观点。从极其混乱的教诲中可以得出，哲学是没有什么内涵结论的。这一观点出自怀疑论派，是哲学家皮浪（公元前360—前270）提出的。他的学生们利用这一做法，不仅向哲学，而且向所有的文化价值提出疑问。一篇古老的文章里这么写道：“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正义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不正义的。对一部分人来说好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坏的。所以，波斯人认为同自己的女儿睡觉，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而这对希腊人来说简直是可怕的罪行。马沙盖特人有共妻的做法，而希腊人没有。基里基尔人热衷于海上袭击，而希腊人就不这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信仰的神明，有些民族相信命运，有些则不相信。埃及人把逝者做成木乃伊，而罗马人则采用火葬。结论是，不要做出什么是真理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一观点依然很流行，特别当有人要提出质疑或顾虑重重的时候，就更容易选择这样的立场。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特别爱用重复手法一个场景，也就是原谅。在这里，原谅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多次重复来减弱那些无法被反驳的责备。用古希腊时期医生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病症已经无法治愈，至少应该减轻痛苦，也就是说，原谅不是作为攻击手段，而是自卫战略。

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会犯错误”这样的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句话很像是一种抵抗。但这一方法起作用，人们除了表示要区别对待外，常用此话来应付他人。这种减压的重复会减弱听起来让人不愉快的责备，只要不断提出其他不好的事情，并最终从所有这些无法忍受的事情中，得出一切原来并不那么可怕的结论。坏事同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起时，有时令人惊讶地会显得不那么糟糕。例如科学部部长阿内特·沙瓦为时任国防部长的卡尔·特尔多尔·祖·古登贝尔格辩护时，就是这么干的。众所周知，这位国防部长的博士论文大部分都是抄袭的，而且没有标明出处。沙瓦说，他的抄袭是“无意识的”，正如他所说，他失去了对所有出处的掌控。与默克尔总理不一样，沙瓦不会区分作为“国防部长”和作为“科学家”的祖·古登贝尔格。在答《南德意志报》记者提问时，她请大家想一想：“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某个人可以很好地从事政治事务，但生活的其他部分却让他犯错误。”遗憾的是，她没有告诉我们，“其他部分”到底是什么，所以她的观点经不起推敲。沙瓦是想让祖·古登贝尔格的诡计看上去像是道德行为？还是

说她是要在两个连续重复的交叉点看这位男爵，这两个重复在她的观点中配合得非常精彩，即他是骗子，同时又是拯救者？



/皮媞亚女祭司/

18. 神谕在古代哲学争辩中起了什么作用？

在古老世界的许多决定中，神谕是重要的，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人们来到神谕宣示所，想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结果得到谜语般的一句话，乞求神谕的人要自己来解释这句话。例如商人芝诺得到的话是“与死者躺在一起”，他把它解读为阅读古老的著作并成为哲学家。

哲学各派进行争论时，也会求助于神谕。凯勒丰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来到德尔斐的神谕宣示所，想知道谁是天底下最智慧的人。女祭司给了他一个清楚的答案：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

对苏格拉底来说，这是鼓励他继续进行研究。那么发出神谕的阿波罗想借此说明什么呢？苏格拉底设法找到许多被认为是智慧的人，想通过他们来反驳这一神谕。据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上帝是智慧的，而人的智慧只有很少的价值或根本就没有价值。所以这一神谕的意思是说，那些与苏格拉底一样，认识到自己所知甚少的人，是最智慧的。这句话后来就成了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即“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在古代有无数神谕宣示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尔斐神谕宣示所，它位于希腊中部的山里。今天还能看到这座神庙的废墟。根据历史记载，以及通过挖掘出来的文物，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神谕宣示所是如何运作的。

主角是女祭司皮媞亚，她住在阿波罗神庙中，深居简出。她永远来自于德尔斐人的家庭，也许是通过抽签当上了这个职位。一开始的时候，这一职务由年轻姑娘担任，后来因为发生了皮媞亚被情人诱拐的事情，就改让中年妇女担任这一职务。

德尔斐的女祭司坐在一个鼎上。这个鼎的形状像凳子。据一些历史记载，这个鼎放在一个土坑上，坑里冒出蒸气，这些蒸气使女预言家陷入一种阴魂附身的状态。但在考古过程中，人们没有在德尔斐发现这样的土坑。更有可能的是，女预言家通过圣坛上的烟或其他手段，进入半

睡眠状态。

乞求神谕的人并不直接向皮媞亚提出他们的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工作人员把问题告诉坐在帘子后面的皮媞亚。如果涉及一般日常生活的问题，女预言家的回答非常简单，即“是”或者“不是”。如果涉及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回答就详细得多，常常是隐晦的诗句。一旦牵涉重大问题，还要把神谕记录下来并保存。所以一些神谕便得以流传下来。

例如，当一队来自雅典的使者想知道该如何抵御正在向希腊进攻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公元前520—前465年）时，皮媞亚的回答是：

神庙的屋脊上冒出深红色的血，预示大难临头。赶快离开神圣的房子，拿出勇气来面对不幸。宙斯会把木墙送给他的雅典，供你和孩子们使用。

使者们把这些话带回了雅典，一开始大家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木墙是指围绕雅典卫城的带刺的厚篱笆。但最终另一种解释占了上风——木墙指的是船只。所以他们就进行海战的准备。最后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人战胜了人数远多于自己的波斯舰队。那么皮媞亚从何得到灵感的呢？对此的猜测多种多样。有人说因为德尔斐神庙通过同各地接触，非常了解各地的情况。还有人说，进入半睡眠状态的人完全具有某种预言的功能，能比其他人看到和感觉到更多东西。正是很多预言灵验使得神谕宣示所经久不衰。一句挂在神庙前厅的话，现在已经成为金玉良言：认识自己。



/希腊人/

今天，神谕只有在私人空间还起一定作用。在公众讨论中，它已没有了地位。神谕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了衰落的苗头，而基督教的传播更加剧了这种势头。也有人试图要保留这种做法，其中最令人感叹的例子是古罗马皇帝尤里安的努力。他是康斯坦丁大帝的侄子，被称为叛教者。361年登基时，他公开宣布自己相信古老的神明，拒绝基督教，他还引入了无神论的信仰，并想重新恢复德尔斐的神谕宣示所。他派自己的朋友奥莱巴斯奥斯医生前往德尔斐。在那里，他得到了下面的神谕：

告诉那个统治者，充满艺术的地方已经毁灭，

阿波罗神殿没有了屋顶，也不再有预言的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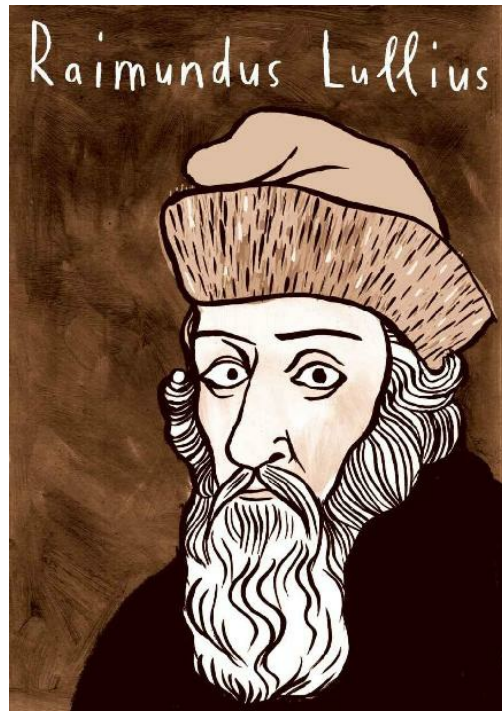
话语的源泉已经干枯，潺潺的流水也哑口无言。

很明显，这是一个不利的神谕。这一神谕后来也被证实：363年尤里安在战场上身亡。试图恢复神谕宣示所的做法失败。尤里安的继承人又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王。

游戏：回到古希腊的时间旅行

从外部的生活条件来看，古希腊人离今天的世界很远。这不仅表现在风俗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上。许多古希腊人走路是不穿鞋的，少数人穿拖鞋。那时没有钟表，通过看太阳的位置或阴影的长度来计算时间。衣服的样子极其简单，就是把两块布的某些地方缝在一起，很像南美人穿的斗篷。房子里也几乎没有家具。人们认为，华美的家具和装饰会引起神的愤怒。即便在精神层面上，也缺少今天用来帮助思考、计算和计划的辅助手段。例如，算术体系非常简单，用字母而不用数字。古希腊人把7864写作ζωξδ；而把1000写成α。使用当时通用的字母，虽然也能表现数字，但如果进行计算，这样的体系就太不适合了。现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用阿拉伯数字做算数的水平，也要高于古希腊的天才。

文字的情况也很类似。尽管当时已经发明了文字，但读起来很困难，阅读就像是猜字游戏。今天使用的简化阅读的手段，当时都没有，所以有时要从左往右读，有时，又从右往左读，有时又是两者交替使用。文章中很少使用标点符号，句子之间也没有距离，写句子的时候就是直接写下去，所以只有一小部分古希腊人有阅读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考虑到当时希腊人拥有如此简单的辅助手段的话，那么他们的功绩会显得更出色。当时，他们只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就为欧洲的科学、政治和文学艺术打下了基础。其影响无所不在，不仅仅体现在哲学中。涉及欧洲文化成果的所有单词，从“欧洲”到“技术”、“戏剧”、“民主”、“音乐”、“数学”，一直到“哲学”、“物理”和“心理学”无一不源自希腊语。



/拉蒙·吕尔/

19. 找不到思想关联？做个表格吧！

谁会把衣柜中的衬衫、裤子、上衣和大衣的各种排列组合一一进行尝试呢？哪个厨师会为了做一顿美味的饭菜，把蔬菜、水果、肉类和调料各种搭配的可能性都试验一遍呢？目的和习惯都导致在现有的各种因素之间，只有很小一部分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在某些情况下，看一下尚未被关注的组合也是有益的。

一方面模仿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如何穿着打扮，如何做饭。不过同时可以通过偶然的机会来发现这样或那样的新搭配。另一条道路则是，系统地寻找新的组合体系。

这条道路是西班牙哲学家拉蒙·吕尔（1235—1315）开拓的。他毫无疑问是中世纪最奇怪的哲学家之一。吕尔出生在马约卡岛。一开始，他作为贵族、宫廷抒情诗人和大臣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精通各种骑士艺术。在经历了一次宗教顿悟后，他脱离了所有尘世的享乐，努力钻研，学习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然后长时间在地中海地区云游，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新任务就是要向那些非教徒进行传教。

同时，他勤奋写作，一共写了三百多本书。在经历顿悟后，他就离开了妻子。他的妻子向国王提出申请补助，在给国王的信里，她称丈夫“成为了一个静思默想者”。而吕尔则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因为他认为，他发现了一套充满艺术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使他出色地解决所有哲学和神学的争论。他多次地描绘了这一方法，特别是在他那本名字优美的著作《找到真理的艺术概要》（这本书也被称为《宇宙艺术》）中。正如后来吕尔承认的那样，这本书就是在马约卡的兰达山上受到上帝的启示而写成的。在《宇宙艺术》中，他描写了一种知识的组合方法。这一方法的原材料是可以转动的纸板。我们在这里只需要两个啤酒杯垫，垫子的一面得是空白的。把其中一个垫子剪去一圈，这样就有了一个大圈和一个小圈。

然后把想要组合的物体名字的缩写写在垫子的边上。吕尔使用了九个字母B, C, D, E, F, G, H, I, K。这九个字母代表普遍的价

值，如善良、伟大、永恒、权力、智慧、意志、美德、真理和荣誉。如果把新组合成的概念比作一道新菜，那么这些词就是调料和原料。比起乱找，这一方法的优点是，组合可以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产生。如果在纸板上写上了所有的要素，通过旋转纸片就可以得出各种可能的组合。至于这些组合是否有用则另当别论。这一点局限不会使人放弃使用这一手段。这一手段就是用来产生组合，而不关心这些组合是否有用。这就像是一种所谓的“专家体系”，如拼写和语法检查程序，这些程序可在电脑上检查出错误的书写，并建议可供替代的文字。不过是否使用这一程序，则由写作者决定。

你需要组成多少对概念，你就需要多少个圈。从理论上来说，你也可以用十个圈。但这样的话，结果就很难看清。吕尔把他的组合方法应用在各种地方。例如他用这种方法得出了一种新的选举方式。在小说《修女们》中，他利用这一方法合理地选举出修女院院长。所有的候选人都要进行两人对决。得票最多的人便是获胜者。这是一个公正和彻底的方法，只是太复杂了。今天选举的方法要简单得多，从原则上来看，德甲联赛所采用的循环赛制就是按吕尔建议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所有的球队要同所有的对手相遇，并且不仅要计算胜利的次数，还要考虑进球数和净胜球。

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吕尔的组合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秘密文件解密，或者发明更安全的锁，甚至还可以用来解决法律问题。最终他还把这种方法用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上，成为了数理逻辑学的创始人。

如果我们要组合的元素很多，就可以使用吕尔的卡片。如果元素比较少，也可以使用所谓的“网格图”。这时，要把所要参加组合的元素填在表格的纵向第一列和横向第一排里，中间的格中写上组合的结果：

	C	D
A	AC	AD
B	BC	BD

一般来说只涉及两对概念，如亚里士多德有关元素的理论。亚里士多德通过两对描写材质的概念“潮湿/干燥”和“温暖/寒冷”对火、水、土

和空气进行了定义：

	温暖	寒冷
潮湿	空气	水
干燥	火	土地

如何才能把这些技巧用在哲学争论中呢？我的观点是，如果是为了列出一个概念体系要图的话，这些技巧是有用的。许多哲学家工作的时候所用的概念、所提的问题和说明的模式是有限的。他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利用组合的手段，不管是转动的卡片还是表格，都可以得到新的思想联系，而这些思想联系本就在一个特定的概念系统里，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很喜欢使用组合这一手段，特别是哈贝马斯。但他不使用转动的卡片，而只是简单的表格。他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对待世界的立场的表格中，把两组区别组合在一起，以区分各种不同的宗教，表格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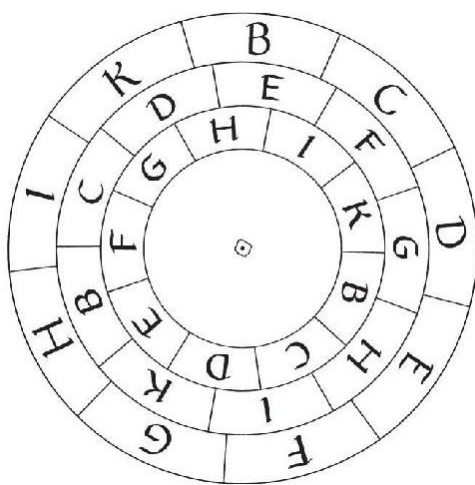
	积极的寻求治疗	消极的寻求治疗
否定世界	犹太教 / 基督教	印度教
肯定世界	儒学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

表格或转动的卡片是工具，它们不会自动地起作用，而是要通过一个聪明脑袋来观察和判断。工具的作用是支持思考，而不是取代思考，所以我们不能掉进这个陷阱里。它可以毫无困难地产生看起来是非常专业的“结果”。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图示中的错误结果。我们看到一个一目了然的图表时，很容易就认为，图表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看上去那么有序。但其实不一定永远都是正确的。拿上面的两个例子来说，哈贝马斯用来形容宗教的那些概念是令人怀疑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理论也只是第一眼看上去具有说服力。如果把每种说法从组合中脱离开来，看上去就非常奇怪：空气真的永远是温暖和潮湿的吗？而土地真的是寒冷和干燥的吗？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吕尔那里，有时候他也过高地估计了组合手段的作用。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穆斯林同基督教发生宗教战争的年代。在他出生的前几年，雅各布国王从伊斯兰教徒那里夺取了马约卡岛，吕尔

就是在这个岛出生的。他活着的时候，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穆斯林，还有很多犹太人。吕尔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敌对宗教之间的对话。要使对方信仰自己的宗教，当然不应该依靠火光和利剑，而是要通过理解和说服。他认为他的做法无非是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明智的介绍，让穆斯林和犹太人信仰基督教。所以，他的图表上的缩写不是代表概念，而是当时最高的精神价值，即上帝的特征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他认为通过这两者的组合就能应付所有的精神挑战。但是他的对手当然不会忽视这么一点，即吕尔通过把转动的卡片程序化，预先就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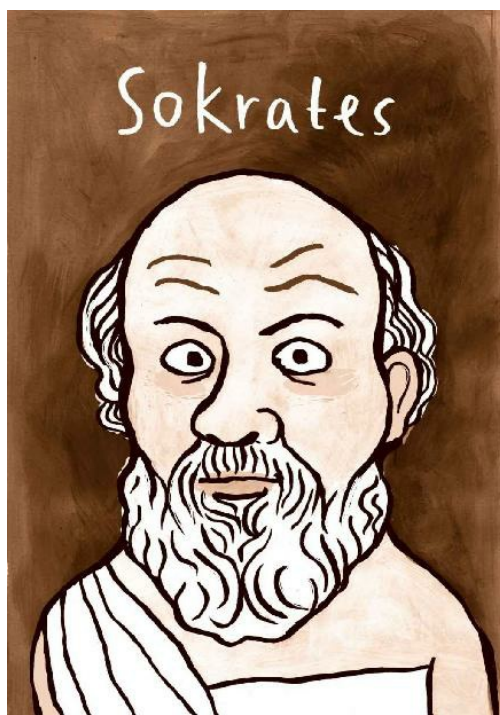
1306年，他去往布瑞（现在是阿尔及利亚的贝贾亚），加泰隆的国王在那里设立了一个领事馆。他孜孜不倦地在那里宣传他的《宇宙艺术》，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基督教的真谛。后来他被捕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神职人员到监狱里看望他，因为他们听说，他能用文字展示基督教真理。吕尔取出他的真理机器开始组合，他正在求证的时候，传来了要放逐他的命令。他气愤地上了船。后来，据说他又来到布瑞，有一次他在街上传教后，愤怒的穆斯林用石头打他。他死在返回马约卡岛的途中，葬在马约卡岛的帕尔玛圣弗朗西斯教堂。后人对吕尔的著作反响不一。教会对他的伟大艺术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一段时间，他的著作列入教会禁书之中。在近代，他被誉为是组合数学的先驱。



/吕尔的转动卡片/

思想游戏

人可以说出来的句子都是由同样的符号组合的，所以，想象一下从组合学的立场出发，不经思考而把字母组合在一起来表达人们想说的话，一定很有意思。通过这种方式，会产生许多没有意义的话，这一点不言而喻。但利用组合学的方法，起码可以把想说的话都可以说出来。莱布尼茨在有关人的知识的局限性的笔记中算了一笔账。他计算了所有可能出现的话（不管话是真是假或者毫无意义），他得出的数字是 $10^{7300000000}$ 方，这是一个有7300亿个零的数字。为了能对这一数字有个概念，可以想象一个类似卡尔·施皮茨维克的穷诗人，他把所有的句子都分别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他就把放满纸片的卡片箱放在床底下，渐渐地卡片箱会堆成山，盖过床和诗人，一直到屋顶，然后穿过屋顶，达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当这个诗人写完所有句子，想从床上爬出去，去见他的出版商时，他需要许多光年，才能走出门。



/苏格拉底/

20. 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那些想说服他人的人，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说过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通过大大小小的付出向他人表明，自己是认真的，自己对待友谊、爱情和信念的态度是认真的。

人们可以为他人付出钱财，流汗掉泪，或起码有所表示。但所有这些做法要取得效果，必须详细地用言语进行阐述，使他人切身体会到自己的良苦用心。即使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行为，如果没有经常被提起，也不会产生效果。如果对方真的有所触动，那么这一切也都值了。当然，对方也完全可以说：“即使不为我，你也会这么做的。”这时，我们就遇到了比做出牺牲更棘手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为我做了什么，就一定代表他的诚意吗？

尽管如此，有些姿态是很难让人怀疑的。如果一个人愿意以生命来维护他的信念的话，其说服力是无与伦比的。哲学史上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例子，那就是苏格拉底的死。苏格拉底被指控败坏青年，从而被雅典人告上法庭。在法庭上，苏格拉底先是指责原告，然后又指责法官。他声称，他同年轻人在哲学方面的合作是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所以他要求这个城市奖赏他。法庭宣判他死刑。这个判决没有对苏格拉底产生丝毫影响。他安静地走进牢房，也没有利用可以逃出监狱的机会，因为逃跑违背他的做人原则，他准备承担最终的结局。

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是在监狱里度过这几个小时的。正如柏拉图所写的那样，他住的牢房十分文明，里面甚至有一间浴室，而且允许有人拜访。所以，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还一直在和学生们谈话。他的情绪一直很稳定，甚至还试着学拉手摇风琴。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学琴，他回答道：“你说，我应该什么时候学呢？”终于，法警来了，他说：“哦，苏格拉底，我想，你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抱怨我。当我对其他人说，请把毒药喝下去的时候，他们对我非常凶狠，还诅咒我。”

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劝他不着急喝毒药，因为太阳还没落山；他们还

说，别人会在临刑前让漂亮的女人或小男孩过来伺候，或者享受美食和美酒，问他有没有兴趣？

苏格拉底说：“是啊，其他人会如你们所说的那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就能赢得什么。但我不这么做也是对的，因为我想，即使我晚一点喝毒药，也不会赢得什么。如果我拽住生命不放，最多也就是显得自己非常可笑而已。”

然后，他拿起装有毒参的杯子，问法警是否可以先用毒药祭奠一下。法警回答道：“我们只准备了一个人用的量。”

苏格拉底说：“我明白了。但我仍然可以向神祷告，希望从这里去往阴界的道路非常顺利。”

然后，他拿起杯子，把毒药喝了。

毒参在古代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毒药。正如今天我们知道的那样，这种毒药含有生物碱，在没有成熟的果子里，这种生物碱的含量最大。这种毒药在空气中很容易分解，所以必须要现用现做。如果剂量小的话，它还能作为麻醉剂。所以在古代，这是一种抑制性冲动的药品。例如，盛传得墨忒耳女神神殿里，男僧侣同许多妇女一起共事，他们必须服用少量的毒参，从而使自己不受女性的诱惑。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苏格拉底的监狱里。柏拉图写道：“在此之前，我们中大多数人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把毒药全喝下去的时候，便再也忍不住悲痛。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只能把脸捂上……克力同比我更早站了起来，他不想阻止自己的眼泪往下淌。而一直没有停止掉泪的阿波罗多罗斯则放声大哭了，在场所有的人都被他痛哭的样子震动……”



/毒参/

苏格拉底却非常平静，他提醒大家不要哭。他听说，人将死的时候，周围的人必须静默。他来回地走，一直到他的腿变得麻木，然后他才躺下。他的身体凉了下来。当他发现，毒药已经侵蚀到他的心脏，就说了那句赫赫有名的话：“哦，克力同，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呢。”说完这句话，他便死去了。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学之神。如果病人突然治愈了，他就会收到许多贡品。就这样，苏格拉底为哲学付出了生命。他的死是一个绅士的文明之死，至少在柏拉图的描述中是如此。

那么他果真是如此安静地死去吗？我们从其他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服用毒参而死肯定不是什么舒适的事情。毒参的作用与毒箭很相似，亚马孙一些印第安部落就用毒箭捕猎。它能麻痹肌肉的运动神经，而神经的感觉能力依然保存。所以，吃毒参的人会一直保留知觉到生命的终结，最后因呼吸中止而死亡。从下往上的逐渐僵化是其基本症状。医学上的症状还包括喉咙里有灼热感、恶心、呕吐、头晕以及肌肉颤抖，接着身体自下而上麻痹，最后突然死亡。古希腊诗人尼堪德罗斯在一首说教诗里，描写了吃毒参死去的状况，和柏拉图所写的相去甚远。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服下毒参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

黑夜深红色的绷带在脑子的四周摇晃，
眼睛看到鬼火，
两腿左右晃动，
身体倒地，
不停地咳嗽，
指尖发麻，
流出鲜血，
在几乎不能喘气之际
死亡骤然而至。

要淡定地面对死亡，是需要力量的。苏格拉底当时已经七十岁了，知道这点，也许会减轻我们的痛苦，但这不会削减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的勇敢姿态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一印象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人们热衷谈论此事，而且还多次把它搬上画布。我们几乎都无法判断，如果苏格拉底不是饮鸩而死的话，是否还会像现在那么有名。他去世时的伟大一幕提升了他事业的崇高性。苏格拉底去世五百年后，一个名叫昆体良的罗马诗人写道：“放弃为数不多的有生之年，他赢得了几百年之久的生命。”

【加V信：209993658，免费领取电子书】

关注微信公众号：**njdy668**（名称：**奥丁弥米尔**）

免费领取**16**本心里学系列，**10**本思维系列的电子书，

15本沟通演讲口才系列

20本股票金融，**16**本纯英文系列，创业，网络，文学，哲学系以及纯英文系列等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寻找。

公众号“书单”书籍都可以免费下载。

公众号经常推荐书籍！

我收藏了**10**万本以上的电子书，需要任何书都可以这公众号后台留

言！

看到第一时间必回！

奥丁弥米尔（**njdy668**）：一个提供各种免费电子版书籍的公众号，提供的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

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

【上千本电子书免费下载】

结束语

哲学赖以生存的手段是讨论和交换看法。关键不仅仅要掌握一系列的手段，也需要具有特定的态度。因为在哲学谈话中，主要目的不是用一切手段来使他人相信某种固定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和他人一起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前进。

因此值得建议的是，从一开始就要明白，其他人一定也有对的地方。要控制自己非赢不可的强烈意志，这种意志会破坏许多实际讨论，为此，古希腊时代的大师们建议对每一个问题不仅要提出一个，而且要提出两个互为对立的看法。这可是很难做到的！但这么做极其有益。因为如果只有一种看法，就会倾向于把自己的这种看法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而把别人的话不加思考地宣布为胡说八道。

但被看作是胡说八道的话，常常具有隐藏很深的含义，前提是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思考。例如，十八世纪具有启蒙意识的科学家们觉得有关龙形怪物和独角兽的传说非常荒诞。一直到今天，这些怪物还被当作是纯迷信的范例。但如果我们认真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有关龙的传说并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这些传说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因为人们已经找到了它们的化石。

比如1335年在克拉根福挖掘出来一个巨大的头颅，人们无法把它归到任何已知的动物种类中去。于是人们把这一令人惊奇的头颅焊到铁条上，并在市议会的大楼里展出。当地居民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龙形怪物的头颅，这个怪物曾经在当地兴风作浪。1636年一个雕塑家制作了一个和原件等大的复制品。今天我们还能见到这一展品。

而神秘故事确有其真实内核。尽管这个头颅不是一条能喷火或吞吃少女的龙的头颅，但肯定属于一头巨大的动物，它的头颅曾引起克拉根福人的丰富想象。今天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只长满长毛的犀牛的头颅。

《奥德赛》中有关独眼巨人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受到动物化石的启

发，因为猛犸象或其他象类的头颅的额角上就有一个洞。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年受到启蒙者强烈嘲笑的神奇动物的传说似乎不那么可笑了。今天我们知道，地球上曾经有过许多生物，比古老寓言和传说中的生物更为古怪。事实的真相比人们的想象力更为丰富。没有什么比认为自己的哲学观点是智慧的最终成果更不符合哲学精神了。在探求真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著名的章节中写的那样：“一方面，没有人能完全地达到真理；另一方面，没有人的努力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乐于向他人学习，同时也要有勇气独立思考。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从这一意义上获得探求哲学的乐趣。

注释

- [1] 那先：印度僧人。相传他是印度雪山山麓羯胝揭罗村一个婆罗门的儿子。《弥兰陀王问经》中记载了他的事迹，以及他对佛教义理的见解。——编注
- [2] 舒马赫：1969年生，德国著名一级方程式赛车车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屡次赢得总冠军，被誉为“车神”。2013年他在法国滑雪时发生事故，昏迷至今。——编注
- [3] 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编注
- [4] 贺拉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著有《诗艺》等。——编注
- [5] 塞内加：古罗马诗人、修辞学家。——编注
- [6] 莱因霍尔德：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拥护者。——编注
- [7] 费希特：德国哲学家，他受到莱因霍尔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人的影响，而他本人对黑格尔、叔本华等哲学家影响颇深。——编注
- [8] 中项：这一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中项可连接小前提和结论中的主项，或者连接大前提和结论中的谓项。——编注
- [9] 印度的神职人员，种姓制度第一等级的成员。——编注
- [10] 罗伯特·穆齐尔：奥地利作家，著有《没有个性的人》。他曾写过一个短篇故事《马会笑吗？》，本书中的对话就是根据这篇故事改写的。——编注
- [11] 德语名词分为阴性、阳性和中性三类，德语“勇气”一词为阴性，而这个学生写成了中性。——编注
- [12] 女子用的动词kriegen，在德文里也有“怀孕”的意思。——译注
- [13] 德语中“老鼠”和“鼠标”是同一个词。——编注
- [14]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为基民盟，德国最大的政党之一，2005年至今为主要执政党，现任党主席为默克尔。——编注
- [15] 迈纳：古希腊的重量及货币单位。——编注
- [16] 直译为：读葡萄，可理解为采摘葡萄。——译注
- [17] 戏拟一词在德语中为Parodien，故作者用字母P代指。——编注
- [18] 此处仅代表本书作者的观点。——编注

[19] 剧本一词在德语中为Drehbuch，其中“Dreh-”源自drehen一词，意为“旋转”。作者把“剧本”和“反转”放在一起作为标题，有文字游戏的意味。——编注

[20] 耶和华见证人：这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团体，十九世纪末由查尔斯·泰兹·罗素在美国发起。——编注

[21] 开尔文勋爵在1900年发表了题为《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空十九世纪乌云》的演讲。——编注